

# 回顾与展望

——一棵「四人帮好苗子」的自述



董学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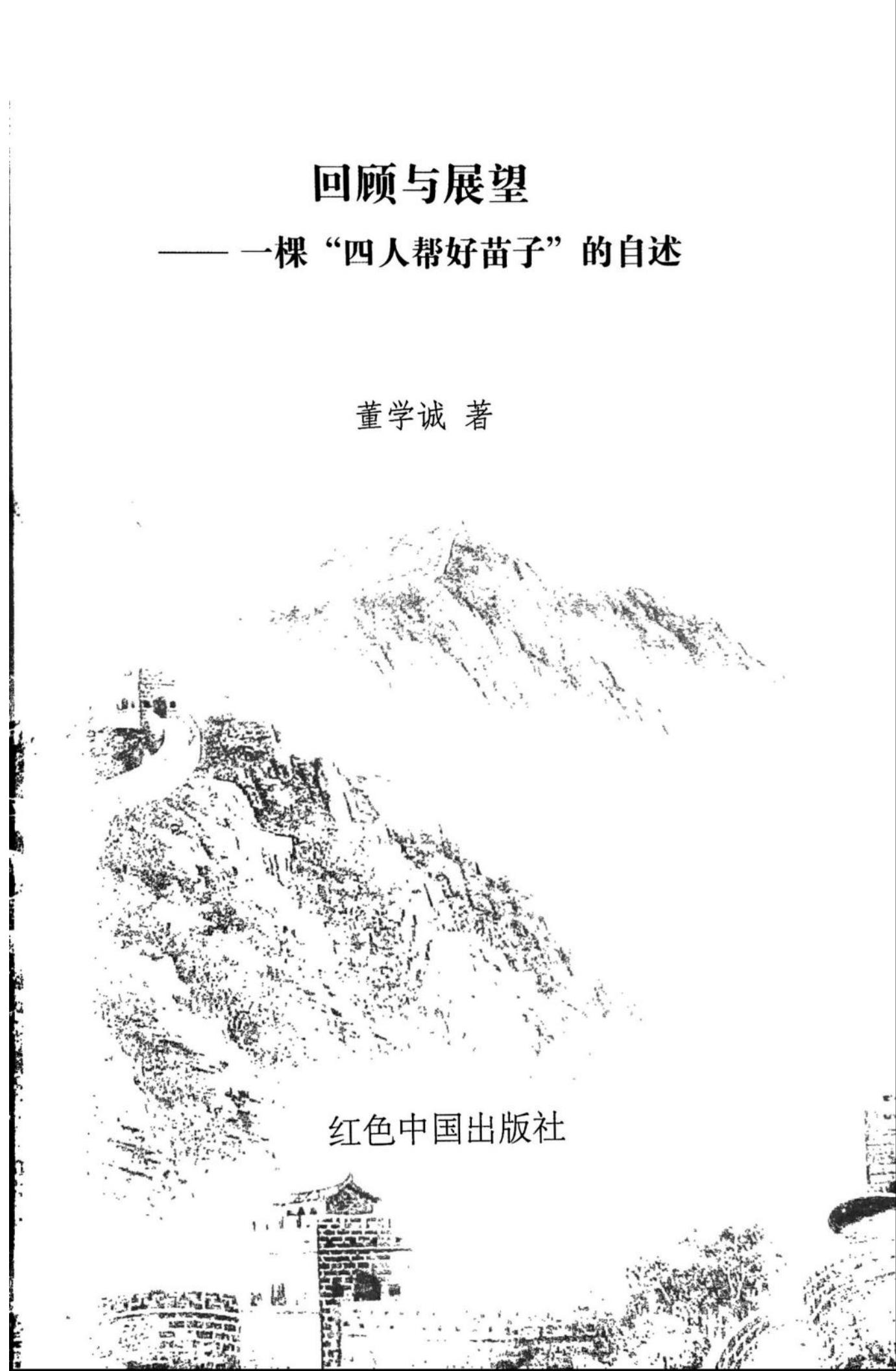


红色中国出版社

# 回顾与展望

## ——一棵“四人帮好苗子”的自述

董学诚 著



红色中国出版社

回顾与展望  
——一棵“四人帮好苗子”的自述  
董学诚 著

责任编辑：梁浩  
封面设计：肖芳

ISBN 978-988-16729-5-7  
2016年9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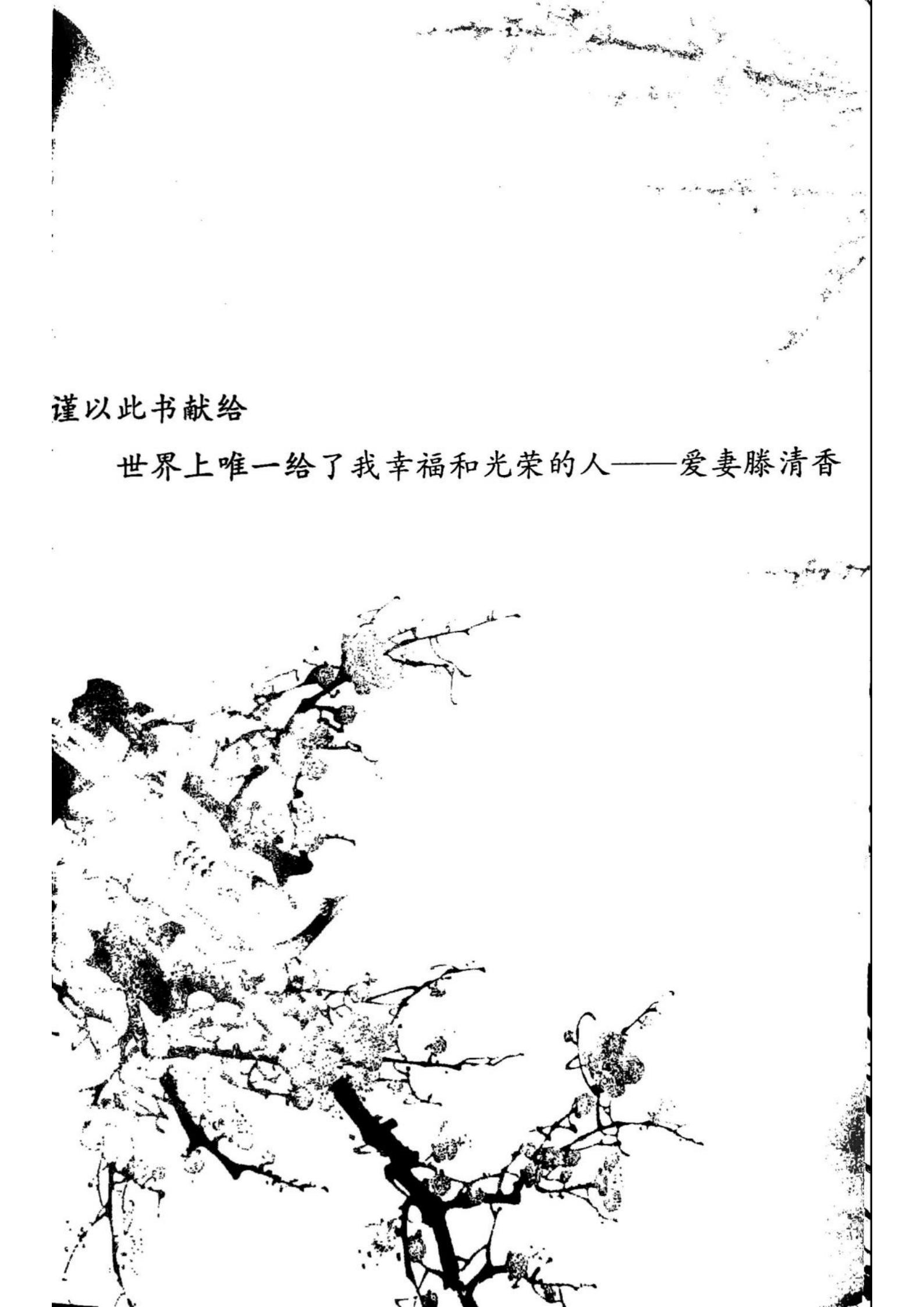
红色中国出版社 2016  
Red China Press 2016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香港九龙彩虹道采颐花园12座4楼J室

幅面：145mm×210mm 1/32  
印张：7.25  
字数：138千字

定价：人民币 35 元  
港幣 5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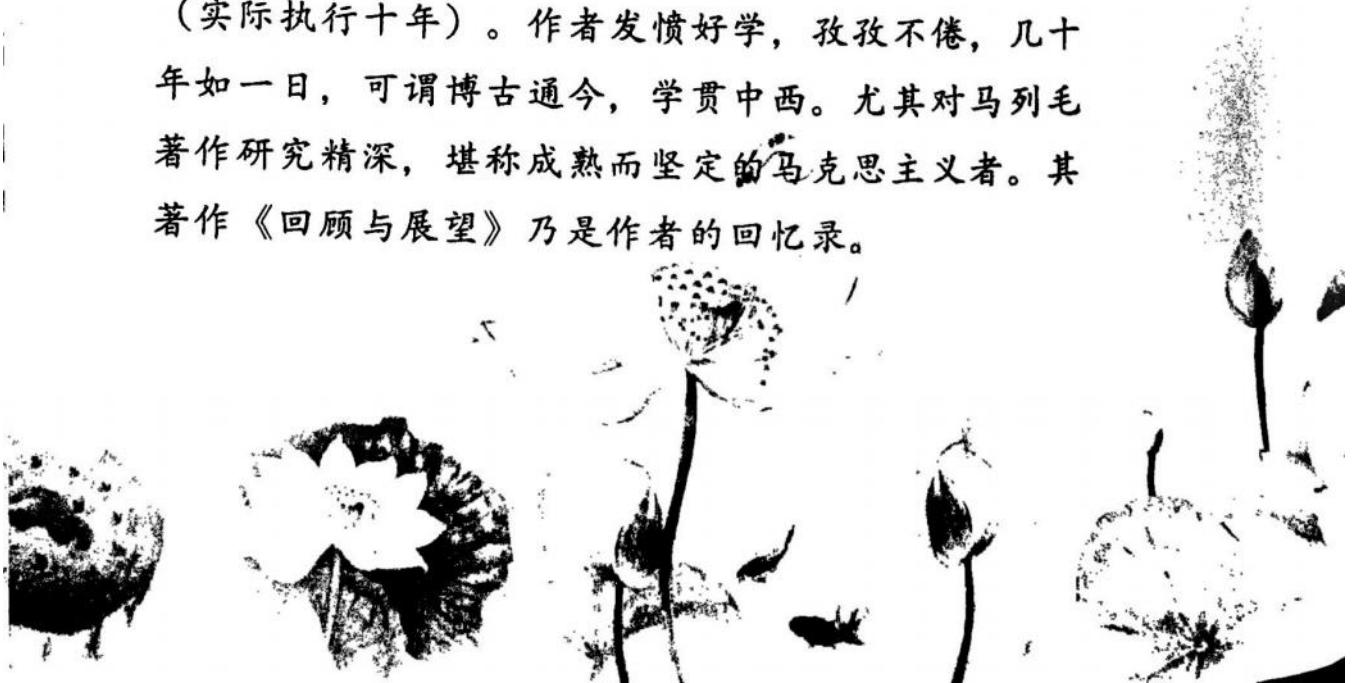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

世界上唯一给了我幸福和光荣的人——爱妻藤清香



## 作者简介

董学诚，山东省淄博市人，生于1947年10月19日（夏历丁亥年九月初六）。1967年高中毕业，198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自修大学中文系。1966年11月25日接受过毛主席第五次对红卫兵的检阅。1968年作为红卫兵代表参加“革命三结合”，被当选为淄博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7月，在京批林批袁（昇平）汇报会期间的演讲，曾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并因此被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移花接木，污蔑为“四人帮的好苗子”。1976年11月15日，被华国锋政府逮捕，1979年12月31日，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实际执行十年）。作者发愤好学，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可谓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尤其对马列毛著作研究精深，堪称成熟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著作《回顾与展望》乃是作者的回忆录。





作者近照



1987年夏，初获自由的作者与妻子在青岛海滨

## 自序

被修正主义者诬蔑为“十年浩劫”、“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五十周年。五十年来，被修正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泼在她身上的污水一直未能澄清。

近年来，当年亲身参与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先驱者，已经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撰写了不少的回忆录。这些著作，像《清华蒯大富》、《奉献》、《秋梦追思》、《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戚本禹回忆录》等等。作者们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谨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白描式的笔触，再现了伟大的、由亿万人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的发展。”被修正主义者污蔑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以令世界触目的成就载入了史册。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开拓出第三极世界的生存空间，并恢复了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像氢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甚至神舟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国家的“三五”“四五”计划在十年内顺利实现，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顺利建成，国民经济从此跨入工业化时代！受制于人的情况大大改观。固定资产已相当于旧中国百年积累的 25 倍。石油工业突飞猛进，永远甩掉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贫油国”的帽子，1978 年突破 1 亿吨，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八位产油大国。农业生产连续丰收，各种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4289万千瓦，机电排灌面积达43167万亩，分别比1965年增长643%和355.58%，真正实现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伟大预言。伟大的中华民族雄狮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使每一位炎黄子孙都深深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一切成就，均来自于被革命焕发出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无私无畏的创造与努力，以及忘我的革命热情。联系到“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金钱为中心，私欲熏天、物欲横流的现实，“改革者”们能不感到羞愧吗？

我于1966年6月投身文革，中经“反逆流”、“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查五一六”等，命途多舛，历经磨难，含冤负屈，百口莫辩。更有甚者，1976年10月的“右派政变”，将我推入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囹圄之中，妻子冻馁，横遭诬陷，辛苦备尝，沉冤莫白。

今天，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能以忠于历史的严谨态度，完成此书，奉献于世人，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值此，对一切为此书的成书及出版做出过帮助的老师、同志、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 目 录

### 第一部 童年与少年时代

第一章 饥饿伴着冒险的童年.....	2
第二章 朦胧的爱.....	17

### 第二部 十年文革

第一章 狂飙为我从天落.....	22
第二章 红卫兵运动.....	26
第三章 复课闹革命.....	32
第四章 “反逆流”运动.....	36
第五章 “反复辟”运动.....	44
第六章 走向圣坛.....	49
第七章 “反复旧”运动.....	57
第八章 清查“五一六”运动.....	63
第九章 再教育.....	68

第十章 爱从天降.....	74
第十一章 落实政策.....	77
第十二章 “青岛会议” .....	81
第十三章 “批林批孔”运动.....	83
第十四章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92

### 第三部 十年炼狱

第一章 隔离审查.....	99
第二章 死囚的悲哀.....	108
第三章 审判.....	112
第四章 “我没有罪” .....	118
第五章 第一次会见.....	120
第六章 由对立到容忍.....	124
第七章 两个杀人犯.....	134
第八章 头发的遭遇.....	136
第九章 井下奇遇记.....	140
第十章 “法外施仁” .....	148
第十一章 最后的劝降.....	154

### 第四部 变身资产者

第一章 初涉商海.....	158
第二章 无人敢要我.....	162
第三章 新的人生.....	173
第四章 永恒的思念.....	177

## 第五部 深情反思与期望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成败.....	188
第二章 为造反派正名.....	200
第三章 丢掉幻想，为真理而斗争.....	207
第四章 热切的期望.....	213
跋.....	217
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219

## **第一部**

### **童年与少年时代**

## 第一章 饥饿伴着冒险的童年

我出生于公元一九四七年（夏历丁亥年九月初六日）我的家乡是山东省淄川县三区转道村（现为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转道村）。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村里有百十户人家，世代以农为生。若干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古朴的民风。

父亲名叫董家祯，母亲是邻村罗圈峪村的王氏女。如同旧时所有中国妇女一样，母亲是没有名字的。

听母亲说，我出生时，家乡国共两党还在打仗。满月后，即被父亲挑着到附近更偏僻的根据地投奔被解放军控制的区域避难。

当时，我的叔父董家祥已是声名显赫的职业革命家了。他不但是区武工队队长，而且还兼任淄川三区的区长。

据母亲说，我出生时小得像只小猫。因为贫困导致母亲长期营养不良，婴儿的体重自然可怜了！一家人谁都没想到我能够活下来。

我的乳名叫“三儿”。当时，父亲搜肠刮肚，再也想不出合适的名字来了。只好以我的排行作名。

我的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本来共有八个孩子。但因其中四个早夭，最终只剩下我们四个。女孩不在排行之内，我自然就是行三了。

四岁前的事不记得了。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就连穷乡僻壤的家园，也纷纷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声讨美帝的侵略行为。记得当时，每村都敲锣打鼓，连续数日地进

行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押解着戴着高帽子的“杜鲁门”、“李承晚”，高呼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军歌。目睹此情此景，年方四岁的我夹在队伍中高举着纸做的小三角旗，乐得手舞足蹈。

一九四八年，叔父随陈粟大军南下，在浙江省长兴县担任区委书记。在剿匪战中，他的脚踝被土匪击穿。父亲闻讯后，寝食不安，立即于一九五〇年春赶往浙江探望。父亲回来时，给我带回一双“洋袜子”，一双“解放鞋”，我穿在脚上，神气极了，挨家挨户的炫耀，显摆个不休。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村民们都戴上黑纱胸佩白花，在村支书沙哑的声音里进行悼念。我终于明白，死者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全世界都在悼念他。心想，长大了，我也要做让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在童年的记忆里，依稀知道我家是贫农。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了田地，翻身解放了。当时的农民，个个喜气洋洋，一心一意往前奔。我的父亲已届五十岁，但依然心气十足，每年一开春，便将一应农具打磨一新，带领着刚刚二十出头的大哥下地了。

父亲秉性耿直，为人豪爽，刚正不阿，一身凛然正气，在远近三里五村，小有名气。他尤其爱打抱不平。故乡邻们遇有疑难总爱找他。他也乐于挺身而出。他虽没上多少学，但凭着惊人的记忆能将《论语》《春秋》《中庸》《大学》《礼记》背得烂熟。村里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他曾反复向我们兄妹讲过他和叔父经过的患难。他们一道在日本鬼子开的大荒地煤窑里像狗一样地爬着拉煤筐，他们曾在民国三十二年的饥荒岁月里共同与灾难抗争过。他们兄弟两人曾共同患过一种叫“没汗”的怪病。哥俩相对躺在一盘炕上，你病加

重，我也加重，你病减轻，我也减轻，兄弟情深，感人肺腑，难怪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是那样的一往情深永不忘年轻时的胞波之情。

一九五五年，农村的互助组开始了。大哥牵头，带领五六户乡邻，自发组织起互助组，农忙时轮流帮种帮收，农闲时，便一起开豆腐作坊。这是当时唯一的副业。

一九五六年，在毛主席号召下，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席卷了这平静的小山村。我们家也便在村支书张继英的一再动员下，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当时叫初级社，据说，以后还要奔向高级社，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面包”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我心目中日夜盼望的最真实、最具体的共产主义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八周岁，背上妈妈做的新书包，披着朝霞上学了。本来我应该于一九五四年入学。但当我光着腚一个人跑到学校时，已经十七岁的学生杜希亭对老师说：“这行子还上学，还在吃奶哩！”引得周围的孩子哈哈大笑。我一溜烟跑回家不再出门了。这件事，一直传为笑谈。

于是，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始，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我的母校名叫田庄乡转道村小学。唯一的校长兼老师，是孙兆光先生。他是一位年届四十的高个子。发际很深，近乎秃顶。他品德高尚，极富涵养，态度和蔼，爱生如子。他身兼四个年级的课程。所谓教室，是以前村民集会的“官厅”。约能容纳三十张课桌。所谓课桌，只不过是在两个土坯垛子上架一块长条形状的木板而已。一张课桌能并排坐四个学生。孙老师手持教鞭走进教室时，一声“老师好”后开始上课。孙老师先从一年级讲起，一直讲到四年级。四十五分钟后老师摇铃下课。孙老师的单身宿舍，不过是在“官厅”的一角上用秫秸间起一间小小的“房中房”。房中一张三抽桌，一张

单人床，算是卧室兼教研室。我的同学有的已达十七八岁，又有甚至比我小一岁的小屁孩，是因为解放前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所以那些大姑娘大小伙直到现在才来上学。这就造成了年龄上的巨大差异。

学校的条件尽管如此差，但对我们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的语文课开篇便是《毛主席万岁》。我第一次从课本上看到毛主席，从这一刻起，在我的心坎上矗立起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也就从这一刻起，奠定了我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根基：誓为毛主席的事业而奋斗，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之后，又逐渐认识了共产党，知道了共产主义这个词。

我的小学生活是充满顽皮和野性的。春天来了。我和我的同学兼顽友小抱住、小跟住，金梁几个人，放学后来到石家庄我的祖坟里玩。时当坟上的金银花盛开，我忽发奇想，非要把这些爬满一座座坟头的花秧子拔光不可。我一声倡议，众小子一起动手，倾刻便将其拔了个精光。谁知，别人没事，我一回到家，便躺在炕上翻白眼，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妈妈说，这孩子作了大孽了，惹着祖宗了，不停地为我祈祷。当然，处于昏迷中的我，对这些一概不知，一个小时之后，我苏醒过来。自然遭到家父一通大骂。

从此以后，每年这时节，我都要犯一次病，一直延续到十二岁。记得三年级时，在学校正做着课间操，我一阵晕眩，便不省人事了。过后，方知是孙老师把我背回了家。听妈妈说，我把孙老师的上衣吐得一塌糊涂。此后，我一直对我尊敬的启蒙老师怀着深深的愧疚：多么可敬的孙先生啊！多么崇高的师德啊！

我聪明但不用功。每次考试都独占鳌头。深得老师的喜爱。先生家访时，也不住向父母夸奖我。我十分自鸣得意。

一九五六年夏日的一天中午，在一道三米多高的石堰上

并排站着五六个浑身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年龄最大的抱住也不过十岁。只听他一声令下：“跳！”这帮孩子像下饺子一样向堰根的水湾里跳去。水不深但也没过了孩子们的腹部。我猛地跳下去，足底骤然一阵钻心的剧痛，我大哭大叫着爬到了湾沿上，扳起脚一看，右脚后跟不知被什么东西割开了一道小孩嘴巴似的血口子，血咕嘟咕嘟冒个不停。我忍住剧痛，趿上鞋一瘸一拐地赶回家，哭着给妈妈看，妈妈真是又恨又心疼，赶紧扯下一块白布条，将我的脚跟扎好。父亲从门外回来，少不了又是一顿训斥。

这次冒险过后，我的顽劣稍加收敛。来到秋季，正是上山割草的季节，每天我都要和揽住、抱住、跟住、金梁等上山割草。割来的野草一是用来自家喂驴，二是可以晒干后到山下去卖，赚几个钱，补贴家用。

一天下午，我们一干人来到石家峪。在石家峪的半山腰里有一个约十多平方的大洞口。至于这洞形成的年月，无人知晓，只觉得洞内阴森可怕，无人进去过。

在洞口的顶端，有一片可容一人站立的处女地，上面长着一片茂密的山韭菜。众伙伴早就垂涎过不止一次了，但无人敢上去采拔。我们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望洋兴叹。这情形，一下子激起了我的英雄主义。我二话没说，像猴子一样飞身上前，辗转腾挪由下而上攀缘。约十来分钟，爬到了山顶，然后由山顶一点一点往下挪。众伙伴都捏着一把汗，大声惊呼。我最终落脚在那一小片处女地上。这里从来无人光临过。往下一看，禁不住心惊胆战。脚下是数丈高的峭壁。这空间只能容得下我瘦小的身躯，倘稍有不慎，岂不是粉身碎骨！待我稍事安定，便开始拔那韭菜。由于根深，拔起来十分吃力。但现在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我不能退缩，不能让他们嘲笑我！约有一顿饭功夫，韭菜拔完了。我顺手

将这些战利品成把地扔下悬崖，“处女地”终于变成不毛之地了。但处在半悬空中的我，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往下滑，简直不可能，往上爬，一溜峭壁，比登天还难！伙伴们急得直跺脚。最终，他们中年龄最长的揽住叔有了主意。他要我沉住气，带领着一干人转着圈从后山绕到山顶，然后把大家捆草的绳子接起来，从山顶上续下来，我把绳子捆在腰上，山顶上的五六个孩子奋力拽着绳子往上拔。多么惊险！稍有不慎，我倾刻命归黄泉！幸好，悲剧没有发生。几分钟后，我被拽上山顶。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拥抱着，欢呼着，庆贺胜利。

这次冒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多少年后，每每想到这一幕，还不由得心惊肉跳。这不是作死吗？但我的英雄壮举，却赢得了众人的啧啧赞叹。从此，也就奠定了我在他们心中的领袖地位。自此以后，在与大庄的孩子们打群架时，无一不是由我挂帅“征西”（大庄在西头）。

以上是小学三年级时发生的事情。

第二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还是上述人马在东岭割草。正忙碌着，金梁惊叫着跳了起来。在其身旁的我一看，原来是一条胳膊粗的一米多长的紫地白花的大蛇从金梁脚下掠了过来。然后，那蛇在一片惊呼声中向石堰窟窿里钻去。但由于蛇身太粗，那窟窿太小，大半截蛇身尚露在外面。我一个箭步，说时迟，那时快，奋力向前，用双手使劲攥住蛇尾，然后往里一送，那蛇不知是计，猛往里钻，我奋力一拽，那蛇被猛地拽出，红红的蛇芯子在唇外抽搐着，像一道燃烧的火焰，嗤嗤作响，煞是吓人。原来这一招我是跟父亲学的。记得去年有一次，董家龙叔的屋墙角里有一条蛇为了向墙洞里捉老鼠，也是这样钻进洞里。父亲手持钳子夹住它的尾巴，先是往里一送，蛇的逆鳞放松了，然后猛一拽，就出来了。

此刻，我把那蛇拽出后，抓着尾巴提在手里，那蛇拼命想转头来挣脱，但不能够。我将蛇一阵狂甩，那蛇便脱了节，然后又猛力向石板上甩去，没几下，那蛇便翻起了白眼。几个孩子来了勇气，石头砸，镰刀剁，顷刻间，蛇化为肉酱。

这是我童年征服史上又一记“英雄业绩”。为此而津津乐道了好多年。直到上高中后，还眉飞色舞地向同学们喋喋不休。

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地描述以上几件“壮举”。主要意在让读者了解当时正处于英雄崇拜的年代。即使像我这样的儿童，心目中也有着诸多的英雄情结。黄继光、董存瑞、卓娅、舒拉的故事，时时激励着我。尤其是我家，出了叔父这样了不起的英雄的革命家。他老人家一直是我行为的楷模。他那勇斗鬼子汉奸的壮烈义举，他那一系列神话般的英雄故事，无时不在鞭策着我。他那罗宾·汉一样的英雄形象，无不令我心驰神往。从记事起，我就立志做叔父那样的英雄。

一晃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旋风席卷了转道村。粉刷后的墙壁上，到处用斗大的红字写满了“钢铁元帅升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等豪言壮语。学校也卷进跃进的漩涡。同学们都被动员回家砸锅，砸鏊子，然后两人一杠抬到八里以外的公社驻地田庄“炼铁”——将熟铁再炼为生铁。但此举遭到了大人们的普遍反对。大哥是党员，又是营长。当时，实行全民皆兵，均按师团营连编制。就连我也被封为连长。戴上红袖章，神气极啦！青壮劳力都被征调。一是去修水库，二是去大炼钢铁。家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秋收了，没有劳动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成熟的庄稼在地里一天天烂下去。第二年，这一违反客观规律的胡行便受到了老天爷的报复。饥馑，像瘟疫一样泛滥起来。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这两年无话可说了。因为大家都

勒紧裤腰带，共度荒年。野菜吃光了，开始吃树叶，吃树皮。我吃过的东西有谷糠、高粱糠、棒子皮、棒子骨头、棒子秸，副食品更加丰富啦：什么杨家蔓、荆柯头、国槐叶、洋槐叶，榆叶、榆树皮被视为上品。最坏的要属洋槐叶，它虽然不是最难吃，但人吃后浑身浮肿。最可怜的是妈妈。因为妈妈吃得最多，她小腿肿得像瓦罐，肚皮肿得透明，一触即破，脸上的皮肤褪了一层又一层。可怜的妈妈即使这样了还要操持全家八口人的吃喝。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家中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了。妈妈领着我到东坡去撸杏叶。那棵生长在堰边的老杏树，可谓枝繁叶茂。母亲站在堰边上，拼命抓住一根树枝，正要往下撸叶子，可恨那枝条猛地向上弹了起来，把又瘦又小的妈妈抛向空中落到下面的地里，生生把腓骨摔折了。从此后，妈妈连续三个月无法下地。父亲烦起来，仰天长叹，大骂老天爷。十二岁的我，只能陪着妈妈流泪。

长大后，我逐步认识到，造成饥荒的原因是：一、浮夸风，本来打不了那么多粮食，却要一级一级往上虚报，导致高征购，竭泽而渔；二、是浪费糟蹋，一九五八年风调雨顺，空前大丰收，但因全民炼钢，无人收割。这两条错误，将人民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听老人说民国三十二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灾荒如何严重，但比起大跃进后的两年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难怪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地方开忆苦思甜大会时，有不少发言者控诉起一九六〇年来。我亲历的，就有四五次之多。当然控诉者接着又遭到批判。

苦苦捱到一九六〇年，在包钢当大官的叔父来信要我和父亲到他那里去。顺便说说，早在一九五六年，我的二哥和姐姐已经到叔父家去了。他们的走，不是逃荒，而是为了逃避家庭纠纷。起因是自一九五一年大哥结婚后，家庭便无日不处在冷战之中，父亲忍无可忍，只好决定忍痛将两个孩子

送往本溪投奔叔父去了。不久，叔父调往包头，举家西迁。

如此一来，我们兄妹四人有三个跟着叔父，家中就只有妈妈和大哥一家了。我们姐弟三人的离去，使大嫂再无后顾之忧，对母亲也孝顺起来。父亲及我们三兄妹倒也放心了。

从一九六〇年春到一九六一年底，我在塞外度过了我人生中十分难忘的两年。刚刚脱离山沟沟，自然是浑身土气。在我就读的学校——包钢一小，一身土疙瘩的我与那些干部子弟自然难以融洽。他们都轻蔑地呼唤我“山东棒子”。我心中十分气恼，但还是咬牙忍着。心说：“总有一天，我会叫你们知道什么是受侮辱。”果然，到了五年级下学期，所有同学的态度均有了巨变。

他们不仅不再叫我“山东棒子”，反而个个都对我毕恭毕敬了。因为我的成绩连续两年都是全级之冠。我还成了全校少先队的大队长。一提起“三道杠”，他们无人不翘起大拇指。

同时，我还兼起了全班学习最差的一个同学的辅导老师。没承想，这个刺头儿调皮蛋，虽学习不中用，但在同学中却颇具影响，我拿下了他，就赢得了权威，赢得了青睐。

顺便说说，刚到包钢时，生活还算是不错。我自一九五八年之后，总算是吃上了第一顿饱饭。在叔父家，对我来说，简直是进了天堂了。我终于吃上了过去连想都不曾想过的好饭。

我终于零距离地与罗宾·汉式的英雄叔父相处了。叔父年有四十，中等身材，体态稍胖，方面大耳，鼻直口方，一身正气，刚正不阿。他是我人生的楷模。他慈祥和蔼，常常面带微笑，下班一进门，总要摸着我的脑袋，一口一个“小傻瓜”，亲切至极地叫着。我的心里，荡漾着融融的春意。

然而，这样的好光景不到一年，饥饿的瘟疫也跟着来到

了包钢。叔父已有四个孩子，加上父亲和我，全家八口人，按定量根本不够吃。于是，开始以土豆充饥。到一九六一年春季，大有断炊之忧。父亲看着叔父日益消瘦下去的身体，心疼地对我说：“三啊，你要长眼色，少吃点，多让你叔吃。他是咱家的顶梁柱啊。”

叔父响应党中央号召，把配给他的车封了起来，骑自行车上班，长驱几十里。星期天，他还领着我和二哥骑着自行车到乡下的田野里去捡甜菜叶子，到黄河边去捞榨草，用来充饥。与之相比，让我给辅导功课的那个小子家可就是两番天地了。他的爸爸比叔父还低一级，可我每到他家，总能闻到鱼肉香，馋得我喉头一上一下咯咯作响。同是党的干部，为何这样不同啊！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年级毕业。在升学考试中，我是全崑区的文科状元。这一下，学校炸开了锅。所有的同学无不肃然起敬。七月十日，在彩旗和鲜花簇拥下的包钢大礼堂里，座无虚席，歌声嘹亮，我校的毕业典礼在这里举行，我和我的叔父先后登台发言。我的发言，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欢呼声。相形之下，叔父就逊色多了。这位老革命居然穿着一身极不合体的工作服上台了。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这么庄严的时刻，老人家居然这么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真给我这个“状元”丢人现眼！然而，在这个崇尚简朴的时代，他老人家正是时代的楷模啊！对此，我咋晓得！

第二天，我受到了包钢教育处刘处长的接见。这位四十岁开外的女处长讲了无数勉励的话，令我激动万分。回到家，甭说，婶婶的溢美之词更是滔滔不绝。

于是，我被包头市的重点中学——包头九中录取了。

一进校园，那恢弘的气派就把我们一干同学都震慑了！她不像包钢一小那样只有十几排平房教室。冲大门的宽阔的

柏油甬道两旁，葱绿的修剪得分外整齐的密匝匝的冬青，热情洋溢地迎接新来的贵宾。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下，相对称地矗立着十座红色的教学楼，这才叫气派。想想我的转道小学，那还是学校吗？那时，流行一个词，叫“象牙之塔”，从此，我就算是钻进了“象牙之塔”了。没想到我这个一贫如洗、饥寒交迫的山里娃，也有今天！昔日那些给我白眼的家伙们，你们就羡慕嫉妒恨吧！我的班主任老师叫席仁林。操一口土气的“二娃子”话（“二娃子”是城里人对土著人的蔑称）。

刚入学，就迅速走红。我被委任为班主任兼学生会副主席。

然而，入学不到两个月，父亲突然决定回老家。

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初中生活才开始就要结束。但父亲迟疑着道出了原委：时值一九六一年秋，饥荒，也像瘟疫一样笼罩了包头。叔父虽是高干，但他已有四个孩子，加上我们爷俩，一共八张口，叔父日渐消瘦，粮食入不敷出，父亲做饭，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父亲无奈，只好决定一走了之。

终于，在九月初的一天，在叔父母一片唏嘘声中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

到达北京站，乘候车的当儿，我自个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仰望着巍峨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久久地凝视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心头澎湃着一阵又一阵汹涌的波涛。尔后，我驻足在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仰望着毛主席亲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闪闪发光的大字，心头既充满着对人民英雄的无比景仰，又涌动起对峥嵘岁月的深情缅怀。我立志发愤读书，健康成长，继承先烈的遗志，做共产主义的合格接班人。

经过两天的驰骋，总算又回到了梦绕情牵的故乡，见到

了我日思夜想的妈妈。

第一眼见到妈妈，她止不住地一个劲地抚摸着我的头，不停地揩擦着奔涌的泪水，同时也不住地为我拭泪。妈妈已过半百，两鬓已现斑白。但精神矍铄，尤其是见到了我，干瘪的嘴巴就再也合不拢了。

我迫不及待地找到过去的“一把连”，绘声绘形地给他们来了个“大话西游”。

出去两年，学了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和伙伴们交谈时，一时改不过来，于是被他们送了个绰号，曰“长脖大雁”。这大约也是因为长期挨饿脖子又细又长的缘故吧！

饥饿，仍然像瘟神一样威胁着每一个人。据说，我的一位族叔，因不堪饥饿，到生产队玉米地里偷吃生棒子，被保卫人员逮个正着。一向老老实本分的族叔羞愤交集，觉得无脸见人了，便一根绳子上了吊。圣人云：仓廪实，则知廉耻。试想，肚子填不饱，还顾什么廉耻啊！

有次在街上，碰见一位姓朱的老人，当街蹲着拉屎。拉不出来憋得满头大汗，无法，只好用小木棍抠，直抠得鲜血淋漓。真是惨不忍睹。今天看来，人们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味蛮干，必然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试想，如果不是一九五八年不顾实际地全民上阵炼钢铁，致使大批粮食烂在地里，能导致今天的惨剧吗？

好在，党中央毛主席认识了错误。于一九六一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相对于饥饿遍地、哀鸿满野的灾难后果而言，这一方针毕竟还是来得太迟了。

但这一方针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社员重新得到了自留地，允许垦荒，允许集市贸易，百姓的生活，到一九六二年春已有较大起色。

回来不久，我转入淄博十五中继续上学。它是座落在洪山的一所全日制中学。离我家将近三十里山路，在淄川区淄城东郊，是世界短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里。

我为何要跑这么远上学呢？这话得从头说起：一九六〇年我与父亲去包头，在那里办的是“无证落户”。即我在村里的户口并未注销，而包头却落了户。对此，担任大队长的大哥深感愧疚。以为干了违法的事，不敢在村里声张。而我手持的准迁证是市民户口，需落在城镇中学。因而大哥为我选择了淄博十五中。另外，选择十五中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大姑家离十五中极近，住在大姑家，方便。

但是，由于大哥的过分谨慎，我的市民户口始终未能落下，直至一九六八年前，始终是农民户口。一九六八年三月进入市革委后，方才转为市民户口，但两年后，伴随王效禹的垮台，又被赶回了农村。直到一九七一年初，就业于王村铝土矿，这才算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村，吃上了“皇粮”。

十五中虽也是国立中学，但气派比包头九中逊色多了。我心中不禁生出一种潦倒落魄之感。所幸的是，在这里结识了蒲泽同学。他是蒲松龄的第十一世孙。他的家，离大姑家不过百十米。他的父亲是蒲松龄纪念馆的馆长。这为我博览群书打开了方便之门。白天饿着肚子上学，夜晚饱读蒲松龄的经典，这对我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了。纪念馆的藏书甚丰，有原著，有白话文，有连环画。文言文读不懂，就读白话文和连环画。我沉浸于读书的快乐中。有时启窗夜读，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时不时与蒲泽会心一笑，令人陶醉，令人乐而忘记碌碌饥肠。

这种饥饿的痛苦与阅读的快乐交织在一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到寒假来临时便结束了，真遗憾。

原因是，我不能忍受在大姑家感受到的一幕幕。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第一眼便看到大姑拿着一根小棒在为三岁的孙女玲儿抠大便。伴随着玲儿揪心的哭嚎，大姑骂道：“禽他祖奶奶这个毛孩子！”“毛孩子”是谁不言而喻。可这话要传出去，就是现行反革命啊！目睹此情，我暗下决心：此地不可留了。

敦促我离去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我每两周一次翻越三十里山路回家背粮。父亲按每天一斤的定量给我称上一袋玉米，这就是半月的口粮。然而到大姑家是与全家一起吃。这些粮食，要掺上胡萝卜缨子蒸成菜团子，然后由一家人共同分享。你想，我十四岁，正值长身体之际，一顿两个梨子大小的菜团子，怎能压得住饿火！再说，早起上学，带着两个菜团子，人还没到校，在路上便吃光了，中午只好干挨饿。

为抵抗饿火，我只好与蒲泽一起去洪山集上花二分钱听说书。那说大鼓书的是一名四十来岁的妇人，伶牙俐齿，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声情并茂，说的是《说岳全传》。我听得入迷，忘记了饥饿，中午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于是，半年光阴就这样打发走了。

饥饿，虽可暂时被忘记，但饥饿却未忘记我。本来，我的身高似可超过父亲、大哥，然而，如同小树一样，正值需要肥水的时候，却时时刻刻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煎熬，所以长到164厘米，便再也不长了。

一九六二年初，我转到了本公社的一处中学。这是淄博二十六中田庄附中。在这里，同一寝室住了我们同村的三个孩子，一个叫邵厚荣，一个叫耿庆崇，寝室与灶间毗邻，黑咕隆咚。每当夜晚，我们三个孩子脱得一丝不挂，在大炕上敲打着锅碗瓢盆纵情欢跳，倒也其乐融融。

在这里又熬了半年，适逢教育体制改革。田庄附中合并到山下的淄博十四中。我被编入四级二班。这才意味着我的

初中生活的真正开始。因为在这之前，居无定所，频频转学，学习进度衔接不上，因而学习成绩均不起色。

来到十四中，情况不同了。入学不久，便被委任为班长，学生会主席，并很快加入共青团成为全校仅有的一名团支部委员。成为令人瞩目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一九六四年夏，毕业。父亲力主我考中专。因为上中专不仅不需家里花钱，还享受津贴。当我将家里的意思告诉我的班主任老师邵厚泉时，这位政治老师立即大为光火：“那样，你一辈子就完了。你的天赋，大学肯定不是问题，听老师的，还是考高中吧。”

按照邵老师的要求，我考入了淄博十八中。

我的中考成绩并不理想。原因是作文跑了题。当时的考题是“入学第一天”，不知为何神差鬼使，我将其写成了入学的一天，没有突出“第一”，但文章又的确不错，于是，市教育局指示招考办就我的作文评分问题组成了专门班子进行了评审，最后以及格进行了录取。昔日的文科状元，今天却仅仅及格，不亦异乎！

平静的高中生活开始了。

## 第二章 蒙胧的爱

因家中生活拮据，我的衣着堪称褴褛。高二伊始，我便身兼数职，班主任、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一九六五年，正是林彪倡导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如火如荼的年月。学校也经常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我多次被评为积极分子。然而我真正花大力气学习的，却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因为它不仅是学校党支部和团委极力推荐的。且读过几遍之后，感觉特别贴近自己，以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此外，我还狂读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的诗，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刻，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我崇拜保尔·柯察金、牛虻、江姐、许云峰那样的英雄。在这个英雄崇拜的时代，既不乏让人崇拜的英雄，也不乏崇拜者。这时，仿佛我也变成了英雄。第一个崇拜我的是一位女生——娇小玲珑的许凌。她来自鬼谷子的故里藏梓村。她的父亲是一名军官，在舟山东海舰队服役，母亲随军。她和妹妹跟奶奶在故乡生活。有一天下了晚自习，她偷偷塞给我一本书《战火中的青春》，我打开书，一张纸条赫然耀目。那是一首诗：

啊，  
你  
就是  
我心目中的英雄。  
你

虽无堂堂仪表，  
魁梧的身躯，  
但是，  
我爱你，  
崇拜你，  
你是我心目中的李铁，  
而我，  
则是愿追随你的许凤。

李铁、许凤，是该书中相恋的男女主人公。嘛，你瞧，这丫头，多么勇敢，多么直白！  
于是，我在朦胧的激情中，提笔写道：

好一个大胆的许凤！  
遗憾的是，  
我不是李铁，  
更不配成你心目中的英雄。  
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约伯，  
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可怜虫。  
放弃吧，  
放弃你的奇思妙想，  
步入人生辉煌的前程。

没想到，这种似拒又迎的诗歌，非但没能使许凌却步，反而更激起了她的热情。她总是变着法儿和我接近。比如，周六放学，她必邀我送她。我像做贼一样，直待她走的看不见影了，我才偷偷的尾随而去。

一次绝好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我

作为淄博学界的代表去济南出席了山东省首届学生联合会。并当选为省学联委员。会上，听取了省委书记刘秉琳的讲话，听取了团省委书记岳仲谋传达的毛主席与毛远新的春节谈话。毛主席的春节谈话，集中表述了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负担的教改思想。这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据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曾与“害死人”的旧学制抗争过，并受到过学校的处分。

听了这些鼓舞人心的谈话，心里不禁荡起一串串涟漪。这是第一次近距离聆听省委书记的讲话，更是第一次聆听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心里怎能不激动！

历时一周的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学校。学校为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邵长松书记、董雨川校长，均致欢迎词，对我给予了高度评价。令我汗颜。

可静静一想，我被当选为省学联委员，也给学校争来了荣耀啊！

深以为荣幸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许凌。

她对我越来越近乎。本来我是团支书，她是组织委员。工作上的关系就够近了，何况心中的距离更近呢？

不几天后，学校放暑假。全体师生均已离校，教室里仅剩下我们俩。日光灯下，我正伏案疾书日记。她悄没声儿在我的背上轻拍了一巴掌，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她冲我歉意地笑笑，红着脸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可以将心事告诉娘吗？”心事，我当然知道指的是什么。

她告诉我，要到舟山去探望父母。我吞吞吐吐说了一大堆祝福的话。最后，握了握手作为道别。这也是相识以来最亲密的一个动作了。这次不经意的握手，竟是永诀。

一个月后，她探亲归来，见到我，再也没有了往常的热情，眼光也总是躲躲闪闪。

暑假后，我收到她的一封信。一看，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红字：“斩”。我仔细辨认又放在鼻子下嗅了嗅，有一丝淡淡的血腥味。啊，这是血书！斩，毋庸置疑，自然是斩断情丝了。我犹豫片刻，用妈妈的缝衣针刺破中指，用火柴蘸着鲜血在那个斩字头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不”。

后来得知，此次去舟山，她遭到了父母的轮番围攻。

打这以后，我们变得陌生起来。她老远望到我，都要绕道而走。我亦如是。这场幼稚朦胧的恋情就这样收场了。

三十年后，我曾顺道去看过时已定居南通的她。已为人夫人妇的我们，所剩唯有同学的友谊而已。当年的热情，早已燃为灰烬了。

**第二部**

**十年文革**

## 第一章 狂飄為我從天落

平静的高中生活持续了两年。我已是全校出将入相的人物了。我身兼四职：班主席、团支书、校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头上还顶着个省学联委员的光环。

然而，一场暴风雨突如其来，打破了校园的宁静。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饭后，扩音器里传来教导处秘书周立训的声音：今晚八点，全体师生员工要在教室里、教研室里听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

八点，广播里，传来播音员激情澎湃的声音。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这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后来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字报，一经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举国上下，立即风起云涌。到处是欢庆的锣鼓，到处是人山人海的集会游行。学校，顷刻间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纷纷口诛笔伐，将锋芒直指校长董雨川及“一小撮反动学术权威”。

与此同时，各种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我们班，以翟沛功为首，成立了“贫协”，开始了横扫一切。

六月十日，中共淄博市委派出了以孔庆民为组长，王茂辉为副组长的工作组。正式进驻十八中。孔庆民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茂辉是市委党校副校长。工作组声势烜赫，不可一世。工作组发动的第一个战役，是对反党急先锋董文林、刘怀忠的围歼战。这两人均是我们高二级的语文老师。

当时，他们都不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龄不过二十五六岁。他们怀着一颗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响应党中央号召，首先在学校张贴了战斗宣言式的大字报，无非是向党表决心而已。并表示要争取火线入党。孔庆民抓其一点，不计其余，将两位老师的爱党行为说成了反党。孔庆民数次做动员报告，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并敲山震虎，暗示其他蠢蠢欲动的反党小爬虫，当心自己的爪子。一场大检举大揭发的横扫浪潮席卷大地。于是，假左派、真右派、野心家，反党分子、反革命、叛徒、特务、黑帮等等，一顶又一顶的帽子漫天飞舞，人心惶惶，处处岌岌可危，谁也无法预料究竟哪一顶帽子会在什么时候落到自己头上。

我完全陷入了惶惑，感到无所适从，前途渺茫。感到随时都会面临灭顶之灾。果然，为时不久，一顶“三董”，“修正主义好苗子”的帽子落在了我的头上。

“三董”者，三个黑帮也。自从批“三家村”以来，三，便成了黑帮的窝巢，即便不够数，也要凑够三，以便循经取穴，顺藤摸瓜，找出更多的分店，更多的黑帮。而淄博十八中说来也巧，校长董雨川，反党急先锋董文林，修正主义苗子董学诚，故构成了“三董”。在下最小，谓之董三，或曰董老三。要是在寻常日子里，送个别号，本无所谓，无非就是个排行嘛。但是今天，这个别号，却被赋予特定的政治含义。老三者，三号黑帮也。

在工作组的策划煽惑下，学校倾刻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什么假左派，真右派，什么叛徒特务，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花样不时翻新，巧立名目，不一而足。

很快，我便失去自由。白天，要向工作组交代问题，晚上，要向“贫协”汇报。凭心而言，我自己也不知道交代什么。学习成绩优异是何罪名。不消两周，我的问题升级了。

三代赤贫的我竟被诬蔑为地主羔子，被打成“黑五类”。当时，正流行着所谓“谭立夫路线”，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看着那些被编入正册的人趾高气扬。深恨自己为什么会被打入另册。但百思不得其解。瞻望前途，不寒而栗。我甚至不想再活下去了。只是被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我，就连自杀的机会也找不到啊！

不久，对凡被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人，开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六级一班的一位闫姓同学，把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一条腿的刘发远老师绑在烈日下暴晒，把一位精神病患者傅玉伟老师绑在树干上拳打脚踢。董校长被打成叛徒、三青团骨干分子，副校长王世增也成了叛徒。以下，依次是历史反革命刘兆新，国民党反动分子贾汝平，反动学术权威黄鸿飞，反党急先锋董文林，刘怀忠。黑帮学生，我名列第一。这些人均被编入黑帮队，剃成阴阳头（以头顶中心线为界一边剃光一边留发），被罚在烈日下拔草，直至到十几里外的山上用地排车拉石头，师道尊严被批成封建礼教，教学相长成了修正主义黑线，刻苦学习成了白专道路，成了读书做官论，遵纪守法成了小绵羊。像我这样出类拔萃的尖子生，自然是在劫难逃了。黑帮们在烈日下游街，还要高唱《黑帮歌》：“我是牛鬼神蛇，我是牛鬼神蛇，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攻，我要老老实实！”单调的旋律，短促的节奏，配上一串阴阳头，这男女混杂在一起的光怪陆离的队伍是一幅多么绝妙的画幅啊！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工作组授意红五类们杀向社会，开始了“破四旧”、抄家活动。我们班以翟沛功同学为首，被分成六个组。我所在的组来到位于淄川城郊的一个大户人家。据说这是一家闻名遐迩的“地主兼资本家”之家，涉嫌“四旧”的东西一定不少。查抄的东西，无非是一些旧书籍、

旧照片、旧钞票、旧服饰，还有不堪入目的裸照，另有数量不多的银元、金条、玉器等。所有书籍，均一火焚之。金银玉器物归原主。“文革”后的一些“伤痕文学”，把学生的抄家写成洪水猛兽，写成是红卫兵所为。这是肆意歪曲。事实上，抄家风横行时，红卫兵尚未出现。这股抄家风完全是“红五类”学生在工作组旨意下刮起来的。我当时是“黑五类”，噤若寒蝉，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

## 第二章 红卫兵运动

写到此，有必要将红卫兵运动的兴衰回顾一下。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即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的第二天，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第一次在大字报上公开使用了“红卫兵”这个名字。之后，一系列的中学红卫兵相继出现。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相继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文中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的工作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鄺桃生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他们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到底是不是反动的。”毛主席收到信后，当即回信道：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日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

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于是，这封信以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在全国不径而走。以致在像淄博十八中这样相对偏僻的学校里，在被严密监视的我的耳中，也听到了这些消息。我甚至看到了油印的红卫兵小报。我震惊着，狂喜着。八月三日，以“惊雷”名义，写出了“淄博十八中向何处去”的大字报。

大字报全文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之际，一小撮牛鬼蛇神从阴沟里爬出来，煽阴风，点鬼火，妄图将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我又以辩白的口气写道，“在这里，我要要求还我一个清白，澄清一切莫须有的罪名。我是贫农的后代，我不是什么黑五类。不是牛鬼蛇神，更不是右派，反革命。我要在斗争中挣脱掉身上的锁链，向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当时，我并没将矛头指向工作组。虽然已对工作组极其不满，但依旧将其视作党的化身。我可不敢斗胆反党！

当时，我已陷于绝对孤立。张贴大字报，全靠我一个人；

打浆糊，刷浆糊，搬梯子，往高墙上张贴。没一个人敢伸手相帮。我已有一个多月没洗过澡，浑身汗臭难当。头发未理，像一把破笤帚。谁也不屑瞧一眼我这副尊容，就连许凌也只能站得远远的，偷偷投来同情的一瞥。七月底的一天，我的二哥到莱钢出差顺道来学校看我，经过工作组允许后，哥俩在操场上溜达了半个小时。我目送他走出校门时，看到他不停地拿手抹眼泪。我心力交瘁，万念俱灰，放声大哭。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被作为中央文件通过。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左派代表列席。如山东的王效禹就在其列。“十六条”，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推向了极致。从都市到乡村，到处是“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执行十六条”的口号和标语。全国出现了“红海洋”。

八月中旬，工作组组建了官办的“红卫兵”御用组织，并选派两名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当八月二十日陈刚和高兴福作为受阅代表回到学校时，受到了工作组最高的礼遇。听着他们，尤其是高兴福得意的变了调的声音。内心真是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啊！

进入九月份，“破四旧”真正开始了，听说孔府，孔庙，孔林，均遭不同程度摧毁，位于十八中附近的大佛寺被官办红卫兵毁掉。这座始建于北魏时期的辉煌建筑以及释迦牟尼的塑像均被毁于一旦。小城里仅有的几条马路，也被冠以“反帝路”、“反修路”等等。对于这一切席卷“四旧”的风暴，我都被拒之门外。因为此时我还是“黑五类”，无权叨光，只好靠边站。

风靡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开始了。为适应这一运动，以我为首，串联了几个“黑五类”，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团

织——“云水怒”红卫兵。共八人，李本刚、李其坤、李志勇、翟慎孝、伊汉修、王昌贤、翟纯新，加上在下，共八君子。这个八人小组织在广播里一经宣告成立，在学校还真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这无异于右派翻天！

我这也算是自己解放了自己。我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是几个月来梦寐以求的，今日总算如愿了。不仅如此，大小是个组织，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公章，自己的旗帜。真是人心大快啊！

组织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晋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我们从张店火车站（现淄博站）挤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厢里，过道上，厕所里，甚至行李架上都挤满挂满了学生。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大超载！

经过七八个小时疲惫不堪的拥挤混乱之后，我们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接待站安排在西单附近的一位老太太家里。老人白发苍苍，慈眉善目，一进门，便和颜悦色地说：“小将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来了千万别客气，没啥好吃的，北京炸酱面，管饱！”

这已是十一月中旬，北京的天气真是干冷干冷。上面通知下来，毛主席哪天检阅还不确定，要我们耐心等待！

真是度日如年呐！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我们被早早喊起床。组织领导我们的，是两名海军战士。一大早，我们的队伍便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边。据说毛主席不再像前四次那样在城楼检阅。因为那样时间太长，毛主席已是七十三岁高龄，身体吃不消。于是，经请示毛主席同意后由毛主席乘敞篷汽车穿过广场像阅兵一样进行检阅。

这真应了列宁的话：“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的盛大节日”。

广场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红旗招展，歌声震天。每个人的心里，都跃动着一个共同的旋律：“快！快！”

下午二时，广播里传出“毛主席来了”的声音。广场立刻沸腾了。像雷鸣，似海啸。“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有节奏地响彻云天。个个孩子都像我一样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瞪大双眼，一秒一秒的期待着。三时许，毛主席站立着的敞篷车开来了，人群像海潮被军舰逼开了一样迅速涌向两旁，让车队缓缓行进。无数的目光，都集中于一点，去寻找自己的星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毛主席的车一晃而过。周围立刻响起一片骂声：“妈的，司机开得太快了。”看来没看清楚的不光是我自己了。但是，梦寐以求的愿望毕竟已经实现了——我见到了毛主席——这是一生中最荣耀的啊！

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毛主席第五次检阅红卫兵。这庄严肃穆的时刻已永远铭刻在我的心海里。我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骄傲啊！从此以后，再也无需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啦！

离开北京，下个目标是延安。

当列车进入郑州站时，“二七”大罢工英雄们的业绩蓦然涌上心头。当到达西安站时，西安事变的壮举立刻跃然眼前。我们从西安乘长途汽车到达延安。一颗颗溢满景仰之情的心立即融进延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之中了。我们参观了杨家岭的毛主席旧居，浏览了枣园风光，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瞻仰了宝塔山。那首雄浑的《延安颂》，不时回荡在耳畔。我无法按捺一腔激情，便在日记里写道：

滔滔的延河水啊，  
巍巍的宝塔山，  
长征的队伍来到此，

抗日的烽火靠你点燃。  
共和国的丰碑上镌满你不朽的业绩，  
亿万人民的心中永远把你怀念。  
啊，延安，你是革命的圣地，  
你是共和国的摇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我们将世世代代让延安精神薪火相传。

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尤其是瞻仰了毛主席旧居，我们无论是谁，都被深深地、深深地感动着。在那如此艰苦的岁月里，毛主席不仅指挥了那么多的军事战役，还写下了那么多的光辉著作。他所倡导的延安精神，堪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

下面的目标，应是遵义、井冈山、韶山、瑞金。但是，这时中央已号令学生返校，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放弃了这“免费的午餐”。试想，十八九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时节，放野了的心，说什么一时怎么也收不回来。

### 第三章 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我们按党中央的部署，陆续回到了久违的校园。说真格，一颗颗玩野了的心还滞留在串联路上。看到校园里杂草丛生，枯叶飘零，看到被破坏的窗扇在寒风中“咣当”作响，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啊！照这样继续革命下去，教育还能进行下去吗？大学梦还能实现吗？

大约一周之后，各路神仙纷纷回来。但学校已处于权力的真空。谁也不知道干什么，谁也不知道怎么干。后来，一位原名赵家盛，现改名为赵志强的同学发出倡议：将工作组孔庆民王茂辉揪回学校批斗。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打响了。经过中共淄博市委批准，孔庆民、王茂辉被揪回来了。表现最突出的要算是孔庆民：昔日威风八面，颐指气使，那是何等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如今落魄了，见到任何人都一律点头哈腰，一副十足的奴才相。我暗想，这人世的沧桑，真是瞬息万变啊，得志时，千万莫猖狂！

批判资反路线的首场批判会在中共淄川区委礼堂举行。承蒙赵志强高看一眼，我被安排在大会主席台上，并作首席发言。在一片愤怒声讨中，孔庆民被押上了批判台，俨然一只斗败的鸡。

全校最大的红卫兵组织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而我依旧是“云水怒红卫兵”。这次大会，还邀请了其他几所学校的红卫兵，礼堂里座无虚席。赵志强宣布开始后，我发表了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发言。

我讲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战士们：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以孔庆民为首的工作组，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压制不同意见，围剿革命派，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孔庆民倒台了，革命者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孔庆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台下口号高呼：“砸烂孔庆民的狗头！”会议在狂风骤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孔庆民出乎意料地躺在了台上。我们料定他是装死躺下，试试脉搏、鼻息均正常。为揭破他的伪装，待同学们走后，我与赵志强交换了一下眼色，略施小计问台上的其他同学：“我看老孔一切正常，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会一下晕过去。咱们都走吧，看还有没有落下其他同学。”他们都齐声道：没有了。约半个小时后，孔庆民一听静悄悄的，于是一轱辘翻身跃起，跨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家了。躲在幕后的我等不由一阵哈哈大笑，总算目睹了孔庆民的丑态。

之后，类似的批判大会又进行了多次。但是批判的锋芒已越来越钝，气势亦越来越弱，不少同学出现了厌战情绪，纷纷回家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与同学伊汉修同回了他的老家——龙泉公社尚庄大队

此刻，与学校相反，农村的革命倒是方兴未艾。在尚庄，围绕着对大队书记乔平方的不同看法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以杜希会为首。他的身后是在区委某部门任职的父亲杜运忠。他的组织名曰“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反乔派；另一派是以原团支部书记伊岱兴为首的“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是保乔派。杜希会的父亲是一位颇有派头的中层干部，可能他及他的周围的几个人在历史上就与乔平

方有宿怨。想借运动之机发泄一下。总部这边的支持者便是我和伊汉修了。我经过周详的调查研究，确确实实发现老乔的群众基础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老年人均赞成老乔。但由于部分人畏于杜运忠一起人的势力，所以有些人暗中属于总部，但明里却又是司令部的人。以致这两派看似势均力敌。但真正的多数是我支持下的总部。

因为我有着毛主席的天兵天将的称谓，故拥有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在历次辩论大会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司令部则溃不成军。

在这里，一切都按“十六条”规定十分规范地进行着。不用说武斗，即使辩论时再激动也不会戳对方一指头。在这里，进行的完全是说理斗争，双方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依据，申述己见，但仅以此为限，从未发生过激行动。

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全体社员集合开会，辩论乔平方的问题。因为杜运忠身为国家干部，本不宜插手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但他自恃有一部分老朋友作后盾，可以在村里为所欲为，有恃无恐。但事实上其在村里很孤立。我心中有了这个基本点，所以在辩论会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句句话掷地有声，博得一阵又一阵喝彩和掌声。而老杜则不停地擦拭前额的汗水。正值隆冬天气，气温在负8℃以下，其他人都冻得直跺脚，而杜却大汗淋漓。真热吗？

在一个多月中，白天同社员一起干活，晚上则与他们共学毛主席著作，心里觉得很充实。

这期间，虽身在乡间，但心依旧关注着形势的发展。

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到大队部去看新来的报纸。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载：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同时宣布夺权。1月11日，毛泽东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并表示承认上海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全国进入大联合夺权阶段。

1月22日青岛夺权，1月29日淄博夺权，2月3日山东省夺权。青岛及山东夺权均被承认，唯有淄博的“1.29夺权”，演绎成了一次大笑话。据说当时有一位参加夺权者抄了一大堆公章，竟不知往哪里放好了。

不管这些夺权是多么精彩，我均未参与。真正成了“桃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谈魏晋。”

## 第四章 “反逆流”运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我被赵志强召回学校。此时，学校已进驻了支左部队。军代表是一位马教导员。无独有偶，这位教导员完全是步工作组的后尘。凡在工作组时期受过迫害的，均在其打击之列。从市里传来消息，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于一月三十一日冲击了省公安厅，这便是著名的“1.31事件”。事件发生后，刚刚介入的部队便配合公安机关对“1.31”事件的参与者、追随者实施了大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再往高层说这股抓人风的风源来自中央。后来知道是一部分对“一月风暴”心怀不满的老帅在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难。于是，才有了全国各地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一系列事件。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二月逆流”。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时任山东省革委主任的王效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首先在山东刮起了“反逆流”的旋风。四月二十二日，我和七级二班的傅玉修同学来到济南，跟随山东大学的游行队伍参加了在济南体育场举行的誓师大会。这次大会，本是红卫兵师，亦称“黑字红卫兵”组织的一次反“二、三夺权”的大会。谁承想，会议刚刚开始便被山医和山师的两名红卫兵率先冲上台去，夺了麦克风强行发言。于是，“黑老保”精心策划的这次大会竟为他人作了嫁衣裳。目睹此景，我十分佩服这两位红卫兵的胆识，决心回校后也依样画葫芦，干它一家伙。

因为这一天是4月22日，从此以后，人们便以“4.22派”

称呼原来的“黑字红卫兵”，黑字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保皇派。这时，陶铸已被定为最大的保皇派，因此，保皇派——后来改称保守派——便应运而生了。

正当济南的“反逆流”如火如荼时，地处淄川小城的淄博十八中却仍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我还在军宣队的黑名单之列。赵志强等人据说与“山大主义兵”有联系，曾被区公安局几次传讯。以区人武部政委为首，抬出了部分区委的老干部、老劳模，于4月25日在淄博四中的操场上，召开了“联合起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誓师大会，规模空前。大会与济南的“4.22”大会同出一辙。闻此消息，我便与赵志强、王元海等商妥，由我带领尖刀队冲上台强行讲话，首先掌握大会的主动权。上午十时许，当宣布会议开始时，他们安排的发言人尚未走上主席台，我与王元海便捷足先登，占领了讲坛。我用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讲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后，我更加提高了嗓音：“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正不行，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荡涤尽旧世界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向反革命复辟的‘二月逆流’猛烈开炮，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会场倾刻大乱，浩浩荡荡的队伍，一下子作鸟兽散。会议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胜利而告终。我出尽风头，真可谓最扬眉吐气的一天啦。

“反逆流”斗争，可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保守派倾刻间土崩瓦解。在“反逆流”运动中，十八中始终是在毛泽

东主义红卫兵的旗帜下进行的。学校大大小小的组织十几个，于是各组织自愿削平山头，大家共同协议，按照巴黎公社原则，联合为一个组织—井冈山兵团。它是“反逆流”运动的产儿。

四月底，接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淄博分部通知，要我校派一名代表出席山东红卫兵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代表的资格当然非我莫属啦。在经过近一年的磨难之后，我总算又恢复到一九六五年出席省学联时的威望啦。

五月四日，我到市委交际处报到。初次认识了淄博五中“东方红兵团”的首脑人物曹在民。他是一个比我略高的英俊青年，和气儒雅，丝毫没有那些知名红卫兵领袖的傲气和跋扈。他是我们淄博代表团的团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代表团驻地——省委党校。

五月七日凌晨，我们被从梦中唤醒，集合完毕，曹在民在队列前讲道：“今天，本来是大会开幕的日子，但是一小撮丧心病狂的黑老保冲击了省革委。我们当然首先要为保卫红色新政权而战！会议议程另行通知。”

我们被带领来到离省革委大院不远处的一条甚宽的马路上。人行道上燃着数堆篝火，马路上，已集合了黑压压的人群。男男女女，都在三十岁上下。他们头戴安全帽，臂缠白毛巾。有的手里还拿着一截小木棍。估计他们应该都是工人。我们只好到路牙石上坐着等待任务，但直到十一点左右，前边的人群方骚动起来，稍倾，一辆辆载重汽车开过来了。车上挤满了头戴安全帽，手持短木棍的工人们，每辆车的车厢前面，都站着两个胸前挂着大牌子，帽沿朝后的“俘虏”。牌子上写着“小爬虫”、“变色龙”之类的名号。他们的双手还一律举着稻草，寓意为“捞稻草”吧。车队大约有百十辆，直到下午三点钟，方才过完。五月的阳光，晒得每个人

的脸上直冒油。每张稚气未消的脸都红扑扑的。宣传车的喇叭里响彻着“五、七大捷”的欢呼声和“造反有理”的铿锵歌声。

五月八日上午八点，“八一”礼堂座无虚席，在一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在王效禹、杨得志等人的簇拥下，张春桥、姚文元一身戎装走向主席台，前来接见山东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全场欢声雷动，凯歌嘹亮。在报幕员激情澎湃的声音里，省革委主任王效禹同志慷慨激昂地讲道：“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春桥、文元同志亲莅泉城，看望我们来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

春雷般的掌声再次响起。

张春桥这位来自巨野县的山东人，却操着一口地道的、动听的普通话：“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效禹同志说要我们作什么指示，我们没什么指示。我和文元同志只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前来看望大家，祝贺你们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口号声。举座均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其慷慨激昂状，毋庸言表。张、姚之后，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讲话。这位当年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以掷地有声的湖北口音慷慨陈词：“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作好四个支持，坚决支持王效禹同志；坚决支持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四大左派组织；坚决支持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杨司令年近六旬，今日容光焕发，精神矍铄，讲话博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口号响彻云霄。

五月九日下午两点，“红代会”再次举行大会，听取“五七大捷”的英雄杜春胜的演讲。杜春胜，省公安厅干部，现任省革委常委。此前，“4.22派”绑架了他。结果使他变成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大英雄。此刻，他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以大智大勇打败“4.22”头头们的英雄壮举。真是可歌可泣！可不久后，传说杜开枪自杀，原因是持枪犯罪，事情败露而自杀。笔者未经调查，只听传言，读者姑妄听之吧。但事后王效禹在另一次大会上讲到杜春胜时，只不过轻蔑地从鼻腔里哼出两个字：“小丑！”如此而已。

今天，“小丑”杜春胜的表演结束后，会议进入实质性阶段，由驻济各大专院校的代表介绍了各自的经验。最后一位发言者，深深打动了我。他就是山东农学院的代表国恕连。在此之前，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山东农学院，只是赖有“大鼻子”国恕连的讲演，它也跟着出了名。

国恕连以满腔怒火，控诉了资反路线对他的残酷迫害。当去年六七月份资反路线猖獗时，省委书记谭启龙指示泰安地委逮捕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大鼻子”。

“大鼻子”，是国恕连的绰号。来源就是因为他生有一个硕大无朋的鼻子。“大鼻子”这个绰号在山东叫得比他的真名还响。

言归正传。“大鼻子”的命运悲惨极了。一九六六年七月第一次被捕，母亲上吊。“二月逆流”中第二次入狱，妻子被逼疯。一九八〇年，他以“反革命杀人犯”罪名，被判处“死缓”。他的一生，多半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1992年获释后，我曾去泰安看过他，其后，他也曾多次来看我。我们两人意气相投，可谓惺惺相惜。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2004年，他因骑摩托车不幸遇难。

惊闻噩耗后，我痛心疾首，于万般悲愤中写道：

# 卜算子 悼亡友

鼻大惊齐鲁，  
嘴阔吐珠玑。  
英年豪气堪遏云，  
虎豹犹泣！

死囚笑囹圄，  
家破鬼神泣。  
壮志未酬身先死，  
岱宗空兀立。

在今后的章节里，还会讲到同他的交往。

这次“红代会”，还有项议程是对走资派的批判。所谓走资派，是指前省委书记谭启龙。谭在长征中不过是个“红小鬼”。身为封疆大吏的他，重权在握，本应八面威风，风光无限，可如今风光没了，威风也没了。等到被山师的两名红卫兵押上台来，竟是武大郎般的小矮子，鼻孔朝天，两眼暗淡，嘴巴下撇，宛如蛤蟆。倒是他的老婆严永洁，年已五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年轻时肯定是美艳绝伦的大美人啦！据说严永洁是陆定一老婆严慰冰的侄女，这裙带上的关系，不用说，就知道有多硬啦！

批判发言千篇一律，彼此雷同。不批尚可，一批，倒令我同情起谭启龙来了。他的罪状，无非是像刘少奇一样，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大砍“三面红旗”等等等。起初，我还怀疑我的立场出了问题：怎么和走资派穿一条裤子啦。随着批判的深入，进入到批判资反路线阶段，联系到工作组的恶劣行径，结

合自己的悲惨遭遇，方对谭启龙燃起一腔怒火。当山师的高士健发言时，谭启龙俯首帖耳，毕恭毕敬，不断回答问题，极其诚恳谦卑。我心里又对谭产生了同情心，反倒抱怨起这些红卫兵来。

五月十二日，历时一周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圆满结束。我匆匆赶回学校，传达完大会精神后，便被井冈山兵团派往市红卫兵指挥部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指挥部设在原市体委的楼上。学校还派了一名工作人员孙继海同学与我为伴。在1967年5月到年底这段时间里，是一段相对安定的日子，我的精力，全部花费在读书看报上。期间，广泛接触了“四大左派组织”的负责人。像红卫兵指挥部的孙元礼，秦玉海，王庆义、李军、张维海、徐涛、陈诚之、徐岩、张广超等。孙元礼，系淄博二中“造反大队”的领袖，时任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淄博分部总指挥，秦玉海、王庆义则是淄博五中“东方红”的头头，他们均是分部的常委兼作战部长、组织部长，李军是卫校的，是常委之中唯一的女性。除李军之外，这几个人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的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红代会”后，便再也未见曹在民到分部来。依照“四个支持”的中央精神，市里成立了“支左领导小组”，在“支左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四大左派组织”均被派遣了军代表长驻。上级要求过去支右的部队立即转弯。把屁股正过来。因为在“二月逆流”中镇压了造反派嘛。我们的军代表是4788部队的一位黄团长。他为人随和，说话幽默，经常给我和李军他们讲一些抗美援朝的故事，令我们津津乐道。所接触的“四大组织”领军人物中，我唯独对工人司令部的刘司令略有微词。此人一身霸气，一副盛气凌人，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人家可能因为是“二月逆流”中冲杀出来的“老造反”，而我不过是初出茅庐，自然不被放在眼里。在“驻军支左领导

小组”不时召开的“四大组织”联席会议上，红卫兵分部通常均由我参加。原因是孙元礼、秦玉海、王庆义他们，都是些坐不下的主儿，成天见不着他们的人影。常委中就只有我和李军常在分部坐阵。而李军又是女孩，不太愿意抛头露面，于是出席“四大组织”联席会议的代表就非我莫属了。我很快接触了众多的朋友。像工人司令部的刘国忠，傅立先，郭家兴，贫下中农司令部的刘传伦、路慎密，文艺造反司令部的李忠孝，王恕忠，市直机关造反总部的王在新，《淄博日报》造反总部的韩克生、李长俊、苏少田，市公安局造反总部的魏裔荣、梅孝武、杨作乐等等，应当说，这些人均称得上淄博市的精英名流了。与这些人耳濡目染，很快增长了不少见识。

现在，时间是充裕的。现在的山东、淄博，就是“四大组织”的天下。三月十六日建立的市革命委员会已伴随“反逆流”运动而自行垮台。因为这个诞生于“二月逆流”之中的“三凑合”政权，作为其中的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的革委会主任李诚，到处支持造反派，所以这个“3.16”政权不到一个月便夭折了。现在代表革委会发号施令的，便是“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及其支持下的“四大左派组织”了。因而，这种形式的联席会便时常举行。使我有机会不断广泛地接触着彼时的上流社会。

在这些频频的活动中，我认识了4788部队的师长顾良、政委郭勃然。应当说，他们两人是把我推上文化大革命圣坛而且再也没有走下来的人。

在这些所有的造反派头面人物中，唯有我，称得上言必称马列、出口成章的人，且由于平时博览群书，又有多年在学校的登台演讲历练，因而总在这种场合博得头彩，深得顾、郭两位首长的赏识。

## 第五章 “反复辟”运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发生了一起“保刘翻案兵”冲击《淄博日报》社，继之又冲击“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事件。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为我的上升创造了条件。

事情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前市委书记刘干，受省革委主任王效禹之命，负责对淄博的“3.16”革委会实施改组。刘干依靠“四大左派组织”和市人民武装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反复酝酿，初步确定了一个革委会组成名单：由刘干任革委会主任。以下副主任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红军老战士沈超；工人司令部司令刘怀德；红卫兵分部总指挥孙元礼；常委委员若干人。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刘干改组市革委，既未同“3.16”革委会主任李诚商量，也未召开革委会全体会议，这样做实际上等于推倒重建，是不是有违省革委及王效禹的指示，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刘干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如此，刘干撇开了当时在“反逆流”中崛起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魏裔荣。魏虽不是什么“四大组织”的头面人物，但却深得顾良、郭勃然的赏识。说来也巧，刘干组建市革委时，“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由顾良任组长。这样一来，刘干的组阁便注定了流产。顾良从此一头扎进“四大组织”的营垒里，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先将以刘怀德为首的工人造反司令部架空，由其下属的五大分部“自发”将刘怀德轰下台，建立起“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相继，红卫兵分部的首领们因为久不视事。所以分部便事实上成了我的地盘。尽管当时我羽翼

未丰，号召力还不够强，但由于军队首长的支持，我成为红卫兵分部的领袖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反逆流”中形成的造反派组织，在这两大组织分裂之后，其余的两大组织也就形同虚设了。均由“支左小组”扶植起来的傀儡所代替。以刘怀德等人为首的“老造反”被指控为“保刘翻案兵”。由于“支左小组”扶植工人造反总指挥部，故山东铝厂的张复生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我在红卫兵分部也迅速走红，尤其是召开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后，我的地位确定下来了。自此以后，“支左领导小组”领导下的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员发生了变化：工人代表张复生，红卫兵代表董学诚，“贫司”的代表（即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代表）路慎密。外加市直机关造反总部的代表王在新，市公安局造反总部的魏裔荣。复活的僵尸“3.16”革委会主任李诚。“保刘翻案兵”的势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强大，但由于前者有部队做强大后盾，这就意味着“保刘翻案兵”的必然灭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原“淄工司”司令刘怀德在继冲击《淄博日报》社之后，又相继制造了新华制药厂的停工停产事件及冲击“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极大地激怒了顾良、郭勃然等驻军首长。冲击报社的原因是由于《淄博日报》全文刊登了一篇《妖为鬼蜮必成灾》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系统揭露了一直潜在的一股右派翻案的暗流，而组织、支持、策划这股势力的后台居然是前市委书记刘干。文章发表前，“支左小组”及僵尸革委会已组织了专案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入调查。负责专案组的是市公安局造反总部的王志端。将刘干列为右派翻案的总后台，从而又将刘干的“篡权复辟”活动串联在一起，而为这两件事推波助澜的，则是以刘怀德为代表的极左势力——“保刘翻案派”，他们自称为“1.29”派，而将与之对峙的在“支左小

组“卵翼下的“淄工总”、“红卫兵分部”、“红文司”、“贫司”等称为“3.16派”。事实上，无论“1.29”也好，“3.16”也好，都未能客观地，科学地反映出事实的本源。事实是两派原来均是造反派，仅仅因为刘干问题发生了争议而最终导致分裂。客观地说，“3.16派”应是“二月逆流”中的保守派，像济南的“4.22派”那样。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拥有了“保刘”、“翻案”两顶帽子，他们就不能不面临灭顶之灾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为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省革委组织各地驻军支左首长及“四大组织”头头到济南学习。代表团成员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顾良，“3.16”革委主任李诚，常委翟慎德，委员郑峰旺。领导干部代表刘干，“淄工总”的张复生、张惠仁、李长发、孟珍，“红文司”的代表李忠孝、胡××，我代表红卫兵分部，市直总部王青山，《淄博日报》社总部韩克生、李长俊、市公安总部魏裔荣。在为时两个多月的学习中，我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饱学。在频频的发言中，我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列，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精彩的演绎，把全班的学员惊得目瞪口呆，抗大毕业的李诚、李国栋，啧啧称赞，刘干也自叹弗如，更莫说顾良师长了。他深深地喜欢上了我这个“难得的人才”。

有天晚上，魏裔荣神秘地对我说：“刘干失踪了。”之后，魏又招呼起已经入梦的学员，拿着手电筒找遍了省委党校的所有角落。事实上经事后获悉，刘干不是失踪，而是被捕了。事情是这样的：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顾良、李诚、魏裔荣连同刘干专案组向王效禹作了汇报。王效禹当即指示“刘干既然已经篡权到手，五分钟就逮捕他。”执行逮捕的

是淄博市公安局，魏裔荣当然完全知情。令人费解的是，他又为什么虚张声势地让人到处寻找呢？次日，淄博的大街小巷便布满了刘干被捕的消息。随之，“保刘翻案兵”的末日来临了。十二月十一日晚，在“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朱克勤副师长的主持下，召开了围歼“保刘翻案兵”的“四大组织”头头会议。会议决定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组织全市工人造反派、“文攻武卫”战士包围“保刘派”的大本营——山东新华药厂机修车间。

事情的起因应该是，刘干被捕后，“保刘派”预感到“树倒猢狲散”了，所以，他们孤注一掷，进行了最后的反抗。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极不明智的。先是冲击报社，冲击“支左领导小组”，继之又制造了新华药厂的停产，“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这一下被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抓个正着，名正言顺地组织了这场“12.12”围歼战。当然，所谓“围歼战”，并非是肉体上的消灭，主要是舆论的力量。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十几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冲着机修车间的院墙声嘶力竭地喊叫，向他们宣传政策，播放“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接着潮水一般的“文政武卫”队员手持短棍将刘怀德苦心经营的这座“固若金汤”的大本营紧紧包围了个密不透风。到上午十时许，“大本营”开始松动了，有人开始投降。刘怀德被从一下水道中揪了出来。在经过一阵拳打脚踢将右腿打折之后，遂即被架上卡车，开始了手举稻草的游街示众。“12.12”事件以“打刘派”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此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又组织了1968年的“1.9”事件，对“保刘派”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经过这两次打击，“保刘派”算是土崩瓦解了。昔日不可一世的“淄工司”司令刘怀德，成了“文攻武卫”的阶下囚。

这场所谓的“反复辟”运动事实上是由王效禹一手制造的。是他，授意刘干改组市革委，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将刘干依据他的旨意进行的组阁污蔑为篡权，由此可见，王在两年后被康生、陈伯达抛出来，也算是咎由自取，这仅是淄博一例而已，我想，其它地市亦大抵如此，当然，修正主义上台后对他的残酷迫害则需另当别论了。

王效禹在“二月逆流”中还迎合右派镇压了造反派，但是，纵观其全部言行，还应肯定他在文革中的特出贡献，他仍不失为文化革命的英勇斗士。不失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 第六章 走向圣坛

一九六八年二月至三月中旬，山东省革委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大会”（简称“省革代会”）。事实上，这是一次实现全省全面夺权的大会。在南郊宾馆，我被安排与顾良师长住一个套房。

在此期间，围绕着淄博市的权力再分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红卫兵，文艺界，贫下中农倒没什么，最令顾良棘手的是工人啦。“淄工总”的张复生、张惠仁等，都自视功高，老子天下第一。他们要官、要权，适得其反。顾良一怒之下，把他们统统抛在一边，另择贤才。他命令他的机要科长张大栋到基层去物色人才。终于，张科长从《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发现了一个名叫牛光春的工人造反派。此人所在的工厂叫王村耐火材料厂。这是一家远离市区的省属企业，未介入市里的运动，因而也没有受到派性的干扰。据报道称该厂革命生产搞得都不错。这篇报道到了张大栋手里，他如获至宝，立马向顾师长作了推荐。顾大喜，连夜召开支左领导小组会议。

遵照省革委王效禹对淄博市革委要进行“充实调整”的四字指示，确定：主任：顾良，副主任：李诚、陈宝玺、牛光春、董学诚、魏裔荣；常委：翟慎德、路慎密、张复生。班子报省革委批准后，即刻投入运营。

可怜，在“反复辟运动”中立下汗马之功的张复生、张惠仁等，本想一步登天，却没承想弄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张复生虽弄上了个常委，但离原来的梦想相差甚远，张惠仁

则一无所获。可恨的是，名不见经传的牛光春却一步登天。他们越想越恼，于是暗中策划，组织工人组织进行了一次次“逼宫”，这更加激怒了“支左小组”，顾良略施小计，便一举将其粉碎了。

至于讲到我，在决定命运的“反复辟运动”中，我并无尺寸之功。甚至没有红卫兵分部的另一名常委——淄博卫校的一位女生李军的声名显赫。在“1.9事件”之前，以秦玉海为首，将李军劫持到支左小组门前，进行了殴打，野蛮地撕去其一绺秀发。为此，李军声名鹊起。而我之所以青云直上，全凭一张利嘴。因之，在干部群众中赢得一片喝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顾良及“支左小组”的支持。

“省革代会”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结束。省革委对淄博市革委班子的批件已经下达。顾良紧急部署，以便在行将到来的“3.16”夺权一周年之际宣布经过充实调整之后的新政权的诞生。

说真的，“3.16”夺权，我对此也深感不光彩。因为它分明就是“二月逆流”的产物。这个政权诞生时，我辈尚在白色恐怖之中，没承想今天反要叨它的光！不管深感蒙受耻辱也罢，“三凑合”也罢，但省里既然承认它，有什么理由去推翻它呢？

三月十二日，依样画葫芦的“市革代会”召开了。三月十六日，在市委交际处礼堂召开的“淄博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我以崭新的面孔，以最小的年龄和最有前途的接班人形象出现在闪电般密集的镁光灯和人们的欢呼声中的时候，我的心陶醉了，眼睛湿润了。就座之后，我没去留意顾师长那磕磕绊绊的冗长的讲话，陷入了深沉的思考中。学生时代，我只一心钻进“象牙之塔”，想成为一名文豪，并为此而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啊！“文革”开始后的“黑帮”

生涯，曾使我受到致命的一击：理想破灭，前途渺茫，彷徨过，沉沦过，面对残酷的现实，绝望中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但是，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风暴将自己推上这个圣坛的时候，几经曲折的我，最终还是胜利了。我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老人家从资反路线的牢笼中拯救了我。我感谢我的恩师董文林先生，是他在“反逆流”后的寂寞岁月里，让我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而勇敢地坚持了下来。我感谢顾良师长、郭勃然政委，是他们发现了我，提升了我。我尤其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健全的身体，一颗聪明睿智的脑袋。因而，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感情，一下子可怜起父母来：他们茹苦含辛地把我养大，真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们那种像畜牲一样的生活了。我不仅可以在人前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而且从今后也永远不会再像他们那样猪狗不如了。我想到了妈妈那摔折的腿，那一层层褪皮的脸。想到了父亲的驼背，那蹒跚的脚步，那折磨得不得不终年卧床的胃病。

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倡导的革命的“三结合”实行的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老爷。只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资，而且不能脱离生产。

革委常委中，除军人、干部外，还有工人代表牛光春、张复生等，他们都拿原来的工资，农民代表则还是挣工分，唯有我是学生，没有工资，没有生活来源。经过常委会讨论后，以 22 元学徒工的工资为我定了级。鉴于此，我想到了一九八一年“改革开放”后，某些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威人士曾一度提倡“高薪养廉”，可悲的是，后来的实践证明，高薪实行了，贪污腐败却愈演愈烈。而在当时的革委会里，拿着区区 22 元的我，何曾有片刻想过去占公家一分钱呢？出差在外，公钱私钱分装，从不混淆，公私分明，两袖清风，

一尘不染。由此可见，这不仅是政治制度问题，而且是世界观问题。试问，如果不是“文革”失败，如果将这一巴黎公社原则坚持下来，中国现在的官场会变得如此腐败黑暗吗？

我搬进了交际处过去市委常委们住的独立的小院，与顾师长对门。顾已是年近50岁的人，为了节俭，也为了不搞特殊化，出门上街一概骑自行车。看到师长如此身体力行，有谁还敢越雷池一步！

三月十六日夜，我躺在东风旅馆柔软舒适的床上（市革代会住宿在这里，这也算是当时最高档的宾馆了。）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了。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他们的心事。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早在读高一时，父亲便多次托媒为我找对象。说的是本村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姑娘，但为我拒绝。可怜的老人一脸无奈，唯剩下叹息而已。我当时的心思是：红袖添香夜，金榜题名时。一心一意追求的，是成名成家，岂有其他心思旁骛！而今天，不同了。虽非金榜题名，但毕竟已步入仕途。这仕途虽前途未料，但革委会毕竟是党中央、毛主席提倡的新生事物，并且还有解放军做支柱，应该是没有风险的。我所不能理解的，是毛主席如下一段话：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建立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利机构。这个权利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其它字句没异议，唯独对这“临时”二字颇感迷茫。临到何时，“临时”结束时，又当以何代之？像我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当然不懂得这类政治术语。当然不理解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试想，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任何权力机构，都应隶属于党的领导。党让你临时，你就是临时，革委会不过是旧党委到未来的新党委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已。当党不需要你的时候，你也就只能像穿过了时的旧衣服一样被扔进垃圾

堆了。但我当时并未想得太多，不管怎么说，现实已经将我的命运改变了。

想到这，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考虑自己终身大事的时候了。我逐一排查了一遍淄博十八中的女同学，觉得许凌重归于好已不可能，其余，还真没合适的。突然，我眼前一亮，想到了在红卫兵分部见到的那个淄博五中的女红卫兵战士柳杰。她当时属于五中“东方红铁军兵团”，归韩发尧旗下。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便禁不住将其从头到脚多看了几眼。一种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的感觉油然而生。第二天，我曾向韩发尧打听过她。但韩似乎并不看好她，劝我不要与其交往太深。但是，当夜躺在宾馆的床上反反复复不能入睡的时候，她那玲珑可爱的样子，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使我激动不已，难以成眠。于是，我大胆决定，先写信约她一下，看她能否来找我。

次日一早，我写了一封短信，按韩发尧提供的地址给她寄出去了。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时许，柳杰如约而至。我装模作样地询问了一通韩发尧、曹在民等人的情况后，了解到她是一九六六届的应届初中毕业生。问完这一切后，陷入一分钟的沉默，双方稍显尴尬。我开始打破沉默，直奔主题，提笔在摊在桌上的一张白纸上写道：“我爱你。”她先是一怔，紧接着脸红了。

我紧紧盯着她那双秋水般脉脉含羞的眼睛，期盼着。片刻，她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才十八岁呀，而且爸妈…”

我站起身，凝视着宛若临风玉树般的她，也结巴着说：“你想想，不用急于回答我。”

过了两天。这两天就像一个世纪。三月二十二日下午，我房间的电话响了。是她！她答应晚上见我。我不禁一阵狂喜。

晚，当我们第一次漫步在市委交际处的花丛中的时候，我的心陶醉着，但却没有勇气碰她一下。月光朦胧中的她，也是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儿。

于是，从这一刻起，我们步入了历时三年的恋爱之路。但说句真心话，说来读者肯定不会相信，三年中，事实上我们只是在进行着一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当然，有过牵手，有过拥抱，有过热吻，但仅此而已。我不是柳下惠，也不是没有过非分之想，但一想到我的政治前途，便噤若寒蝉啦。在当时那种视男女之情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的社会氛围里，若未婚先通，轻则批斗，挂牌游街，重则入狱，劳动改造，真是令人不寒而栗。鉴于此，我俩无论是谁，都坚守着童贞。直至三年后分手，仍为处女处男。

这一切，用现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看来，简直无异于“天方夜谭”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当事人均已步入老年，既然是回忆过去，那就用不着粉饰。这确实是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活生生的真实。并非我们是圣人，而是时代使然。这就是我们的道德观，它远远胜于古希腊犬儒派的哲学家们不知有多少倍！

淄博市“革代会”结束后，各区的革委会相继成立。市革委常委例行分工，我分管宣传口，包括文教卫生。这相当于过去市委宣传部长的职责。于是，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忙了起来。我不停地召开会议，讲话，发文件，俨然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了。当然，所做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还带领宣传组的韩兴斌、钟读祥等不断地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我们曾一起来到海拔 700 米的博山区池上公社的大寨村。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连饮用水都得靠两个肩膀从山下往上挑。我们挨家挨户走访。每到一处，韩兴斌都要把我给当地干部群众介绍一番。听者

无一不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在他们看来，像我这样的“大官”有谁愿意光顾这飞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别说是区里、公社里的干部，他们也难得一见啊！

韩兴斌是一位老资格的宣传工作者。任过市委秘书长，笔杆子十分了得，作宣传工作很有一套。但自与我接触后，老韩仿佛换了一个人。据说，他以前十分专横跋扈，但现在竟如此谦恭。他逢人便将我如何有理论素养大侃一通。搞得我坐立不安。事实上，老韩可不是有意拍马逢迎，而是真心崇拜我。他常常引用林彪的话自勉并勉励别人说：“像现在十七八岁的娃娃，能讲我们这些老家伙讲不出来的话。董学诚同志就是一面最现实的镜子，他的水平，我们望尘莫及啊！”

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毛主席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我被派往夏庄煤矿下井劳动。周一早乘公交车长驱四十公里去上班，周六下午乘车赶回机关。其余时间均吃住在矿上，与工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三个月的劳动中，我并不是仅做做样子，而是真正遵循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教导的那样，老老实实地放下架子，诚心诚意向工人阶级求教。

在这里，我才真正体会到，诚如毛主席所说，虽然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只有他们才是最干净的。

但有一点难以苟同的是，这些穿着散发着汗臭味工作服，满脸煤屑的工人，一年到头生活在没有异性的黑暗的世界里，他们的嗜好，只有两点，一是喝酒，一是谈女人，尽是裤腰带以下的脏话。乍一听，我很不舒服。这哪里是伟大的工人阶级！活脱脱就是一群寡廉鲜耻的流氓啊！但是，三个月下来，习惯了，反倒觉得听不到他们这些脏话不自然了。是啊，这是真实的人性的大释放！谁让他们一年到头不接触

异性呢？这些人多来自贫困的鲁北地区，只有一年几天的探亲假方可回家乡与妻子团聚，用他们的话说，正所谓“旱煞时旱煞，涝煞时涝煞”，性生活实在不均匀，“旱煞了”，难道还想把他们的嘴封死吗？

一九六九年元旦后，回到机关。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从省到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复旧”运动。

## 第七章 “反复旧”运动

这次“反复旧”运动，事实上是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否定。

一九六八年夏，发布了毛主席最新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于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战役打响了。如同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样，运动首先从淄博五中拉开序幕，将那些“国民党残渣余孽”全部揪了出来拉上大街游街示众。都是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了，他们都身经百战，面无惧色。与文革初期不同的，这一次领导运动的，已不再是工作组，而是换成了革委会。但不管由谁领导，这些“老运动员”都难逃厄运。所不同的，是工作组并未清理到自身，而这一次，因为牛鬼蛇神钻到铁扇公主肚里去了。这就不能不牵连到某些革委会成员以及他们所依靠的造反派组织。这是对新生政权的致命威胁。

《红旗》杂志曾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里夹杂着四个字：“反对复旧”。于是，一向嗅觉敏锐的大左派，山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便像当年“反逆流”一样，率先在山东全省吹响了“反复旧”号角。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济南发生了一起闻名全省的“四根油条”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济南市革委常委常山林，一天早上去大

明湖畔一家早点铺买油条，但人多需排队，常山林觉得未免掉价，挤到前面抢买。但卖油条的姑娘马国莲不但不卖给他反而大加呵斥。常常委一股无名火燃起：“老子是市革委常委常山林。”小马一听，寸步不让。如果此事当场平息，也便罢了。然而无独有偶，有好事者将其捅到了王效禹那里。王主任怒不可遏，在来函上批示道：“此风断不可长。这是一种国民党作风！”并立即通报全省。旋即又将常山林逮捕入狱，以为效尤者戒。

为常山林鸣不平的，有济南市革委副主任杨恩华、常委马传香。王效禹听闻后，大发雷霆，下令将杨、马统统关了起来。于是，“四根油条”事件演化成了“杨、马、常”事件。而“油条姑娘”马国莲则登上了济南市革委常委的宝座。时人戏称为“油条常委”于是，“油条常委”迅速誉满齐鲁大地。

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在淄博，被王效禹誉为“跟上靠下”榜样的顾良主任，便一心想在全市迅速掀起反国民党作风亦即“反复旧”的热潮并尽快抓出一起典型案例。事有凑巧，市革委副主任魏裔荣正在淄川区农村督导清理阶级队伍方面的工作。魏以警察的敏锐嗅觉，迅速捕捉到了淄川区萌水公社前坡大队的严重情况。时值“清理阶级队伍”方兴未艾之际，大队革委会主任、原党支部书记胡润基将一名叫孙玉兰的姑娘挂上破鞋在全公社范围内游街示众。此事一经被魏裔荣捕捉到，立即汇报了市革委顾良主任。顾良如获至宝，对老魏大加赞赏。当即指示淄川区革委主任郑超然火速处理此案。郑超然奉若神明，立将胡润基等三人逮捕入狱。这成了全省“复旧”、“镇压造反派”的典型。不言而喻，孙玉兰自然成了家喻户晓的女英雄。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山东代表团起了内讧。以泰安地革委副主任、“九大”代表国恕连为首，向王效禹发难。这一下首先引起了相当多的反王效禹、反“文革”势力的共鸣。最起劲的，当然是济南军区的反王派。最终，在陈伯达、康生主持下，定了调子：山东王效禹的“反复旧”犯了带方向性的错误。王效禹的悲剧由此开始。康生此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王效禹本是康生发现的左派，现在翻脸不认人。他指斥王效禹为“资产阶级政客、反革命两面派”。这难道这不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吗？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以杨得志、袁昇平为代表的军区右倾势力，却对“反复旧”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否定王效禹全盘否定山东文化大革命。

“九大”后，下达了中共中央9号文件，即“批示”“十条”。文件重申了康生、陈伯达的讲话，王效禹“四个第一”、“七个委员”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一场清算王效禹的运动，实质上是“秋后算账”的运动开始了。

那些被淘汰的保守派和军内的反文革势力勾结起来，向以王效禹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展开了疯狂的反扑。这是真正的阶级报复。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复旧”，或曰“复辟”。

又是一个十月，又是一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然而这个学习班，是以全面围剿造反派为目的的学习班。领导这个学习班的，是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军内保守派。他们是杨得志，袁昇平、李水清、李燧英等人。后来的实践证明，前面两人是跟林彪上了贼船的。李水清是67军的军长，现在是济南军区副司令。其在“文革”反逆流运动中，曾是支持造反派出了名的左派部队67军的军长。他支持青岛“1.22夺权”、支持山东“2.3

“夺权”。但时过境迁，此人现在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终于寻到了军人的用武之地。

学习班名为党校性质学习班，名为以党性取代派性，名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围剿资产阶级派性，实质上是以保守派的派性围剿造反派的派性。简言之，即以反文革派围歼“文革派”。

在学习班上，假借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指示围剿革命派。这所谓“斗私批修”，也就是尽力丑化自己，否定自己。我观主持者的本意，是借人人否定自己，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终目的。凡登台演讲者，必须痛哭流涕，方见真诚。

我的“斗私批修”非发自内心，是违心的。但潮流如此，莫可奈何。于是，假惺惺地用手绢抹了几次眼睛，总算侥幸过了关。

学习班进行了一个月时间，不知从何处刮来一股打油诗的旋风。首先是针对省里的，道是：

山东大地坑连坑，  
黄河两岸铁壶声；  
大明湖畔卖油条，  
青岛路上卖花生。

未跻身山东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解其意的。听在下慢慢讲来。

第一句，“坑连坑”者，侮辱王效禹也，因为王效禹是麻脸。第二句“铁壶声”暗指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因为韩不是产业工人，而是打白铁的。第三句，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即“四根油条”事件。第四句，是侮辱当时的青岛市革委主任杨葆华。

不多时，不知哪位才子又给淄博画了脸谱：

淄博大地刮旋风，  
四只眼的成了精；  
光绪皇帝骑毛驴，  
后面跟着小书生。

首句，暗喻市革委副主任魏裔荣，因为，自“反复辟”运动之后，魏裔荣被称为“公安老转”，意即见风使舵，转得快。二句“四只眼”，指魏裔荣及顾良的机要科长张大栋，秘书何体新。后两人虽不是什么政要，但均属顾良智囊团的人物。他们均戴眼镜，故曰四只眼。“光绪皇帝”喻指市革委第一副主任李诚。因为是军人说了算，身为前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只能当个“光绪皇帝”。最后一句“小书生”者，即为在下也。好在在下无什么劣迹，没有污蔑之词，仅书生之谓也。

军队干部单独学习。表现最为活跃的要数驻淄博的济南军区后勤部第十二分部的部长杜永隆。在几次全体学员大会上，杜永隆上蹿下跳，神气活现，表现出少见的飞扬跋扈。

一方面在政治上通过学习班、通过围歼派性解除了学员的思想武装，一方面在组织上对省及各地市的革委会班子进行了大清洗。省革委大换班，王效禹不用说了。王效禹以下，原班人马全部清洗掉，全部换成了军人及靠边站的老干部。真是，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次大换班，再好不过的证明了毛主席上述论断的正确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利用“批示”、“十条”为幌子，巧妙的实施了全面复辟。只差把谭启龙请出来任书记了。

学习班于1969年12月底结业，我们这千人一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

我回到市委交际处常委院。院内枯枝败叶，一片狼藉。我的卧室门锁被撬，被褥被仍在院里，书籍被撕的撕，踩的踩。这与电影里所看到的国民党溃败时的情景何其相似乃尔啊！

几天后，接新的市革委办公室主任孙质亭通知：我须立刻回乡，政治上仍享受副主任待遇。但无论如何诡辩，反正我的政治生涯是到此为止了。转了一圈，终于又回到了原点：你还是农民的儿子！

然而，我并不服输。我先是将户口去公社落下，继之便背着简单的行囊回到了老家，我梦绕情牵的故里一转道村。

这时的我，还有点阿Q精神支撑着自己。竟把自己的回乡称作“下放劳动”，言外之意，我还是上边的人，下放只是暂时的。但我比谁都清楚，我从此永远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了。

事实上，正如康生所说：“反复旧的版权归王效禹”。在这里，我要说，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恰恰证明了王效禹的远见卓识，证明了他对继续革命理论有着常人所无法企及的理解。试想，当时正值走资派及右倾保守势力利用清理阶级队伍之机向造反派肆行秋后算账之时，王效禹明察秋毫适时揭穿了敌人的阴谋，给正在兴起的“复官运动”迎头一击，可见，毛主席并没看错王效禹，只可惜王效禹人微言轻，对付不了康生、陈伯达一类重权在握的大鳄。尔今效禹同志已经作古并由此而怀终天之恨。悲哉，王效禹同志！我辈岂不为之扼腕！但可惜，“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 第八章 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3年7月，我与山东省各地市的常委及省革委委员以上的部分成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前厅的上访汇报。这次上访汇报之核心的内容便是清算清查“五一六”的错误及罪恶。特别是临沂、潍坊、济宁、菏泽的同志，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控诉了这一运动的血腥性。这便是假借清算王效禹的错误而导致的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逆流的延伸和发展。重新上台的部分走资派，在部队右倾势力的支持下，演出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罪恶。尤为令人发指的是，郯城县人武部长、革委主任王承栋竟将折磨致死的人吊在树上曝尸三日。由此便不难看出，这是多么血淋淋的阶级报复。可笑的是，这一切暴行，居然是在贴上了红色标签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主使下进行的。只是这些革委会是刚刚复辟的势力的新组合。他们也美其名曰“三结合”，即“走资派”、右派军人、“保守派”。他们在“二月逆流”中未能得到彻底宣泄的仇恨，终于通过清算王效禹、进而清查“五一六”找到了新的切入点。而被清查的对象，则主要是在王效禹主政时期的革委会成员，几乎无一漏网。此次运动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了50年代的肃反、镇反及反右，其延续时间之长，亦堪称历史之最。

1973年7月，我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耗时两个半天，引经据典、慷慨陈词，鞭辟入里地分析批判了清查“五一六”的罪恶。最终结论为：山东清查“五一六”运动，其要害在违反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篇曾得到毛主席肯定的发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依旧是无可厚非的。但尽管如此，却并未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复。只是口头上委托中共山东省委及济南军区党委“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以致使矛盾愈演愈烈，结果导致了“青岛会议”的召开，导致了“批林批孔”中的某些过激行动。四十多年过去后，让我们以冷静的，历史的眼光，在占有详实资料的前提下，重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吧。

在 1967 年反击“二月逆流”运动中，北京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

1967 年 3 月 24 日，北京石油学院、石油部、国家计委、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宣布成立“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苏东海在校园内张贴了《给周恩来贴大字报》的大字报。

1967 年 3 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批判了参与炮打周总理活动的学生张建旗。但张建旗不服，于 3 月 31 日发表声明，重申炮打周恩来的观点。

1967 年 5 月，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名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5 月 16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出现了以“五一六兵团”名义贴出的标题为《戳穿李先念之流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保护李生念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

5 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人，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随后贴出《给周恩来的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大字报。不久，在张建旗等人策划下，组建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由于人寡力薄，这个组织的成员只能在深夜秘密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代表了他们的宗旨。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革命造反组织的反击下，“五一六兵团”的活动声势稍见减弱，但少数人仍在坚持。

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干部的保守系统被摧毁之后，毛主席愈来愈依赖周恩来这个既无野心、又勤恳管理国家、关注国计民生的实干人物。因为，毕竟经济是基础，一切浪漫的意识形态的争斗，如果没有饭吃，是任谁也无法进行的。

“五一六兵团”的出现，给毛主席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他下定决心，要毫不犹豫地打掉“五一六兵团”。这同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他毫不犹豫地打掉“王、关、戚”一样，是同步进行的。“七二〇事件”后，在各大媒体上均曾出现过“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而毛主席却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毛主席用打掉“王、关、戚”并清查“五一六”这两份祭品，把全国的“造反派”、红卫兵送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并从而赢得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拥戴，平息了老干部的不满和他在武汉亲自领略过的军队的暴乱情绪。

毛泽东主席现在需要的是秩序。打掉“五一六”，意味着严管的开始。1967年9月，毛泽东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正式发出了打掉“五一六”的号召。

后来，这一运动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鼓噪下，将这一始于1967年下半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推进到1971年乃至1973年，范围遍及学校、工厂、农村、机关、街道，演化成整造反派、整学生、整群众、整知识分子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这一命题的公然反动。是向党内外、军内外右倾势力的妥协，也是演化出林彪政变的前奏。同时，也为1976年10月的“右派政变”奠定了基石。

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稳定了军队，稳定了干部

队伍，取悦了周恩来以及一大批党政军的右倾保守势力。但是，它不仅牺牲了他一手培植起来的红卫兵、造反派，而且牺牲了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是，违反了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帝王之术”的再版吧。遗憾的是，我辈后生，又怎能理解他老人家这一纵览全局、高瞻远瞩的伟大战略部署呢？

1973年以来，我还在起劲的批判山东清查“五一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一再敦促山东省委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殊不知，将我辈送上祭坛的，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我扪心自问，委实是冤枉了白如冰。试想，如果继续坚持让白如冰及省委纠正错误的话，那岂不是要纠正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头上吗？

一九六七年夏，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指出：“什么以我为核心，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结果垮台了。”同时，毛主席还意味深长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还一再告诫说：“必须善于将我们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上，早已被暂时胜利冲昏头脑的造反派们却置若罔闻。他们为争核心，而不惜发动内战，给军内外的右倾势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得“走资派”们利用他们热衷于“内战”之机，利用已经瓦解了的保守势力的重新复活组织了疯狂的反扑。走资派不是去引导，而是利用毛主席对“造反派”的某些告诫和批评，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在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给予了“造反派”关键性的、

致命的一击，使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搁了浅，不但没像毛主席所期望的那样走向胜利，反而令人痛心地走向了失败。九大团结胜利的凯歌刚刚响起，清查“五一六”的号角便在神州大地上普遍吹响了。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又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 第九章 再教育

在一九六九年未回乡后，发生了我人生中第一件最悲痛的事，我的父亲，67岁的人生路画上了句号，1970年11月，老人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这片令他饱受磨难的土地。

父亲的死，严格说，起因应源于大哥的死。

我的大哥董学府，1969年刚满40岁，正值壮年。是年七月一天，我回家，一进大门，便听到父亲的哭声。一问，方知大哥得了急病，已抬去山下的矿务局医院。

我步行30里山路，来到位于洪山的淄博矿务局医院。主治医生建议转院。我叫了救护车，转入淄博市第二人民医院（今中心医院）。

三天后，院方建议转山东省立医院。在院方派出的一名大夫的陪护下，乘火车赶到济南。一路与我为伴的，还有我的一位同学、市革委办公室的办事员孙继海。无论在淄博站，还是济南站，上下天桥均是由我两人抬着大哥。到省立医院，经拍片检查，神经外科的张主任称需作开颅手术。大哥的妻子是农村妇女，长子年方17岁，且都不在身边，家属签字非我莫属。张主任说了三种可能性：一、全治好，二、终身残疾，三、死在手术台上。我咬了咬牙，坚持做手术。术后，抬到病房由我和孙继海轮流陪护。但术后的大哥一直昏迷不醒。直到次日傍晚，术后24小时了，张主任检查后说：“病人一直不醒，看来危险了。”此时，父亲带着大侄儿来了。一进病房，父亲便哭道：“三啊，亏了你，救了你哥。”说着，老人居然扑通一下跪在我脚下。我不胜惶恐，赶紧将他

扶起，坐下。随之，他便止不住地抽泣着。花白的胡须不停地抖动着，鼻子不停地抽搐着，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直觉告诉我，父亲也为时不久了。因为他病弱的身躯已无法承受这老年丧子的悲痛。父亲一直哭到天亮。我透过泪光，看着老父亲那佝偻的身子，那短短的散乱的白发，禁不住心如刀绞。是啊，大哥刚满40岁，他可是家庭的支柱，是父亲的命根子啊！倘大哥就此溘然长逝，他老人家靠谁啊，四个孩子靠谁啊！

晚10时许，张主任向我们宣布了大哥的死讯。当时，我天真的以为，可将大哥的遗体运回老家。于是，次日上午，我拨通了淄博市革委办公室的电话，办公室主任张大栋告诉我：“市里不能派车，况且你哥还是共产党员，应带头移风易俗，就地火化。”我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抑制住哭泣，哽咽着说：“儿啊，不难为你，火化就火化吧。”于是，我反复叮嘱侄儿，好好照顾爷爷，先回老家，济南的后事由我和孙继海处理。

火化后，我抱着骨灰盒，一路哭泣着回到老家，在乔家堰的祖坟地将大哥安葬。

就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遽然离去了。我无法相信，他才40岁啊，这命运太残酷了吧。

乔家堰祖坟，据说祖父选址时曾专门求风水先生看过，说后辈能出大官。已经应验的是叔父，官至地、市级。正在应验的是我，副地市级。尽管这个“官”是巴黎公社式的。但在乡亲们的眼里，可算是“圣人”了。

墓地还是集体的可耕地，还种着庄稼，不能起坟头。我和家人将大哥安葬已毕。我久久地伫立着，仰望苍天，放声大哭。大哥的死，实在太疼人了！我脑子里像蒙太奇一样闪回着大哥短暂的人生：从小便跟随父母逃荒要饭，逃避战乱。

解放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没有一次不是冲锋在前。他比我大十九岁，打我记事起，他就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深更半夜才从社里回到家。对于村里缺水吃的问题，不知耗费了多少代人心血，但一直未能解决。春夏之交，村民们只好排起长龙般的队伍，头戴柳枝帽，口里高诵“南无阿弥陀佛”，从庄东到庄西，一路祈雨。然而，直到嗓子喊哑了，也没祈下雨来。大哥主政后，于1967年起，兴修水利，在村中建起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用陶瓷管将石家峪的泉水引入。这既解决了村民吃水问题，又避免了夏季山洪爆发给下游庄稼带来的灾难，真可谓一举两得。大哥不仅是决策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干者。我每每放学归来，都会看到他与小伙子们摽在一起干。手虎口震开了，血泡一茬又一茬。后世的人们，每当说起这些事，总忘不了我可敬的大哥。对于家庭，大哥可算得上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兄长。我的父亲由于年轻时在日寇开办的大荒地煤井吃了过多的橡子面，将胃吃坏了。从三十几岁开始，就常年胃疼，四十来岁，便不能下地干活了。家庭的重负便落在了尚未成年的大哥身上。可以说，他刚四十岁便英年早逝，实在是被苦难吞噬了年轻的生命，他是被活活累死了。

如今——1969年夏，大哥走了。留给父亲的，是所有老年丧子的父亲都无法摆脱的失子之痛。夜里，他不停地啜泣；白天，他躲到无人处哭嚎。悲痛，彻底摧毁了他本就虚弱的身体。第二年十一月初，经市第一医院检查，已是胃癌晚期，无情的癌细胞，已吞食尽他的每一块筋肉，使他几乎失去了人形。

十一月七日，我从第一医院拖着沉重的脚步与几位乡邻将父亲抬回了家，没有火化，将其葬在祖父的墓侧。是年，我二十二岁。

从此，我变得沮丧、沉默，政治上的失意，两位亲人的不幸离世，这巨大的痛苦山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父亲逝后，母亲的扶养成了问题。我刚回农村，只能算个半劳力，养不了母亲，幸好，姐姐来信要妈妈去包头，这样以来，总算让我松了口气。

妈妈是1970年底去包头的。次年春，我便开始了找工作的努力。我已经十分了然，想回机关“当官”已是痴人说梦。属于我的，一是当兵，二是当工人。第一条路走不通，公社、区人武部这一关就过不了。因为我是“王效禹线上”的人，部队也不要。1970年底，接市劳动局通知，要我去淄博矿务局寨里煤矿报到。常言道：“当兵是死了没埋；下煤井是埋了没死。”谁想，无论是死了没埋，还是埋了没死，这两项均与我无缘。就是因为追随毛主席参加了文革，便成了人人为之侧目的洪水么猛兽。可笑的是，当我背铺盖来到寨里煤矿时，第二天便接到了矿上的逐客令：我不能在这里上班。我垂头丧气地夹起尾巴走了。

但我锲而不舍，不甘心失败。我开始每隔几天便到市委去找市委书记杜永隆。好在杜永隆对我成见不深，还算是积极热心地帮了我的大忙，于是，我终于在1971年1月，奉命来到位于淄博与济南临界的一家省属企业——王村铝土矿上班。从此，终于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从第一天下井开始，我听到的，便是工友们不堪入耳的脏话。与1968年在夏庄煤矿所见所闻完全一样。与我一向从经典马列著作中所了解的工人阶级形象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一到掌子面上，不绝于耳的便是有关男女性事的粗话脏话，实在令人作呕。但我又一想，毛主席说过，虽然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只有他们才是最干净的。我反反复复自省，最后归结于一点，我之所以听不惯，大概主要是

由于自己布尔乔亚的劣根性所致吧。看来最需要改造的还是自己。于是，我抱定决心，要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根除自己的小资情调。我开始孜孜矻矻学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自然辩证法》、《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马列著作。

与此同时，我还反复将马列原著与毛主席著作中的某些观点认真比较。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发现马列与毛主席之间存在着某些巨大差异。那就是，马列的视觉主要在工人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毛主席的著作，则基本上是关于农民革命的学说，马列主义来源于英法工人阶级的工厂车间以及工人运动的实践，比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而毛主席的理论则来源于中国南方的山林、稻田和农民运动。这个困惑了我大半辈子的问题，一直在痛苦地折磨着我。虽有质疑，但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因为这牵涉到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倘有不慎，我岂不是步历史上<sup>28</sup>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后尘吗？

直到几十年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才从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特里尔先生的《毛泽东传》里找到了正确的解读。毛泽东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农民革命的科学而后者则是工人运动的指南。而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撇开农民问题来侈谈中国革命，无异于痴人说梦。而王明之类，陈独秀之类，他们无疑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悲剧性恰恰在于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最终堕落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则最终赢得了胜利。

1971年3月，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525厂的信。我看是柳杰寄来的。便一目十行地一口气读完。信中写道：“最近，厂领导都知道你是我的恋人，而且还准备结婚。你知道，

学徒期间是不允许恋爱的，更不用说结婚了。青年人多得像沙子，你还是别作选择吧。我这样一个蠢人，不值得你浪费精力和笔墨。”读至此，我的脑袋仿佛突然遭到雷击一样，眼前一片漆黑。这可真是：“时来天地齐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啊，父兄刚逝，打击接踵而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她变心了？不久前还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白，怎么说变就变？难道真是少女的心，秋天的云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悟道：这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误会。试想，在我回乡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一如既往，为什么我工作稳定了，她反而会变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在此，只能暂当悬索，期待着时间的解答吧。

## 第十章 爱从天降

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五，我正在老家过年，在好友家里喝酒，忽然有人来找我，一看，来人竟是滕清海。他是我刚结识不久的朋友，是通过淄博五中“东方红铁军兵团”的韩发尧认识的。他是王村耐火材料厂的工人。他的厂与王村铝土矿相距不过一华里。他入厂之前，是淄博十六中的红卫兵。是一位对我崇拜有加的粉丝。据韩发尧说，按亲戚门上，滕清海应算是他的远房外甥。当去年韩发尧第一次与他去王村铝土矿找我时，我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招待他们，相谈甚欢。滕家庭条件优越，其父是一位铁路工程师。经韩发尧引见之后，我们两人接触了起来。每天下班后，不是他来找我，就是我去找他，很快成为莫逆之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年“五一节”，滕结婚，我准备了一份算是说得过去的礼物，在他带领下，于4月30日晚乘火车来到位于淄博站（当时还叫张店站）南侧的他的家。他住的村子叫大贾庄，因为靠铁路，所以家家户户多为铁路职工家属。他的父亲原本为张店机务段的一位资格甚老的工程师。据他说，父亲的技术十分了得，能自己组装蒸汽机车。老人现在贵阳机务段教育室工作。每年一次来家探亲。家里现在只有母亲和两个妹妹，据他说，他原本有一个大哥，解放前夕，死于流弹。大哥以下，还有大姐二姐，均已成家。他以下，是三妹四妹。尚待字闺中。三妹清香，22岁，是淄博压力表厂工人，小妹清霞，尚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晚到他家时，已是晚七时左右，天已擦黑。这是一座

典型的四合院。但居住者只有他们一家。正房北屋十分宽敞。在正房的西山墙边，还矗立着一座二层小楼。据说是三小姐的闺房。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富有的殷实之家。

入座后，我端详了一下室内的陈设。北墙边，八仙桌东头是一架条扇几，摆放着几件古色古香、莹光可鉴的瓷器；座钟、挂钟，台式收音机，一应俱全。桌椅床张揩抹得一尘不染，可见主人治家之严谨。我特地留意了一下三姐儿。只见她身材修长，约 1.65 米上下，与我个头相仿。梳两条乌黑的长辫，齐眉的刘海下，是一对水汪汪的丹凤眼，白嫩俏丽的鹅蛋脸儿，仿佛羊脂玉雕塑一般，似吹弹可破。她皓齿明眸，笑容可掬，透露着聪慧和机敏。四妹个头稍矮，还是一副女中学生的模样。一席话后，我被安排在楼上三小姐的闺房里下榻。房间陈设简约，一架十分洁净考究的单人木床。床的四角有四条精雕细刻的紫色细柱，这是江南富贵之家方有的那种挂有床帐的算是豪华气派的木床。床单洁白，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一张三抽桌，桌面的玻璃板下，压着主人的很多照片，有彩色的，有黑白的，看着这些风姿绰约、豆蔻年华的倩影，我禁不住一阵脸红耳热，心旌摇摇。桌上还敞开着一卷正在阅读的《红楼梦》。不难看出，这三姐儿还真非寻常之辈，像她这样年龄段的姑娘，谁会碰这样的书。我和衣斜倚在床上，仰靠在她整洁的被子上。我不知道我这个样子是否得体。九时许，三姐儿推门进来，一看我这个样儿，脸儿刷得一下红到脖颈。我十分局促，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她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哥，你早点睡吧”。我嗯了一声，她便风摆杨柳般出门而去。唯听到楼梯上橐橐的脚步声。

几天后，韩发尧与滕清海去矿上找我。寒暄一番后，韩发尧私下对我说：“学诚，感觉滕清海的三妹妹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困惑道。

“别装了，愿谈恋爱吗？”

“不敢想。她年龄还小吧？”

“她属兔，你属猪，猪兔一家，男大四正合适，绝配啊。”

在韩发尧的热心撮合下，我与三姐儿正式进入了爱的殿堂。

我们结婚多年后，三姐儿滕清香在与我开玩笑时说：“当时一见你，还以为你有几个孩子了呢，显得那么老气。要不是我哥，我才不理你呢！”

是她，填补了父兄去世及与柳杰分手之后我心中的巨大空缺。是她，把我从命运的低谷中拯救了出来，让我又踏上了一条阳光灿烂的坦途。从此以后，方又让人能够看到洋溢在脸上的笑影。

清香，名如其人，真是又清又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亭亭净植，香远益清”。从此，我开始徜徉在爱的海洋里。这爱来得这么突然，却又是这么深沉，仿佛命中注定。从此便开始了我与她患难与共、生死相许的一生。

## 第十一章 落实政策

话再说回到滕清海春节到我家找我的那一天。当时，他给我带来了一份油印的绉巴巴的文件。那是中共中央 1973 中发第（4）号的文件。是中共央关于山东批林整风汇报会的纪要的批复。我一目十行地一口气读完，竟不顾酒席上多人诧异的目光，高兴地跳了起来。事不宜迟，我立即回家收拾了一下，便同滕清海上路了。

现在，山里已通公路，我已无需像上学时那样翻山越岭，只要步行五六里就可乘坐公共汽车。腾骑的是一辆大金鹿自行车。我对他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真够可以，他居然能从张店骑车赶来，长驱 70 华里，且公路是土路，坡陡路滑，一路泥泞，真不知他费尽多少周折！

来到张店，韩发尧告诉我省革委常委彭世杰在济南山东宾馆等我。

我带上那份北京 27 人学习班揭露林彪死党袁昇平及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所犯错误的文件，匆匆乘火车来到了山东宾馆，见到了彭世杰。

彭世杰，本是青岛某厂的一名锻工。他真的像希腊神话中的火神赫淮斯托斯一样，身材魁梧，方面大耳，面色黝黑，膀阔腰圆，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他是 1967 年参加青岛“1.22 夺权”后，跟随王效禹来济南参加“2.3 夺权”并被任命为省革委常委的。

一见面，他旁若无人，朗声大笑，坦然说道：“小董，清查‘五一六’遭了不少罪吧。”我说：“我还没有受多少

罪。”老彭这位三十多岁的钢铁般的大汉，竟然溢满两汪眼泪，哽咽着说：“唉，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青岛造反派遭老罪了。”说完，便撸起袖子，让我看两臂上的伤疤。那都是烟头烧烫所致。

“这下好了，有中央4号文件撑腰，我们总算熬出头来了。”说到这里，他压低嗓音道：“我和省革委几位常委商妥了，准备由我、乔世俊、张承良带队，组织全省各地市常委以上的同志赴京上访。咱们一定要把山东文化大革命这个案彻底翻过来。”

我和老彭高兴地击掌相贺。没有多说，我便乘火车回了王村铝土矿，又直奔耐火材料厂牛光春家。

1973年7月10日，在彭世杰等三人的组织下，全省十三个地市常委以上的负责人共计24人（淄博是我、牛光春、胡兆所三人），冒着极大风险悄悄集结在山东宾馆。

经研究决定，上访团于7月20日分几批乘火车赴京，直接去太平路甲8号中央接待站集合。需知，当时全省上下清查“五一六运动”正方兴未艾，且这帮人又大都戴着“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集体上访，这要冒多大风险！

7月22日，中央文革接待站将我们安排在国务院第三招待所下榻。

7月23日，中央文革将省委书记白如冰、副书记苏毅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张铚秀叫到北京，自24日起，让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我们的汇报。

在人民大会堂前厅，汇报会于24日上午九点正式开始。出席的，除白如冰、杨得志、苏毅然、张铚秀外，还有中央候补委员、潍坊柴油机厂的工人张延成。主持会议的，是中央办公厅的米士奇（后来方知“十大”后他成了王洪文的秘书）。同时参加听取汇报的，还有国务院办公厅，总政、总

后的相关负责人。

在历时七天的汇报会上，我总算将几年来积蓄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发挥了个淋漓尽致。临沂、济宁等地的同志仅仅是以血淋淋的事实进行了控诉，但由于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只能就事论事，因而未能得到相关领导的重视。鉴于此，彭世杰决定由我作核心发言。自7月27日开始，会议的发言中，我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从马列学说到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令在座的所有人无不肃然起敬，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像我这样一个年仅26岁的小伙子，马列理论竟然如此炉火纯青！

7月30日晚，米士奇在国务院第三招待所全体上访人员大会上兴高采烈地讲道：“山东同志是有水平的。譬如董学诚同志的发言，昨天晚上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了汇报，主席认为这位年轻人的见解是正确的。”

我的见解是什么呢，那就是：山东问题的要害是背离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查“五一六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一听到米士奇最后一句话，我的心陶醉了。我的发言居然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是何等的荣耀啊！我仿佛腾云驾雾，一下子飞到了虚无缥缈的太空，忘乎所以了。

7月31日，带着尚方宝剑，怀着胜利的巨大喜悦与白如冰、杨得志一起乘专机回到济南，住在山东宾馆，等待省委领导的召见。

8月3日，彭世杰传达了省委指示，要我们回各地去，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安排工作，省委将遵照中央指示，迅速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承诺成了空话。白如冰信誓旦旦地叫嚷绝不要嘴巴

子，实践证明恰恰要了嘴巴子。

于是，“青岛会议”便应运而生了。

## 第十二章 “青岛会议”

鉴于中共山东省委及白如冰书记未能信守承诺，没能真正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所以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彭世杰、乔世俊、张承良、姜庆本等四名省革委常委，牵头召集各地市革委常委以上负责人于1973年12月15日在青岛召开会议，名为第二次赴京汇报会筹备会议。

这就是有名的“青岛会议”，也有人说这是臭名昭著的“青岛黑会”。

会议开幕当天，接到省委秘书长李振的电话，要求立即解散，回各地去“抓革命、促生产”。要相信省委能够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这个电话，经姜庆本在会上传达后，立即爆发了抗议的旋风。

我是这次会议的核心人物。由于在北京汇报会时的特出表现，我已在与会者心目中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按照会议策划者的预想。此次会议就是要把王效禹的案——即山东文化大革命的案彻底翻过来，让被打倒的各地革委成员官复原职，而将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及军队干部统统撤换。由此可见，我们所主张的“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与省委负责人所理解的“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之间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在省委看来，所谓“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就是将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确实搞错了的象征性的纠正一下，将少数听话的革委会成员安排个适当的位置即可收场了。

事实上，省市委真的这样做了。比如牛春光就被安排了个市计委副主任，而我则被安排为市劳动局副局长。省及其他地市也均有封官许愿的适例。像彭世杰就被安排为省工办副主任。但在“青岛会议”的主持者及参与者眼里，这一切，只不过是“招安”而已，是对宋江之类投降派的拉拢与腐蚀。而我们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而这样的革命不仅为白如冰们所不允许，而且也被伟大领袖所不允许。君不见，清查“五一六”的始作俑者，不正是毛主席本人吗？白如冰，借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会去纠正毛主席啊。怪不得七月上访未得到中央只言片语的指示，而只是推诿给山东省委，让他们去接受炮轰和冲击！在经过几十年的磨难和历练之后，我才多少彻悟了如下的格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希特勒如此，任何阶级的政治家无不如此，而吾辈可怜巴巴的弄潮儿，只配做老道的政治家股掌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

七天后，按预定程序结束了“青岛会议”。除了一纸“告全省人民书”外，主持者再也没有了相应的行动。会议并没有实现“第二次赴京上访的筹备工作”。因为不久到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将这个计划席卷一空了。

## 第十三章 “批林批孔”运动

历史到了 1974 年新年伊始。

2月下旬，江青在京召开了“批林批孔”座谈会。山东曲阜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以梅，像国宝一样被祭起，将这样一个此前默默无闻的人物，推向了“批林批孔”的大看台。

3月初，彭世杰将我召到山东宾馆，向我面授机宜：“中央决定再次召开山东问题汇报会，省里大部分常委都要进京。省内的工作准备组建第二套班子。由你董学诚和王万成、徐仁瑞组成。‘批林批孔’运动马上开始，我们正好借此良机，乘这个东风，配合北京汇报会，内外结合，上下结合，迫使省委真正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王万成，山东师范学院学生，他是 1973 年 7 月北京上访团的骨干之一，与我早就相识。记得当时泰安地革委的国恕连曾作打油诗打趣在北京各家商场奔波着筹备结婚用品的王万成说：“万成买鞋为情人，踏破北京处处门；昂头走路有想法，但愿一生碰红运。”此诗一时轰传为笑谈。

徐仁瑞，省农业厅干部，是省机关有名的造反派，此前与之素不相识。据彭世杰称，其人笔杆子十分了得。有省直机关一枝笔之称。

这就是说，我成了山东省“批林批孔”运动的总负责了。是福、是祸，自有分晓。

3月 20 日，彭世杰等人偕省委、省革委、济南市委、市革委的绝大多数成员去了北京。作为第二套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我在省城体育场召开了全省“批林批孔”誓师大会，

会议规模，“文革”以来，实属罕见。来自全省各地的车辆有五百辆之多，中心会场人数达数万人。我在频频闪亮的镁光灯下，面对十几支麦克风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动员报告，赢得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会议还邀请了陈以梅讲话。陈以梅这个老实巴脚的全国劳模。能懂什么儒家学说？他不知从谁那里贩来一顶帽子，在会上口沫横飞，将“中庸之道专家”戴在了白如冰头上。会上，他还大爆粗口、破口辱骂孔老二、林彪、白如冰，可谓洋相出尽、大煞风景。所幸，其口齿不清影响还不算大。

这次全省性的誓师大会之后，全省各地方也纷纷效仿，全省出现了山头林立、派旗飘飘的局面。

我完全错估了形式，把“批林批孔”看成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为从1966年到1974年正好八年，正符合毛主席所说的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阶级斗争规律。

从此以后的两个月中，我在珍珠泉招待所——省委招待所，先后召开过规模不同的批判大会不下数十次，并多次纠缠省委负责人穆林、张子石、李振等，要他们就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若干问题作回答。白如冰在北京，上述人根本回答不了什么带实质性的问题。在这期间，还发生了“青岛夺权”。对此，我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夺权事关全局，岂可掉以轻心。我幸亏没涉足到省市的夺权问题，否则，1976年10月以后，岂不是死定了！我当时频频游说于全省各地，足迹遍及济南、青岛、泰安、潍坊、滨州、淄博。大会，小会，大讲“剩余价值规律”，大讲“停止旧机器转动”，大讲“要自上而下打乱其错误的指挥系统”等等。试想，文革开始时，毛主席又是召开中央全会，又是接见红卫兵，又是张贴大字报，不停地发表指示，不停地推波助澜，而“批林批孔”则一反常态，从未出过一次面。事实上，毛主席所谓“天下大

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有一个时间表的。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前，他是主张“大乱”的。然而“7·20”之后，他选择了“大治”选择了秩序，选择了与右倾势力的妥协。1974年“批林批孔”尘埃落定后，他更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而我辈竟不知好歹，还在大肆鼓吹为文化大革命正名，制造大乱，这不是适得其反吗？

还需着重指出的是，是年3月，作为最后一名离开山东去北京的省革委常委姜庆本，遵循与彭世杰等共同商定的决策，由姜庆本临离济前拿下省委珍珠泉招待所。姜庆本找到省委秘书长李振，商谈结果，李振表了如下态：一、革命群众到省里来汇报，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行动是正确的；二、凡与会者均按一定的标准给予补助。结果，住宿免费，伙食免费。这样好事，谁不抢破头地干呢？结果，我们一声令下，全省十三个地市的十三个代表团，一天之内蜂拥入驻了珍珠泉省委招待所。列宁说：“当革命到来时，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甚至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这十三个代表团，每团30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些不良分子乘虚而入，不仅白吃白住，甚至盗窃招待所的卧具、茶具等。究竟少了多少，当时虽追究过，但难以计数。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市亦相应占领了各级招待所，组织了汇报会，形成了与各级党委遥相对抗的组织系统。果如我所言，“停止旧机器转动”“打乱其错误的指挥系统”。这一切，真的全都变成了现实。我从而认定，什么“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统统只不过是幌子，从根本上解决政权问题才是问题的实质。这也是自“青岛会议”以来贯穿始终的宗旨。

既然我常在济南，淄博的事情就全权委托给了李相德、王铸。前者，系湖田石矿工人，文革初，系市工人造反司令

部的常委。后者，系山东新华制药厂的革委会常委，两人又同是市革委委员。两人年龄在35岁上下，均比我大七八岁，但却唯我之马首是瞻。对我言听计从，忠贞不二。而这时的牛光春，也另立了山头，扯起了大旗。1967年之后消亡的那些组织，也乘机死灰复燃，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均陷于瘫痪，生产停顿，经济萧条。这一切，在我们眼里，就是最正常的“革命秩序”。事后反思，这正是我的幼稚及不识时务之处。请想想，自1967年“7·20”武汉事件以来，毛主席已经转舵，已经妥协，已经选择了严管和秩序，而我辈却依然在声嘶力竭地大肆鼓噪，继续制造天下大乱，这怎能不迫使毛泽东下令严管这些不懂建设、一味革命的造反派呢？试想与其把成千上万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从走资派手里移交给这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还不如让前者继续掌权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不，不是历史，而是毛泽东出于不得已才重新选择了邓小平，将其作为一份举足轻重的厚礼奉献给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党内保守势力，换来了差强人意的“安定团结”。

邓小平复出了。

邓小平极好地抓住了最高领袖的心理变迁，“绝妙地掌握了出击的最佳火候。他上台后的第一板斧，砍在了‘铁老大’这只国民经济的牛鼻子上。从整顿铁路秩序开始，随即推向全国。围歼‘资产阶级派性’，是邓小平反攻倒算、翻案复辟的重大举措，此举不仅深得周恩来的支持，而且投合了毛泽东严管的胃口，也迎合了国内多数干部及工农兵厌战的情绪。而一味痴迷于继续革命的造反派们，继1967年春天的“二月逆流”之后，又一次面临着灭顶之灾，且比起前者来，来得更其残酷，更其悲壮。因为“二月逆流”刚抬头，毛主席便拍案而起，将其粉碎了。而这一次则不然，不仅有以周恩

来为代表的党内右倾势力的支持，而且邓小平手里挥舞的，是“三项指示为纲”的尚方宝剑。

1974年4月，中共中央12号文件下发，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削山头，批派性，邓小平呼风唤雨、忘乎所以，重新上台的走资派及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咬牙切齿，磨刀霍霍，向着造反派杀了过来。可悲的是，这些已被毛主席推上祭坛的可怜虫们，还在高举着继续革命的大旗，誓死捍卫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山头被削，“批林批孔”汇报会结束，我回到了淄博，市委书记郑子久率市委常委在交际处新楼会议室与我谈话。这次谈话是继在省委常委及白如冰与我们两人谈话之后进行的。记得当时正在上映一部《决裂》的影片，我谈话的姿态与气势完全是该片主人公的翻版。其实，无论是白如冰也好，还是郑子久也好，当时都劝我改弦更张，放弃原来的立场。但一心坚持“两个决裂”的我，怎能容忍这些人的摆布？

在我眼里，虽然不能把白如冰、郑子久看作走资派，但他们至少和邓小平是一个营垒中人。那是不能与其同流合污的，而必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由于我的不合作，省委书记白如冰紧步邓小平的后尘，亲自坐镇淄博，对我进行大张挞伐。他在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对我发起强大攻势：“淄博的董学诚，立场反动，气焰嚣张，能说会道，到处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贩卖修正主义货色，为什么不为走资派脸上贴金啦，为什么不为修正主义路线卖命啦，什么停止旧机器转动啦，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剩余价值啦，什么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啦，等等等。”在白氏的鼓噪下，在淄博迅速掀起了一股声讨董学诚的旋风。我从神坛上跌入了低谷，这才又想起她——三姐儿。我不断地出入她家，与她不断地探讨着未来。我不断地向她灌输马

列主义及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她比我小四岁，23岁的单纯姑娘，哪能接受得了我这些高谈阔论！但是，她又无力阻止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叹道：“你说的这一切不是没有道理，我何尝不听毛主席的话！只是你们搞的这些运动很多老工人都看着不顺眼，都不赞成。我爸说，小董这样的人，若成了，真能上得去，若败了，前途不堪设想。”

听了三姐儿的话，我还真触动不小，从此我不再外出，流连于温柔乡里，自1974年2月20日与滕小姐履行结婚登记后，我便经常住在滕家。她的温存、善良、体贴、关爱，她的善解人意，是我由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她还爱好服装的设计与裁剪缝纫，毛衣打得好。在这段时间，她把我的毛衣毛裤全打好了，是那样合体。令我感受到难以形容的温暖与熨帖。她的母亲一开始对我十分排斥，现在终于接受我了。嘱咐女儿道：“小董家不在这里，没人疼，要好生照顾人家。”当清香向我说及老人这番话时，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真是堪比亲娘啊！

由此，我联想起柳杰，自1971年3月绝交后，我曾去过她家，力图挽回那段感情，但她的父母对我已十分冷漠。我后悔莫及，这不是自讨没趣吗？1973年9月，自北京汇报会归来后，我有了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想体验一下报复的快感，想令柳杰羞愧一下。一天下午，我正在市委交际处的院子里漫步，忽然一股奇思妙想一下子攫住了我。我径直向柳杰的闺蜜傅莉萍家走去。寒暄过后，我说：“还常见到柳杰吗？我想见一见她，请你帮忙，但千万别说我想见她。”傅莉萍爽快的给柳杰打了电话。

不一会儿功夫，柳杰破门而入。

令她始料不及的是，她怎么也没承想第一眼看到的竟是我，于是拔腿想走。那脸上的表情仿佛突然被蜂子蛰了一下，

说不清是疼痛还是尴尬。

当时，我一副居高临下，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如何让伊人消受！傅莉萍一看夺门欲走的柳杰，也很尴尬。赶忙劝阻，但话不投机，能奈她何。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任其像一片枯萎的树叶一样飘零而去了。

事后，我自然饱受了傅莉萍一番奚落。

按我当时的心态，就是想有意识将柳杰羞辱一番。俗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以为董学诚完了，怎么样啊，老子又回来了。”

但事后，反复想来，觉得做的未免有些过分了。当时的分手，自然有其背景，自己有什么理由羞辱人家？联想到分手不久我去她家时其父母的态度已与热恋时相去云泥，只有靠自己去体察才是，又怨得着谁呢？若从阶级分析的观点上讲，姑且不论阶级，就说阶层吧，人家是干部子女，而你算什么呢？文革新贵吗？哼，就算你爬到九天之上，你的根子还在农村，你还是两脚臭屎的农民子弟！人家甩掉你，你认为是无耻市侩，可在人家看来，此乃明智的选择，是识时务。。

我想通了这一点，心中也就释然了。还是好好珍惜我的三姐儿吧。只有这样人家的女儿才会与你厮守终身的。我有次曾探询三姐儿：“我这样的人，始终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时刻都有翻船的危险啊！”她掷地有声：“我不会落井下石！”虽非海誓山盟，但却一字千钧！

不仅是她，而且她的父母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环境里过来的，他们信奉儒家的传统道德。正所谓：“好马不把双鞍配，好女不嫁二夫郎。”虽然她的父亲已预见到我的前程暗淡，但女儿既已接受了我，他也就尊重女儿的选择了。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啊！没有家世的考虑，没有世俗的铜臭气，不去做政治门阀势力上的挑剔。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感激

涕零了。对于三姐儿来说，前面就是火坑，也只有纵身一跃了。她义无反顾！如果说联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功利的考虑的话，滕氏父女何曾有片刻考虑过我的进退出处！

经过两年的苦恋，我与滕清香决定于1975年7月1日举行结婚典礼。这所谓典礼的参加者，只有我们两人和泰山神祇——碧霞元君。6月30日晚，我们两人住宿在泰山的岱顶宾馆。这洞房花烛夜，奏响了爱的进行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与肉的结合。激情把我们一次又一次推向爱的巅峰。我看到了那光辉灿烂的满天朝霞和那一轮喷薄欲出的朝日。听到了她那勃勃跳动的青春律动的心。暮然间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尽管在人世间，在山下，在淄博，还在泛滥着邓小平的“整顿”、白如冰的围歼派性，但此刻，只有两颗火热的、赤诚的、已经互换了的心。只要这两颗纯真的、无私无畏的心紧紧融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就能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宠儿。尽管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却感到自己才是最富有的人。因为我们各自拥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因为我们各自拥有对方。拥有了最纯洁的、至高无上的爱。我们变成了世间最幸福、最富有的人！

我没有房子，更谈不上车子，与三姐儿认识后，仅给她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还是经过市委秘书长李克良同志特批，方才如愿以偿的。

我们被爱的波涛簇拥着，她的闺房、小绣楼变成了我们的爱巢。从泰山旅行归来后，我便匆匆赶去王村铝土矿上班了，“批派性”的喧嚣仍不绝于耳，我仍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口诛笔伐之中。但同时我又很淡定，仍保持着一颗平常的心：是啊，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胜利必将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

装起来的革命者！

此后，我断绝与外界的一切交往。只来往于王村铝土矿与爱巢之间。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批派性的声浪甚嚣尘上！七月下旬，在一次由市委书记郑子久亲自主持的“批派性”的全市有线广播大会上，宣布逮捕了秦玉海、董学仁、张兴仁。秦玉海，已无需介绍，文革初，是淄博五中“东方红”兵团的头头。宣布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董学仁、张兴仁本是淄川区口头公社的农民，给他们罗织的罪名是组织马鞍山游击队，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将镇压反革命、投机倒把与批派性联系在一起，主持者究竟煞费了多少心机。正所谓杀鸡给猴看，而“猴”正候在爱巢里，躲在温柔乡里呢！任凭邓小平们如何闹腾，我自岿然不动。更有甚者，在一次批判我的大会上，市委还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弄到台上，让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对我大放厥词、狂吠乱咬。叛徒升官了，弹冠相庆着，在庆功的宴席上狂饮着用我的鲜血酿成的酒浆。

总之，自我结婚后，岁月江河日下，举步维艰。但我抱定信念：总还会有一搏。

这最终一搏终于来临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病逝。于是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吹响了。毛主席愤怒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被作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总代表又一次被推上祭坛。

然而，我不再贸然出击，而是谨慎地来到了北京，先是去清华大学看了大字报，又找清华的负责人吴伟煜谈了话，了解了运动的总动向。无独有偶，在出清华园时，猛地碰见了泰安的大鼻子国恕连。老友相逢，又是拥抱，又是欢呼，并相约去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

## 第十四章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和国恕连在中央文革接待站整理完白如冰的材料后，正是清明节的前一天。4月5日早晨，我们两人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欲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上午九时许，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徜徉的我和国恕连，忽然看到一队又一队抬着花圈和周恩来巨幅画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很快，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中午时分，事态方见明朗，原来是悼念周恩来。看似自发，实则是经过严密策划和精心组织的。其后台确是邓小平，邓小平还亲自去广场窥探过。

十二时，在人山人海中响起了哀乐，奏起了《国际歌》。一帧帧白色横幅上，用黑体字书写着“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标语。雪花般飞舞着传单，我捡起传单一看，竟是声讨王、张、江、姚的檄文，有的文章则十分露骨地将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你看，“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也不再是愚不可及”。这不分明是暗喻毛主席吗？

有一个留有寸头的小青年，跳到一辆车上，冲着麦克风高声喊叫：“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面对这壮烈的场面，我无法苟同。我对身边的国恕连悄声说“这分明是假借悼念周总理的名义，将矛头指向主席！”国亦愤然道：“这是以死人压活人，干扰批邓！”我们忍受不了这气氛，便相偕离开了广场。我们去文革接待站递交了

关于白如冰拒不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材料，第二天便各奔前程了。

我回到淄博后，方逐渐知晓这次事件被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匈牙利纳吉政变的重演。我庆幸自己没陷身其中。

邓小平被指责为此次事件的黑后台，成了邓纳吉，再次被撤销职务。华国锋在天平上的砝码加重了。事到如今，可以斗胆谈一下对周恩来总理的评价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林彪的崛起，刘少奇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陨落了。而唯独周恩来毛发未损，依旧伴随在毛主席身旁。无论是1967年的“联动”也好，还是“五一六”也好，都曾提出过炮轰周恩来的口号，但这些都是昙花一现，瞬间便销声匿迹了。相反，却被以周为首的老干部所利用。1969年之后的“复官运动”，正是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把利剑。邓小平的复出及整顿，不过是代替周在前台的表演罢了。1970~1971年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把否定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极致。尽管林彪、尤其是江青，曾多次欲将锋芒指向周恩来，但均遭到毛主席的痛斥。因为周在党内、尤其是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着不可动摇、无可取代的作用。难怪乎深谙此点的毛泽东针对江青“批林批孔批大儒”的主张，针锋相对地批道：“批周必乱。”在权衡利弊后，毛主席还是选择了牺牲造反派、保全周恩来。实事求是的说，周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微妙了。在所有公开场合，他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他是邓小平、叶剑英等文革反对派的坚决支持者，甚至可以说，1976年10月的右派政变，也与周的前期工作是不无干系的。纵观其人的历史，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三人团”的核心，是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只是凭借其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改变了他的历史地位。他是集儒家思想精粹

于一身的集大成者，是真正的中庸之道专家，是真正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力量的总导演，总设计师。正是由于其两面派的嘴脸不易被识破，所以成了几十年来尤其是十年文革中无人敢碰的圣人，并因此赢得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威望。其国际威望甚至到了超越毛泽东的程度。以致“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律条。不是吗？攻击周总理，也是我的主要“反革命罪状”之一。科学地说，周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不是毛泽东主义者，而是与邓小平一样的实用主义者，是植根于儒教土壤上的典型的儒家学派的代表者，虽没有著作，但他是儒家学说最好的践行者。而儒学在中国所有的阶级、阶层中，其影响都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广大工人农民中也莫不如此。所以，毛泽东激进的反孔立场，在纵横捭阖的周恩来面前必然遭受失败，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然而，周恩来在 1976 年 1 月 7 日便先于毛主席八个月离世了，所以，有关周的一些是是非非，也就成了不解之谜，世人所能看到的，无非是罩在他身上的那一圈迷人的光环，而把真实的周恩来掩盖了。有一首诗写得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躬下士时，假设当时身便死，一生功过有谁知？”白居易在诗中的假设，如果用在 1976 年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是何其相似乃尔啊！假设周恩来死于毛之后而不是之前，周的光环能维持多久呢？然而历史既然做出了如此精准的安排，那些难解的历史之谜，那些晦涩的故纸堆，就只好听任老鼠的牙齿了。

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我以为，用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一句经典来概括周恩来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打着 B52 的旗号，打击 B52 的力量。”自然，毛头小子林立果不过是说冒话而已。而真正将此运用到炉火纯青地

步的大师，却非周公莫属也。像周公这样全身而退的宰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真正做得最好的，确属凤毛麟角了，究其源，则须看其对孔孟思想的造诣如何了。在这点上，周可说是前无古人了。

纵观像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在毛泽东脚下倒下的，何止一人，而唯独周公不仅毛发未损，且得善终，危乎高哉，巍巍周公。真不愧为当代之伊尹，当代之周公啊！相形之下，那些叫嚷着打倒他的人物，不过是一抔黄土，而周公则是耸入云霄的高山！

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将周恩来的威望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这也是一次人心的测试，它标橥着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表明毛主席推动历史的步伐走得太快了。它表明中国大多数人还睡在民主革命的美梦之中，它表明了中国的人心在周恩来、邓小平一边。多数人并未觉醒，他们在埋怨毛主席：太快了，太快了。对此，只有王震觉悟较早，他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错了，王司令，错了，三五九旅的英雄！毛主席的深邃历史眼光，科学的洞察时空，岂止是短短五十年啊！你过低地估价了毛泽东，也过高地估价了自己。不过，在王震那样的水准上，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已洵属可贵了！历史翻到了公元1976年9月9日，巨星陨落，一代伟人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从都市到农村，从闹市到里巷，千家万户，男女老幼，无处不闻恸哭声。请问历代帝王，有哪个曾赢得如此人心。而我的悲恸，比常人更甚。说如丧考妣，毫不为过。乍一听到消息，几乎绝倒。从懂事起，便开始读他的书，从“老三篇”，到《实践论》《矛盾论》，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民主革命时期的著述，到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的著述，真可谓无书不读。雄文四卷，字字珠玑，我真的差不多都背得来。凡听过我演讲的人，无不击节赞叹！有的地方盛传我对毛主席著作倒背如流，甚至有一位听过我演讲的年轻人这样说：“我没见过毛泽东，但我见了董学诚，董学诚就是当代的毛泽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人们把我夸张了，神化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确是毛主席的嫡传弟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林彪说过：“有毛主席在，我们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他老人家在，即使我变成了孙悟空，如何大闹天宫，也是有恃无恐。尤其是1973年7月汇报会的发言得到他的首肯之后，我就更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狂妄至极，目空一切，甚至也以工运领袖自比，而且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膨胀。

然而今天，伟人溘然长逝，我顿时傻了，懵了，不知所措了。我躲进爱巢，看着同样红肿着眼睛的清香，不由相拥而泣。良久，我才打开日记本，挥笔写了一首“七绝”：

巨星陨落黯山河，  
神州十亿起悲歌。  
亿万工农齐奋励，  
大纛指处斩阎罗。

写罢，意犹未尽，遂又写道：

共产赤帜指航程，  
千秋万代永不落。  
我劝天公重抖擞，  
继续革命慰巨擘。

夜晚，我们相依躺在床上，我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地对妻子道：“领袖去世，国难当头，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啊！我最担心的是中央会出修正主义。如果那样，可真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我少说也得坐牢了。”

她搂住我的脖子，满脸凄楚：“那我咋办啊，多孤单啊！”

“要相信毛主席播下的火种。中国是不会像苏联那样的。因为中国已进行了巴黎公社式的预演。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右派得势，也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答应的。”就这样，夫妻两人在悲切中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1976年10月下旬，社会上已流传着“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一天中午，王化明把我约到他家。他家在岭子公社张家庄，离王村铝土矿极近。他原是淄博八中的红卫兵，其父是王铝的一名老工人。在其父的引荐下，我俩相识了。王早已对我崇拜有加。在这次见面之前，已有了一年多的交往，加之神交多年，算是老朋友了。

王还请了几个同学。在酒席上，我说道：“中央现在发生了右派政变。华国锋叛变革命，他不过是袁世凯称帝而已，弄不了几天。右派真正的领袖是邓小平。他肯定会复出。右派必然会抬他出来的。”我话音刚落，王化明、史庆山他们众口一词地劝我逃跑。我反唇相讥道：“现在是中央集权，能跑到哪里？越境？我可不能叛国！主席不在了，大不了杀头而已。我义无返顾！我会像许云峰那样，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

**第三部**

**十年炼狱**

## 第一章 隔离审查

我在心神恍惚中煎熬。1976年11月15日晚7时许，我正在王村铝土矿井下上班，矿保卫科科长带领着两名便衣警察和两名武警将我带到了保卫科。片刻，一位四十多岁的秃顶胖子向我宣布道：“我们是市委清查办的，根据省市委决定，自即日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这比我预想的结果还要好些。我原以为会直接被捕的。

签字画押后，我被两名武警塞进一辆吉普车，然后，两人便紧紧将我挟持在中间。吉普车急驰在雪花纷飞的旷野里。望着车窗外飞舞的雪花，我的心阵阵痉挛着。首先，自然想到了妻。是啊，正如不久前她在枕边说的那样：“我多么孤单啊！”其次，是刚降生四个半月的儿子。可怜的娘儿俩，怎么过啊！

十年后，当我出狱时，听清香向我泣诉道：“76年11月15日晚，四个彪形大汉，直冲家里的小楼，开始抄家。他们主要是查抄文件、笔记、书籍、通信之类。同时，通知我你被带走了。想想，当时我多傻啊！第二天，我还坐火车到王村铝土矿找你。人家才告诉我说你被隔离审查了。听到这，如五雷轰顶，直接站不住了。好不容易，捱到王村车站。上不去车了。腰部一阵剧痛。最终，幸亏人家乘务员把我搀扶上了车。到医院一查，急性肾炎，三个“十号”。

事情过去四十年了。当我写到这里时，依旧止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当时，她刚满25岁，之后的路，她该怎么走啊！她是那么天真，那么善良，那么温柔，又那么胆小，她如何

才能承受这天塌地陷般的苦难啊！幸好，赖有她对毛主席的一颗忠心，赖有对我这样一个忠贞不渝的革命志士爱人的坚贞不移的信赖，她才用柔弱的双肩掮住了黑暗的闸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依仗她的父母，她的父亲刚刚退休，正是赖有父母的鼎力呵护，她和孩子才总算没掉落地上。

从结婚到隔离审查，恰好一年零四个月。而孩子则刚出生四个月。这苦难的命运，突然降临到这不幸的家庭里，我无法想象，她如何承受得住如此的重创！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汽车在一个大门前停了下来。我定睛一看，大门右侧的木牌上，分明写着“淄博市看守所”六个黑体大字。什么隔离审查！这分明是被捕或刑事拘留啊！借改变事物的名称以求改变事物的本质，是人类天赋的诡辩。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一下子跃入脑际。

我被押解着穿过一条长廊，来到了所长办公室。所长姓陈，阴着脸，将我的腰带、鞋带、钥匙全部收去。最终将我投入长廊尽头右侧一间单身牢房，遂即，铁门哐当一声被锁上了。门口，立即站上了荷枪实弹的哨兵。好了，革命了十年，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生死不顾，今天终于来到了这安谧的、宁静的港湾。

“这里是陀罗斯，就在这里跳吧！”这大概是维吉尔的诗吧。

牢房内，有一股骚臭味。冲门的北墙根，是一溜木板钉成的通铺。我坐在铺沿上，仔细查看四面粉墙上密密麻麻的斑斑血迹。我不解这些血迹的来历。

稍倾，看到一群吃的滚圆的紫黑色臭虫向我袭来。我恍然大悟：原来它们就是这血渍的提供者。

约过了一个小时，门外传来哨兵的呼喊：“睡觉啦！”

从其他牢房，传来稀里哗啦的金属撞击声。传来不停的

哈欠声和粗野的叫骂声。随后，一切归于寂静。我伸好铺盖，斜倚在被子上，大睁着两眼，搜寻着臭虫的踪迹。对不幸的落网者，施以粉身碎骨的报复，脸上透露出狞厉的笑。

这一夜，我无法入睡。一是，瘆人的臭虫，二是，可怜的妻儿的惨相，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让我如何睡得着。

次日，七时许，走廊里传来“放茅”的喊声，接着是依次的开门声，继之是哗啦啦的金属撞击声。当我跟着陈所长来到院子里时，看到一波一波的人犯从我眼前晃过，那金属声原来是几个人犯的铁镣发出的。那铁镣的环，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故而发出不同的声响，拼成了一组特殊的音响。

漫长的白天开始了。我端坐在铺上，两眼呆呆地盯着斑驳陆离的天花板出神。窗外，传来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铿锵有力的郭沫若填词《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  
粉碎“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铁帚一扫光。

我瞑目细品着那坚硬如铁的旋律，咀嚼着“才子加流氓”郭沫若的文笔，禁不住悲从中来。万缕情丝紧紧缠绕着我。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派不堪的场面：疯狂的抄家，犬吠般的训斥，妻子红肿的泪目，襁褓中婴儿的哭嚎。一桩桩，一件件，犹如万箭穿心，令我肝胆俱裂。我想宣泄一下，但苦于无纸笔，稍倾，灵机一动，想起了牙膏皮。我尝试着，拧去盖子，用其头在书页上一划，居然留下了黑色划痕。我大喜过望。幸好这袋牙膏马上要用光了。于是，我洗净牙膏，将牙膏皮

用手捲緊，成一小圓柱，然後將其置於水泥地上，用鞋底猛搓，竟然搓成直徑不足一毫米的細棍兒。這足可當鉛筆用了。我欣喜若狂，立即嘗試著在妻子剛送來的魯迅全集扉頁上寫道：“休言牙膏皮，大慰平生計，它年若遂志，定謝爾美意。”

必須指出，這所有工作，必須時刻注意避開門外的哨兵。他們每兩個小時換一次崗，專門“保護我的安全”。整個看守所只有我一個配享這樣的待遇。也真是難為這些身穿軍裝的農民子弟了。他們是多麼辛苦啊！

我珠淚瑩瑩，心痛欲裂，思及妻兒，忍不住用“鉛筆”在一本科學全集上寫道：

憶秦娥

念君切，

淚淚凝血愁難却，

愁難却，

悲思無盡，

肝膽俱裂。

昨夜幽夢到君側，

與君相攜伴殘月，

伴殘月。

星河闌珊，嫦娥嗚咽。

寫罷，意猶未盡，又信手譜成曲子，歌之詠之，聊以卒日。我一腔誠摯的愛，深切的情，在牢中低低徘徊着，穿過冰冷的鐵窗，不知能否飛到她的身邊。夢中的她，可否聽見啊！

別說，我不斷輕輕地吟咏着，低唱着，心情竟輕松了許多。於是，我用以疗伤的诗篇与日俱增。几乎每天都有，在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此刻，我所担心的，还不是她娘俩的生活。岳父已退休，在当时他的工资算是很高了，有两老照顾，我的妻儿不会掉到地下。我所担心的是村头小河上那座没有护栏的小石桥。妻子上下班都要骑车经过，万一……

1976年11月17日晚八点，陈所长将我带到第一预审室。辉煌的灯光下，早已布好了阵势，是一派三堂会审的样子。正襟危坐于正中的，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张玉林。我早就认识的。他是一个中等身材，头顶稍秃，刀条脸，一脸肃煞的人。左首是商永震，我不认识，后来听说是八科科长。其长相，的确不敢恭维。大扁脸，塌鼻之上，架着一副啤酒瓶底般高度近视镜。镜片后面，是一对诡谲的斜眼，你猜不透他看人时究竟是冲着哪个方向，你更猜不透他那眯缝的斜眼里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

右首，是一个面目英俊的高个子，姓许，比前两人年轻，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张玉林坚定地说道：“董学诚，你到这已经第三天了。我们奉市委之命跟你谈话。几点要求，第一、‘四人帮’被粉碎已成事实，你不要心存幻想；第二、端正态度，如实向党交清自己的问题。凡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竹筒倒豆子，毫无保留。第三、至于你的家庭，不必担心，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自1976年11月18日起，我便被传唤到预审室交待问题，是笔述。于是，我便把自1973年北京汇报会以来的一切人和事都毫无保留地供述清楚。专案人员无不为我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这样的“笔耕”，持续了一个月。到12月底的一天晚上，又进行了第二轮谈话。张玉林说道：“根据一个多月来的表现，我们对你还算是满意的，但距离还很远。

你要准备在全市范围内，接受群众批判。”1976年12月28日的《大众日报》上，全文刊登了省委书记白如冰在第二次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报告中特别醒目地点了我的名：“淄博有个坏人叫董学诚。此人立场反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到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贩卖修正主义货色。就是这样一个人，王洪文的秘书却一再对人讲小董是棵好苗子，你们一定要好好培养。”从此，“好苗子”这顶桂冠，便正式戴在了我的头上，且直接升级为“四人帮的好苗子”。我每天必读三份报纸，《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淄博日报》。每天的新闻，尤其是《淄博日报》的头版头条，几乎都有我的名和事。我聚精会神，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审视着一篇又一篇的报道和批判文章。白如冰的两顶帽子，坏人，反革命，我不敢苟同。第二天，我与专案组进行了面谈。我义正辞严，毫不妥协，强烈抗议白如冰的污蔑不实之词。张玉林笑着解释说：“不就是领导讲讲话吗，又不是最终定性。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嘛。”我强烈要求他们将我的意见立即上达省委。

不知他们是否按我的要求做了，但几天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们是在糊弄我。因为此后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均称我为“四人帮的好苗子”，《大众日报》竟以“那棵灌满毒汁的毒苗”为题，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将白如冰讲的王洪文的秘书，演绎成了“四人帮”，真是捣鬼有术啊！他们当然不敢将1973年7月30日晚毛主席说的话公之于世。否则，我岂不成了毛泽东的“好苗子”了吗？他们又当作何解释呢？

再说说我的饮食。早上一碗稀薄的玉米粥，两个地瓜面饼子，两块咸菜。说起这地瓜面饼子，需要特别描述一下：圆形，直径约十公分，厚约两公分，面已霉得发黑，生有约

一公分长的虫子，每个饼子里少说也有十几条，又无法捡出来，只好将虫子一起吞下。这饼子苦涩不堪，难以下咽，只好以水冲送，吃了吐，吐了吃，反复数次，方能咽下。中午晚上依旧是两块这样的饼子，添了一碗菜，这菜，要么是在农村喂猪的辊馇菜，要么是又苦又涩的烂茄子。我强迫自己吃。即使用手指头硬塞也要塞下去。因为我得靠这些东西来活，我必须顽强活下去。“艰难困苦，庸玉汝于成也”，只要能维持生命，什么不能吃啊！这猪狗不如的日子总归会有个头吧！

说到睡眠，需翔实叙述一下。冬天没蚊子，还算好说。只是肆无忌惮的臭虫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在我几番强烈要求下，喷了杀虫剂，总算心安了。

但还有令人烦恼的事，那就是其他牢房里不时传来的嚎叫。其中有女人的叫骂哭嚎，听声音大约在40岁以上了吧。每天晚9时许，她便开始用不堪入耳的龌龊话破口大骂，还伴着哭嚎。为不影响他人休息，所长不知用什么东西（后来听说是橛子）把嘴给她堵上了。只剩下乌鲁乌鲁的声音了。

从1976年11月底到12月底，我总共接受了20几场大规模的批斗。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上午九时，在市委交际处的大礼堂正式拉开批判会序幕。我个头本就不高，被两名彪形大汉像老鹰叼小鸡一般一路小跑着揪上批判大舞台。从桌上的数十支麦克风看，参加人数恐怕在百万以上。因为，会议中心会场之外，尚有几十个分会场。会议特意安排了我的好友韩发尧发言。但令我心中窃喜的是，韩是在“明批暗保”。因为他说的都是些尽人皆知的空话，没有一点过硬的事实。

我心中有数，专案组并未掌握什么要害的东西。何为要

害，我自然十分清楚，那就是必须牢牢把握住时间段，即粉碎“四人帮”前和粉碎“四人帮”后。此前的事，肯定只是认识问题，而此后的事，则是立场问题了。对后者，我一直守口如瓶，看来别人也未揭发，暂时骗过了他们。我心中不由暗自庆幸。

证实这一成功骗术的，是1977年“5·1节”之后我与妻子的会面。此前一天，张玉林颇为高兴地告诉我：经请示省市委领导同意，允许我和妻子在看守所会一次面。得知这一消息，我欣喜若狂。我在牢房里一秒一秒地数着盼着，总算捱到了天亮。上午10时许，来到了预审室。妻子怀抱着儿子已等候在那里，我坐下，仔仔细细端详着他们娘儿俩。妻子清香十分消瘦，但依旧清纯靓丽，楚楚动人。不足一岁的儿子刚能蹒跚学步，尚不会说话。我抢上前欲抱他，他竟然趔趄着身子从地上捡起一点小土块，向我掷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逗笑了。

看得出，妻子内心压抑着多么巨大的痛苦，极力装出的微笑也无非是让我不要为她担心而已。

一个小时，不过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废话而已。当我看着她抱着孩子的背影逐渐消失的时候，我的心简直碎了，泪水夺眶而出。回到单身牢房，再也忍不住，失声嚎啕大哭一场。

母子的样儿，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遍又一遍闪回于脑际。我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母子两人的名字，嗫嚅着，哽咽着，心在颤动，泪在奔流，其凄惨状，无法形容。

就这样，一直煎熬到晚上。我呆坐在铺位上，两眼失神的盯着布满蝇屎的天花板，难以抑制的悲愤，巨浪般拍击着我的心岸。我颤抖着两手，悄然拿过列宁的《哲学笔记》，用自制的笔在其空白处写道：

一从消瘦减容光，  
永昼难捱夜更长。  
思君千遍肠百转，  
何日偕舞诉衷肠。

正当我自以为得计，自以为瞒过了专案组的时候，正当我兀自做着回家过年的黄粱美梦的时候，看守所长将我带到了新看守所二楼预审室里。进去一看，我傻眼了，而且一下子了然于胸：大祸临头了。因为迎面站着刑警支队的科长张佩福，一副手铐在灯光下闪着贼亮的光，无疑，这是为我准备的。

张佩福向我宣布了逮捕令。这一天是1978年1月7日。  
我不再住单身牢房了。

我被两个年轻的武警战士押解到一楼的103室。这里，依次端坐着四名囚犯。

## 第二章 死囚的悲哀

室内住着四名人犯。靠东墙根是一名碧眼黄发的二十多岁的青年。说碧眼黄发，并非是老外，只是此人有些异相。他面色奇白，白脸上还稀疏分布着少许粉红色的斑点。略显蓝色的眼球暴突着，天生一副凶相。中间两位，看似干部模样。一个叫倪文玉，一个叫朱志文。靠最西头墙根的，是一个一味傻笑着的疯子，双手戴着“捧子”。所谓“捧子”，是一种限制双手活动的特制手铐。与一般手铐不同的是它中间没有一条钢链。一般手铐可以在这条链子的幅度内活动一下双手，而这种“捧子”则是在两个毗连的粗铁环中间穿一根铁轴，双手无法活动，只能作捧东西状，故曰捧子。那黄发青年，除捧子外，还戴着重镣。相比起来，老倪和老朱比他们两人舒服多了，这大约是因为罪行轻重的缘故吧。朱志文告诉我，他和老倪都是市商业局的干部，因投机倒把被捕入狱的。老朱还悄悄告诉我，右边的白脸青年叫魏千修，是个杀人犯。是因为入室抢劫了二十元钱而惨杀了一个军属老太太，杀人后，又放火烧了房子，焚尸灭迹，真可谓十恶不赦！

老朱早就听说过我。一再悄悄叮嘱我要警惕魏千修。我至今忘不了这位好心的江苏人。

这新看守所比老所条件好多了。这是一座城堡式的钢筋水泥四层建筑，可谓固若金汤。室内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最重要的，是没有了那些令人恐怖的臭虫。但我很担心魏千修的身上会有虱子。因为他昼夜都不能脱衣服，久而久之，

岂能不生虱子？何况我就紧挨着他。

我注意到，自到103牢房后，所长几乎每天都要将其他人犯提出去谈话。只有我和疯子除外。他们回来后，往往都偷偷告诉我，是专案组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我的动态。

入住103室后，我被编为66号。啊！66号，多么吉祥的数字啊。提审时所长只呼号不叫名，名字第一次失去了意义，我终于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符号。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了什么叫坐牢。那是名副其实地端坐着，两腿向前平伸，上身挺直，不得斜靠被垛，不得交头接耳。有事必须报告“政府”，就连哨兵也是“政府”。

老朱老倪不仅是我的团结对象，看来也是“政府”信得过的人。

最难熬的，要算是1978年的除夕之夜了。当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不停响起时，声声爆竹不仅炸碎了它们的身体，而且也炸碎了我的心。我仿佛看到妻子那红肿的泪目，看到儿子那天真稚气的娇样。手铐虽已从手腕上解除，但无形的镣铐依然从精神上不断折磨着我，使我白天如同傻子，晚间噩梦连绵。幸好有老朱老倪的劝解，心情方才好了些。

清明过后，妻子忽然给我送来一床新棉被。我不禁纳闷，天暖了，为什么送被子。我感觉到事有蹊跷，便疑惑地逐个被角搜索，终于，发现在被子一角有一个不易发现的小口，伸手进去，竟然掏出一块白布条，上面显然用血写就的两行字赫然跳入眼帘：魏千修掌握着你的重大问题，望你把这一小包烈性毒药放进他的碗里。我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意思啊，我与这厮素不相识，他能掌握我什么问题？但转念一想，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在狱中自我了断而她已经自尽了啊！我痛苦万状，心如刀绞，泪雨滂沱。良久，我犹豫着将那布条和小纸包投到马桶里，水呈粉红色。于是，我报告了“政府”。

在预审室，张玉林三人听了我的汇报。张玉林在第二天提审时提醒我：“你也不看看那上边的字是谁写的。小滕同样收到了你的血书，你写来吗？”噢，我恍然大悟：这分明是魏千修这个杀人犯暗中乘我不在时写好塞进我欲带回家的被子里，冒充我的血书骗过了妻子，然后又将写好的“她的”血书塞进刚送来的被子里，导演了一出假的“棉被传书”的骗人把戏。怪不得这厮近来总喜欢用席糜子磨成针往脚趾上刺。

十年后，当我回到家时，妻子告诉我，原来她在捎回家的被子里同样收到了“我的”血书，“我”还要她去周村区南阎公社魏千修的家里去看他的爹娘。可怜的妻，用牙缝里省出来的钱，买了价值不菲的礼物，骑着自行车，长驱40里去了魏贼的家。

让我们再回到103牢房吧。一天下午，我从预审室回来，一眼便看到魏千修手里居然拿着一张一寸照在那里把玩。我看，这不是妻子的照片吗，便劈手夺了过来，定睛一看，是儿子搂着妈妈脖子的照片，我气愤填膺，奋不顾身地朝魏千修那肮脏的白脸上横扫过一记响亮的耳光。那厮兀自在嗤嗤地笑哩。我不假思索，将照片含着一腔悲愤，一口吞下。于是，我又报告了“政府”。

很快到了晚上，魏千修被带到预审室去了。不一会，便传来杀猪般的惨叫。我大喜过望，痛快淋漓。但是，连日来，我心中总有一个谜团：魏千修到底想干什么。毒药是他想将我害死吗？但是从他的血书指令来看，他是想让我放到他的碗里，让我实施犯罪。他再趁机揭发，借以赎他的罪。足见，其用心何其毒也。但幸亏我还是清醒的，并未入这厮精心设计的圈套。这厮机关算尽，罪大恶极，三天之后，便被拉出去枪毙了。

这件事的阴影，一直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这真是血的

教训。幸亏上苍垂怜，未使我的妻子再做傻事。但转念一想，她不都是为了我吗？是痴情使她迷乱了理智，以致使她在昏聩中竟没能辨认出那血书究竟出自谁手。但话又返回来说，即使换过任何人也不会想到，从我的手里捎出去的被子里会被塞进别人的血书啊。

日子在单调的重复中到了 197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10 时许，我被带到了预审室。

### 第三章 审判

此时，新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直待19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了。

这是一堂为了避开新的行将实施的法律而提前一天进行的突审。

这预审室变成了法庭。气氛是严肃的，虽谈不上庄严。并排的两张桌子后面正襟危坐着三个人。中间一个人，四十五岁左右，狭窄的脸颊如同刀削，一脸冷峻。我坐下后，那人道：“我们是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现在向你宣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

我一听，火了。好一个“终审判决”！4月25日，淄博市中院一审，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尽管不服，但拒绝了上诉。因为我很清楚，中院宣判，不过是履行程序而已，判什么罪，判多少年，这肯定是自邓小平的伪中央到省市委定了调的，上诉，有何用！但我不能不大声疾呼，声明我的不白之冤。于是，我要来纸笔，向他们写了一份声明，声明我构不成反革命罪。这不是写给高级法院的上诉状，又何来终极判决啊！我猜幕后主使者的用心，无非是假借“终审”的名义，封住我的口，不让我继续申诉而已。

审判长叫陈相坤，他宣布完后，我立即变得歇斯底里：“老子不是反革命！”“判我反革命的才是反革命！”我被两名武警押出了预审室。他们不顾我要求公开审理的一再请求，说什么“按省市委的要求，你的案子不予公审。”

我大呼口号：“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华国锋！”“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随后，又悲壮地、慷慨激昂地唱起了《国际歌》。在押往牢房的长廊里，各个牢房的在押犯人都从门孔里伸出手为我喝彩，整个看守所可说是一片沸腾！歌声、口号声、哭声，此起彼伏，与当年日寇、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共产党人的场景毫无二致！

下面，我就把判决书照抄如下：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淄中法刑字（78）第（46）号

起诉机关：淄博市公安局

被告董学诚，男，三十一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本市淄川区田庄公社转道大队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窃取淄博市革委副主任职务。捕前系王村铝土矿工人。现在押。

上列被告为反革命一案，由淄博市公安局起诉本院，经审理查明：

董犯学诚在一九七三年秋，伙同现行反革命分子牛光春等人，先后两次向“四人帮”写黑信，送黑材料，诬告省市委，陷害党政领导同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积极参加青岛黑会，策划在全省制造大乱，篡党夺权。一九七四年二月，董犯在济南，淄博多次召开黑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成立所谓领导班子，制定行动方案，抢占了省珍珠泉招待所和市革委招待所，拉起所谓“批林批孔汇报会”，煽动停工停产，冲击省市委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污蔑各级党委是“旧机器”，“全面搞了资本主义复辟”，疯狂叫嚣要“停止旧机器转动”，要篡夺省市党政大权，制造山东和淄博大乱。一九七四年四月，纠集同伙召开黑会，策划打砸抢。四月二十二日，煽动近千人，有计划有组织地砸了博山宾馆和

夏庄煤矿俱乐部，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四月二十八日，董犯又与其同伙制造借口，煽动群众，冲击了市委传达中央十二号文件的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并打伤了一名市委常委。董犯还伙同反革命分子国恕连等人，窜至北京，两次去“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秘密联络点送黑材料，诬告省市委。

粉碎“四人帮”以后，董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惑，不仅污蔑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是“宫廷政变”、“军人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台”等等，而且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及党和国家其它领导人。董犯学诚还与同伙秘密聚会，结拜“生死之交”，确定联络人和联络方式，相互表示反革命决心，妄图保存“二线”，窥测时机，东山再起。董犯学诚，极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罪恶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极妙的现代版的“罗织经”。

众所周知，《刑法》是不可溯及的。粉碎“四人帮”之前，是没有《刑法》的，人们所依据的行为规范不过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其后所颁布的各项方针政策。其根据均来自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判决书所认定的所谓罪行，在当时看来，无疑都是革命行为。

其次，判决书诡称我攻击毛主席完全是信口雌黄，子虚乌有。至于说攻击周总理，我需做如下说明。有一次，在王村铝土矿的职工宿舍里，我与一个平时喜读马列的工人李加银一起探讨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时，李问我：“周总理去世了，结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我说：“历史的动力是人民。任何伟人的去世，并不影响历史，历史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动。”我的这一观点难道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吗？姓李的迫于高压，利令智昏，将前面的那些话去掉，篡改为：“董学诚恶狠狠地说：地球照样转动！”判决书还污蔑我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应当承认，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变”后，我确实说过华国锋是“袁世凯称帝”这样的话。历史难道不是惊人的相似吗？袁世凯仅仅当了82天皇帝，而华国锋搞了几天不就被他的主子邓小平轰下台去了吗？叛徒的下场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况且，历史已无情否定了“以言定罪”的悖论，莫说我没有攻击毛、周，即使真的攻击了他们，又何罪之有呢？君不见，邓小平上台后，那些妖魔化毛泽东的跳梁小丑们曾多么肆无忌惮信口雌黄，非但无罪，反倒赢得击节赞叹吗？

更有甚者，判决书还指控我“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按邓小平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已被全盘否定，而我不仅破坏，而且疯狂，这岂不是成了功臣了吗？恰恰相反，我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积极追随者、捍卫者，说破坏，岂不正成了邓小平的爪牙吗？事实是，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文革中尤其在“二月逆流”中，他们组织保守势力为御用军，躲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挑动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军人，血腥镇压造反派，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不就是他们罪恶的铁证吗？由此可见，如果以破坏文化大革命定罪的话，首犯应

该是邓小平才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竟未引述任何一条刑律条款，竟然还恬不知耻地侈谈什么“依法”，试问：究竟依据何法？

1980年1月1日起生效的《刑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由此可见，判决书在这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此前的法律法令政策肯定找不到构成犯罪的任何依据，而新法又未实施，何以定罪啊！为摆脱这一窘境，审判者只好祈助于想当然，祈助于长官意志。

当时，我曾强烈要求公审，但一审法庭孙敏宣布：根据省市委指示，你不予公审。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司法独立的宣传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还是党委说了算，还是长官意志。原本就无法可依，原本就是按邓小平之流定的调子判罪量刑。由此可见，什么不服一审判决可以上诉云云，不过是一些哄小孩的把戏而已。这类谎言，就连法官本人也不相信。

其次，从诉讼程序上说，也是违法的。起诉机关居然是淄博市公安局。当时，检察院已恢复职能，为什么不由其起诉而滥用公安局！

很显然，省高法所以抢在1979年12月31日即新《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实施前一天向我宣判，大概就是为了避免“公审”、“起诉机关”之类的麻烦，以便顺利通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构陷，免招明日新法实施将面临的尴尬局面。因为他们无法公审，如若公审的话，势将无法收拾。因为我势必咆哮公堂，他们亦将因无法可依而丢丑。

必须指出，在市中院及省高院的判决送达回执上我并未

签字。可见，这是一份不完备的“协议”！这是不折不扣的“强奸民意”！

然而，长官意志不理会这一切。于是，1980年1月7日，我被押解到淄博市昆仑劳改支队。

入监不到一天，便被以“拒不认罪”为由，连夜押送到湖田劳改支队。这套把戏，据后来一位知情者透露，为什么要把董学诚弄到湖田，这是省委白书记的指示：湖田去下煤井。不能用法律将我置于死地，那就让煤井的自然条结去结果我。由此便不难看出官场是何等的黑暗，走资派是何等的凶残。毛主席当年预言的那种法西斯专政为什么这么快便变成了现实！

## 第四章 “我没有罪”

1980年1月9日，我总算在湖田劳改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安家落户了。

第一件事便是中队副指导员谢××与我谈话。中队部的墙角下摆着一个圆的铁墩子。它体积不大，最多二十公分高，但看起来很重，足够一个人搬的。谢指导员指了一下那墩子，示意我坐下，顿时，我心头那点人格尊严仿佛被电光石火一样猛击了一下。我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一种比人矮半截的羞辱感将我征服了。由此可见，设计这个矮墩子的人是何等的匠心别具啊，一个墩子竟然寓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它让你尊严尽失，立即变成像驯服的狗那样蹲在角暗里，只能仰人鼻息！

老谢可能想让我尝一尝“一百杀威棒”的厉害吧。装腔作势地说：“董学诚，你可知道你的身份？到了这里，是龙也得盘起来，是虎也得趴下去。听说你不认罪，到这里来，只有老实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我反唇相讥：“指导员，请别误解，不认罪和无罪不是一回事。我不是不认罪，而是无罪可认，只是不服法院的枉法判决。”

“别忘了，我国现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你的案子是终审判决，已不能上诉。”

“申诉总可以吧。当初我拒绝上诉时，他们按上诉来处理给了个终审判决。其用心就是不想让我说话。鲁迅说：‘捣

鬼有术，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未有。’事  
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老谢道：“今后，你想申诉也可以。但是老实改造才是  
唯一出路啊。我们是执行机构，只有改造罪犯的义务。”

“我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我又必须严正声明：我没有罪。”

谈话很不愉快地结束了。

## 第五章 第一次会见

从中队部出来后，在一位中队统计员的引领下，来到理发室。这位统计员是名现行反革命犯，名叫李树英，是崂山县的农民，罪状是向公安部控告过林彪和江青等人。这是个很善良的人，年龄35岁。他可能预先就知道我要来，所以一见到我，就深表同情地悄悄对我说：“老董啊，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啊。这二中队的一把手是韩指导员，他说了算。老谢是装，别听他的。”在李树英带领下，来到负责理发的犯人老季的小屋。老季笑着拿起推子就要动手。我说“季师傅，我也得理光吗？”老季无奈的将两手一摊：“没办法，政府要求一律理光头。”李树英见势从旁劝道：“老董啊，你就别难为老季了，入乡随俗，习惯就好啦。”

我强忍着屈辱，看着一缕缕头发落地，心中一腔悲愤。但最终还是抵不住无情的推剪，顷刻间，便成了一个小和尚了。然后，李树英领我去更换衣服。这清一色的蓝色劳改服，本是解放前及解放初期老农的打扮，被城里人讥为“老勉腰”。帽子是两面长耳的鸭舌帽。这副尊容，真是令人恨无地缝可钻啊！

李树英察觉了我的窘态，劝慰道：“老董啊，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你就顺变吧。”

1月19日上午10点，我被李树英带到大队部去见赵大队长。赵年届五十，习惯歪着脑袋，犯人送其外号为“赵老歪”，一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赵稍稍欠了一下身子，对我说道：“你家属来了，跟我出去接见。”

我跟着来到接见室，顿觉眼前一亮。我梦绕情牵的爱妻正端坐在椅子上期待着。我乍一见她消瘦清癯的面容，顿时失控，放声大哭，遂即破口大骂华国锋，越哭越骂越凶。赵大队长喝止不住。直待妻子再三劝慰，我方稍事平静。她端详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似的。在倾诉完一腔怨恨后，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便问道：“有件事一直憋在心里，百思不得其解，你是怎么想到往看守所用被子夹带血书的？”她愣了片刻，笑道：“你是说魏千修啊，那血书都是他的。我从没写过。专案组的人说：他想陷害你，让你投毒，和他同归于尽。她妹妹还到厂里找过我，被我撵走了。毒药是她送进去的。”

这件困惑多日的悬案总算尘埃落定了。原来，魏千修那厮就是处心积虑想制造一场凶杀案，以便嫁祸于我，与其同归于尽，其用心何其毒也！

第二天，李树英又一次把我带到了大队部。坐下后，赵大队长猛地一声断喝：“董学诚，你又哭又骂又闹，辱骂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严重违犯监规的行为。现严正警告你，如果不听将取消接见，如屡教不改，将受到严惩。”

一听他说到这，我即刻怒火中烧，跳了起来：“我骂的难道有错吗？华国锋叛变革命，草菅人命，制造冤假错案，难道不该骂吗？取消接见，请看着办吧。反正，我不会改变立场，不会接受对我的非法判决。”赵气急败坏，拍案大怒：“你别太嚣张，给我出去！”然后喝令李树英将我带走。他没料到想赶我走我反而不走了。“是你让我来的。干么要我走。我的话还没说完哩！你要不想听，请走开！”赵大队长七窍生焰，怒不可遏，不仅脑袋歪的更厉害，鼻子嘴巴也都歪了。嘴角泛着白沫，继续吹胡子瞪眼。反正我豁出去了，大不了关我几天“小号”，但士可杀不可辱。孟子曰：“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現在正是實踐這一訓誡的時候。我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此時，外面已是大雨傾盆。老趙夾起公文包，氣咻咻地冒雨而去。

目睹這一切，被驚呆了的李樹英翹起大拇指說：“佩服啊，老董。我待了十年了，真是開了眼界了。”我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笑了。

我到入獄隊學了兩天監規，第三天，分配到班組，正式投身勞動改造。

1月22日晚，在中隊統計室，李樹英向我介紹了監獄的結構情況。

勞改支隊，就是監獄，隸屬於山東省勞改局。支隊以下，分四大隊。一大隊采煤；二大隊燒窯；三大隊建築；四大隊機加工、摩修。一大隊以下，設八個中隊，我在二中隊，是負責井下的運輸。其餘中隊，分別是采煤和掘進。中隊設指導員、管教及生產隊長若干。大隊有統計室，中隊有統計室。統計員，簡稱統計，均由政府信賴的犯人擔任。任何隊長，均由干警擔任，犯人無論在何處碰到隊長，必須立即蹲下，然後“報告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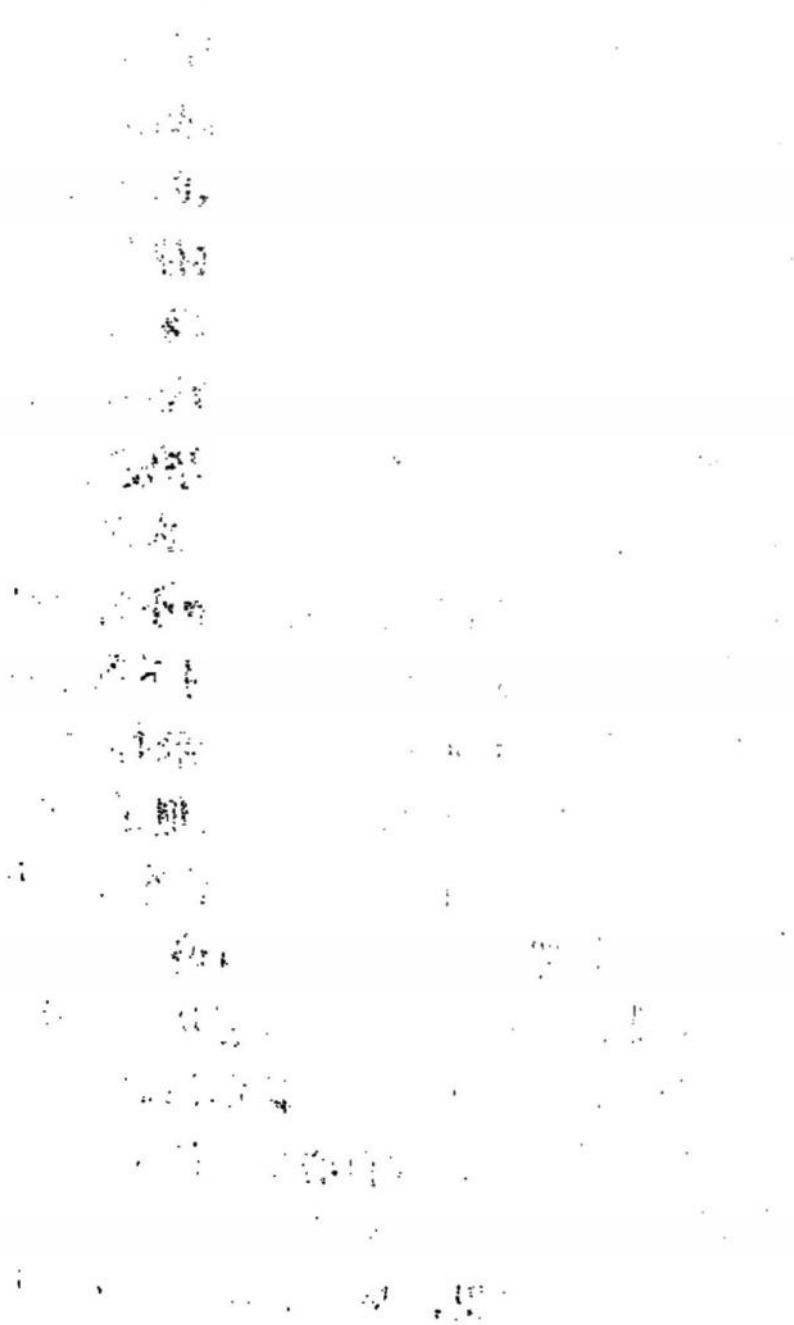
中隊以下若干班組，班組的頭稱執勤員，負責維持秩序、管理生產、組織學習，安排生活。由此可見，獄中事實上是靠犯人管犯人。不然警力有限，且夜裏不入獄，如果不靠犯人管犯人，如何管得過來？

我所在二中隊除李樹英外，還有一名統計叫郭占英，此人四十五歲，性犯罪，他可真是念勞改經念得最出色的典範，賴有他和李樹英兩人的指導，我方能比較順利地過關斬將、度過難關。

我被分到一組，一組的執勤員是個大胡子，東營市人。

罪名据说是偷了生产队养的几头猪。猪能偷吗？它动不动便叫。别着急，自有妙招。弄几个窝窝头，白酒一泡，猪吃后烂醉，就任人摆布了。

大胡子以下是记录员小个子。管着记录学习发言。犯人一个监室约有二十几名，睡的是通铺。我的铺位在东墙根，紧靠着刘恩山。这刘恩山是沂水人，二十五岁，奇瘦，黑脸黄发，鸠形鹄面，脏话连篇，没有一句人话。犯的盗窃罪。此人虽说下作，倒还义气，对我也挺尊重。



## 第六章 由对立到容忍

然而，我从思想上始终无法认同这样的现实：即，我是堂堂正正的革命者，而这里关押的，则全是败类，是人渣，是人类的蠹贼，我与他们是冰炭不能相容的。我的人格是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的。

我在一则日记里写下了此时的心声：

朝与犬豕共餐桌。

暮共蛇蝎同床卧。

本是冰炭与水火，

缘何同室共鸣呃。

不料，这首诗被经常临摹我的硬笔书法的大胡子发现了，不久，即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监狱的规矩，除了八小时（井下作业大抵需十小时）的苦役外，便是近半日的学习。学习内容，无非是时下颁布的法律、法令、法规、时事政治及监规等。学习开始时，大胡子及小个子把他们各自的“劳改经”倒背如流的大侃了一番。每个犯人都端端正正地坐在各自床前的马扎子上，个个神情肃穆，一丝不苟，发言，无非都是些重复了几百遍、几千遍的陈词滥调，什么“认罪服法”啦，什么“改恶从善”啦，什么“立功受奖”“减刑早释”啦等等，尽管谁都知道，这些“劳改经”念得滚瓜烂熟的家伙们各自心里想的是什么，但谁也没兴趣去戳穿它。

在一片“劳改经”的诵经声里，是不允许任何人唱反

调的。倘有人敢造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将遭到围攻乃至关“小号”。

在忍受了一段沉默后，终于在1980年3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爆发了：“我之一案，与任何人都不同，我不是犯人，我不应享受和你们一样的待遇。终有一天，我会得到平反昭雪。我是无辜的蒙冤者，我无罪，自然谈不到认罪服法，也谈不到什么改恶从善，更不愿去争取立什么功，受什么奖。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你们认为是荣誉的事，我认为是耻辱的。我一听到‘改造’二字，就反感，这是对我高尚人格的侮辱。当然，在阶级社会里，人人都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但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改造，前者是强制性的，后者是自觉的，能动的。我的改造不属于前者，不需要监狱这样一个暴力环境。我的态度就是，时刻以高度的革命警觉性，用一道无形的围墙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不受任何侵蚀和污染，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迷失自己的本性！我不能丧失自己的原则立场，不能把一个完美无缺的革命者改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罪犯。周敦颐的《爱莲说》里有这样两句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亭亭净植。香远益清’。这便是我。”

在我的发言过程中，秩序井然，鸦雀无声。

但当我话音落地后，记录员“小个子”跳了起来。只见他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听了董学诚同犯的发言，我认为是非常错误的。你冤不冤，这里管不着。但既然判了刑，就得老老实实服从管教，接受改造。”

“好一个服从管教，接受改造，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早知如此，何必去做贼啊！”我大声呵斥。小个子并不示弱：

“不错，我是犯了罪，过去确实疏忽了世界观的改造，才误入歧途。”

这小子以守为攻，博得了其他人的同情。于是，众志成城，一起向我开起了火。

大胡子看准火候，开始发难：“董学诚同犯，这里是监狱，不是请你来做报告的。放下你的臭架子吧。你是反革命犯，是重刑犯。你大放厥词，攻击政府，污蔑同犯，我们不能容忍！”

“反革命”三个字，恰好戳到节骨眼上。本来，一听到“同犯”、“改造”这类字眼，我就倒胃口，更何况这枉加的“反革命”三个字竟出自这般畜牲的臭嘴里！

我怒不可遏：“你不要卖弄，不要乱扣帽子。漫说你这副嘴脸，就连省委书记白如冰之流，都是败军之将，更别说你这头蠢驴了。”

“大胡子”气急败坏，目示了一下平时与他一起吃饭的一伙小喽啰。但令他失望的是，这帮东西不成器，此刻竟然都变成了哑巴。“大胡子”只好自知没趣地坐了下来。

而那一向以“反改造”著名的“滚刀肉”刘恩山，则扯起嗓子，阴阳怪气、油腔滑调地唱起来：“铁门呀铁窗呀铁锁链，我在那牢中受熬煎。”使全体人员忍俊不禁的哄堂大笑了起来。

学习是无法正常进行下去了。“大胡子”只能徒唤奈何。因为，“好汉怕急汉”，像“滚刀肉”这样一个飞檐走壁、敢走钢丝，竖起屌来无荫凉的无赖，他不能不惧怕三分。

然而，“小个子”却硬了起来。他把会议记录朝地上一摔：“找队长去，我不干了！”话虽出了口，身子却没动弹。

“大胡子”见同伙如此，嚯地站了起来，露出了地痞流氓的本色，手指着我的鼻子大骂：“董学诚我翕你娘，我日你八辈祖宗！”一连串的脏话，伴着臭哄哄的唾沫星子从那两片血红的嘴唇里喷出：“你把我们比作蛇蝎猪狗，你是啥？”

我看你是根屌！”

在监狱，凡向队长打报告揭发他人的行为叫“办人”，而被揭发的，则叫做“挨办”。

此后，我被“挨办”了。

韩宝勤指导员第一次找我谈话：“我们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我从事劳改工作二十几年了，对于犯人的心理算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对于他们如何对付政府的手段也一清二楚。你刚入狱，还不了解他们，所以，我要给你平等地谈一下心。”

韩的口吻是亲切的，不像被我击败的赵大队长那样盛气凌人。

他方正的、黝黑的脸上，分布着端正的五官，睿智的双眼闪烁着温馨的光泽，薄薄的嘴唇上洋溢着微笑。他，一米八以上的身躯，宽厚的胸膛，开阔的双肩，这个铁塔般的鲁北汉子，浑身充满了蔑视一切、威武不屈的气概。

据说，他为不少含冤负屈的犯人伸张了正义，也为不少重新犯罪的家伙课以重刑。为此，他赢得了犯人们的拥戴，被誉为“韩青天”。

青天，真的是青天吗？我倒要拭目以待。

“指导员，既然是平等交谈，那我们就不管各自的身份了，那就让我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吧！”

于是，我翔实历数了我的全部案情及审理经过。然后，坦荡直言：“像我这样一个在文革开始时年仅十八岁、不谙世事的少年，心中唯有对党，对毛主席的一腔赤诚，哪来什么反革命意图？如果说文革错了的话，责任也应由党中央负责。我认为，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并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应当将其视作一个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我党在同历史上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从来没有注重个

人责任，而是着重寻找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像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像汪洋大海一样，这个阶级的存在，不可能不产生诸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像我这样一个纯洁无暇的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这些错误思想的裹挟。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在面临清算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应去积极探寻产生错误的根源，而不是着重追究个人责任，更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直说吧，指导员，就是一万年以后，我也不服！”

韩宝勤仔细听着，认真记着，谈话持续一上午。我的心里，有一种入狱以来从未有过的痛快。

临末，韩说：“你的案子，属终审判决，上面通知说不准申诉。在这里我要忠告你，不要和这些罪犯搞冲突。你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你要学会和他们善处。这些家伙正经心眼没有，但论搞歪门邪道，你可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你必须处处小心。不然，弄出意外，我们也不好说话。关于你的申诉请求，你先沉住气等等。我们会积极为你争取。”

“大胡子”等人本来期待着我被关“小号”（一种只能趴着出入的像棺材一样的水泥房）的，万未料到反被韩指导员安抚了一番，实在是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实在是太不符合监狱的惯例啦。

但是，活生生的现实回答了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对我改变了以往的态度。

那么，“大胡子”他们是不是真的心悦诚服了呢？他们的心里，还憋着一口未出的鸟气。

半月后发生的一件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自我入狱后，时常隐隐约约听到犯人之间搞“鸡奸”的说法。而且，曾发生过因“争风吃醋”而险些闹出人命的事。

发生在我眼前真实的一幕，佐证了这些传言非虚。

那是1980年4月下旬的一个井下夜班。大约凌晨3点钟了吧，忙碌了半夜的犯人们终于可以稍稍迷糊一阵了。他们坐在地上，背靠一块“引板”（一种支护用的木板）呼呼噜噜地睡过去了。

一向“保持高度警觉性”的我，从来是不在井下睡觉的，便在巷道里来回不停地溜达。四时许，我到一条已经废弃的死巷里小便，忽听到不远的暗角里传来一阵阵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循声望去，原来是两个影影绰绰的人正在那里“入港”。无疑，这就是传闻中的“鸡奸”了。我可真算是开了眼界了。我一阵恶心，扭头便回到工作现场——北一轮子坡。

时隔两日，狱内纷传强XX与战XX的风流趣闻。但出乎意料的是，我竟被卷入了“办人”的陷阱。

记得是在我撞见强XX与战XX的第二天夜里，当强XX从北一场口经过后，“大胡子”大声说：“披着大褂子偷驴——人物人不办人物事！”我问啥意思，“大胡子”不齿地说：

“强XX和战XX偷腥，不是你报告的？”我恍然大悟：昨夜碰见的正是他们俩。但“大胡子”诡称是我报告的，这明明是在陷害我。碰到这种晦气的事，后悔还来不及呢，谁还有心思去管那闲事？况且，这也有违我做人的规范——去打小报告。

说起这强XX也算得上一大队出将入相的一个人物啦。此人是震惊全国的青岛1975年“2·4”事件的案犯之一。当时，正值邓小平复出全面整顿的紧要关头，光天化日之下，一妙龄少女被一群流氓团团围住，脱得一丝不挂。这事就发生在中山路繁华地段。当时，强XX年方十六岁，因年幼且情节显著轻微而被判了十五年。两年后，作为一名成年罪犯从少管所转来。他来到这一大队二中队后，一直担任井下电

工。这个工种，又轻快，又自由，且可在队长带领下任意出入监狱，还能破格从外面搞点白酒之类的违禁品进来。

酒，在狱内绝对是第一号违禁品。当然，为了给下井人驱逐寒气，他们是可以少量饮点酒的。但只能是每天下班后排着队由值班的老季用一把铁勺子发给他们，且必须当众一饮而尽。

然而，这像鸦片一样在狱内屡遭查禁的酒，对强XX来说，却易如反掌，视同儿戏。所以，很多犯人都向他靠拢。（这对于“靠拢政府”的高调是多么尖锐的讽刺！）

绰号“小三”的战XX是一个河南籍的后生。这小子生得唇红齿白，眉清目秀，煞是可人。在这清一色男性的世界里，这“小三”自然将那些耐不住寂寞的人，尤其是那些性犯罪者馋得神魂颠倒。且这小子嗜酒如命，三杯酒落肚，小脸儿更是妍如桃花，着实不亚于女郎，自然成了强XX的猎物。

那晚我在井下所见，正是这一对尤物。

打那以后，二人每见到我，总要低眉顺眼绕道走。然而，自搞鸡奸的绯闻传开后，他们便明显对我产生了敌意。尽管我对此一直守口如瓶。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颠扑不破的千年古训被颠覆了。

鬼真的上门了。而且找的就是我这个没做亏心事的。

这天上午，全组正在学习。“小个子”读了几分钟的文件，一向沉默寡言的战“小三”一反常态，冲我开炮：“咱组的董学诚，拒不认罪，扰乱人心，破坏狱内的正常秩序，应当严惩。”咦，别看这绣花枕头，关键时刻，这“劳改经”背得还挺顺溜嘛。

战“小三”说完，“大胡子”挥戈上阵：“董学诚同犯，太清高，他竟然把我们比作猪狗蛇蝎，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满腔愤怒，我成了众矢之的。

“小三”跳将起来，手抡马扎子朝我头上砸来。我抬手一挡，不料左手中指被别在两条撑子中间，战力猛，中指第二节顿觉断裂般剧疼，

我急欲扑过去厮斗，却被“大胡子”、“小个子”拦腰抱住。

面对此景，我有何解释呢？去医务室做了正骨术，仍感钻心剧痛。我再也不顾及什么“办人”之说，迳直向韩导员讲了个备细。

于是，韩指导员怒冲冲地大步赶来，当场宣布将“小三”禁闭三天。

我伤了，“小三”禁闭了，“大胡子”、“小个子”却笑了。

我猛然醒悟到这是早有预谋的一次陷害。这是“大胡子”暗中策划，战“小三”台前表演的一幕闹剧。

这个苦头，使我联想到不久前一个历史反革命犯李占银向我讲的一个故事。梗概是：有的执勤员就是牢头、狱霸，是惹不起的。过去，狱内盛行一种“熄灯会”。何谓也？原来监狱乃是一座真正的“不夜城”，夜晚是不能熄灯的。但是，如果某人一旦得罪了执勤员，一到夜深，队长们都出狱了，于是，按照事先的策划，把灯一关，拉过被子蒙住某人的头，众喽啰拳脚齐下，将你打个半死。你却不知是谁打的。

这次事后，当我再次见到老李时，老李安慰我：“伙计，你这算不错了，了不得呀！”

事后，我思之良久。记得从前读过《萨哈林游记》这本书，据说契诃夫为了写这本书，曾到过流放地与苦役犯一起生活了五年。但书读过后，亦觉茫然。监狱，的确是一个特

殊的社会。这里，没有了性的差异，难免将他们变成“性倒错”者。试想，和尚道士尚有尼姑道姑补充，而监狱，这一扼杀人性的工具，是何等的野蛮，何等的残忍啊！难怪维克多·雨果把监狱视作制造犯罪的温床！

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在这个特殊的国度里，聚集着大量的人类的渣滓，也夹杂有少量的精英。只要进了这个门，绝大部分人的人性无一不被扭曲。难怪一批又一批的“二进宫”、“三进宫”，这不正是这个温床培育的结果吗？只有少数像我这样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修养和道德修养的人，能够抵御住来自四面八方的侵蚀，而继续地保持着人类的童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是，谈何容易啊！

我想到了列宁讲过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与过去的一切专政，在本质上并没什么区别，因为二者都是暴力。但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过去的一切专政，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

我还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首倡的“群众专政”这种最好的专政方式，即将犯了罪又罪不致死的人戴上帽子在群众中监督改造他们。罪犯不脱离家庭，仍可享受天伦之乐。此乃人类史上一种最文明、最人道的专政形式。遗憾的是，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新生事物一样，这种崭新的专政方式也被邓小平否定了。而邓小平所恢复的，依旧是史上最腐朽、最野蛮的专政方式，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不停制造着犯罪的温床。

记得沙皇统治下的“十二月党人”吗？这些沙皇制度的颠覆者，这些民粹主义者，当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当局还允许他们的妻子与之相伴。读过列甫·托尔斯泰《复活》的人们都该知道，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为了救赎自己的罪恶，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一直追随受害人玛斯洛娃到流放地。沙

皇不可谓不野蛮吧，但他们仍不失人性的一面。而被标榜为最合理、最进步的专政形式，难道竟连沙皇都不如吗？

## 第七章 两个杀人犯

过去，在我的心目中，凡杀人者一定是长相凶恶，生性歹毒，等同于虎狼之辈，但当我在狱中接触了两名杀人犯后，一下子颠覆了我上述的传统观点。

第一个杀人犯聂XX，是一个长相憨厚近乎木讷的四十二岁的庄稼汉。他是一名复员军人，曾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八年间当志愿兵。在服兵役期间，大队的支部书记一直霸占着他的未婚妻。更有甚者，是在他复员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这个人面兽心的大队书记，竟然当着老实透顶的小聂的面奸污他的女人，小聂再也压不住一腔怒火，于是他抄起了门后的斧头。

悲剧发生了。聂XX吓坏了，于是，他选择了自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另一起杀人案的主人公叫夏君。此案案犯是兄弟俩，弟弟夏臣在别的劳改队服刑。在我面前的这位老实厚道的青年是哥哥夏君。夏君泣不成声地给我讲了下列故事：“咱家穷，我和兄弟都三十大几了，还是光棍，爹娘愁得没法。一九六九年，家境稍好点了，好不容易先给我张罗了门亲。定在正月初六办喜事。一家人欢天喜地，爹宰了一口大肥猪。可大队书记闻讯赶来，还带来了四个扛枪的民兵。硬是逼着俺哥俩在猪的四个蹄子之间绑上绳子，穿上杠子，抬上猪，三里五村地游街示众。晚上回到家，一家人围在一起抱头痛哭，媳妇也黄了，爹捶胸顿足，娘放声大哭。我和弟弟着实按捺不住了。哥俩圆瞪着两双血红的泪眼，赌咒发誓，决定

报这不共戴天之仇，我抄起铡刀，弟弟手持菜刀，冲进书记家，不由分说，大小三口，灭了个满门，我判了死缓，弟弟判了无期，爹娘都七十多岁了，在家无依无靠。”

老夏不到四十岁，边说边哭，把我当成了知己。

谁之罪啊！

假设那第一位书记不霸占小聂的未婚妻，假设第二位书记不把夏家逼上绝路，惨剧能够发生吗？

有位美国学者梭洛说过：“在一个不公正地把人们监禁起来的政府下面，正直人最好的去处就是监狱。”这话用在我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像我这样一个自幼便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热血青年志士，无非就是紧紧追随伟大领袖实践了他继续革命的学说，而且无私无畏，真正视死如归，心无旁骛。而右派上台后却被枉法裁判、投入大牢、蒙受不白之冤，公理何在，公正何在，法理何在啊！

联系到梭洛的话，我反倒释然了：像你这样的正直之士，又恰逢法西斯专政，监狱不是你最好的栖身之地吗？你就别再怨天尤人啦！

## 第八章 头发的遭遇

头发，作为美与丑的象征，自古有之。南北朝时陈后主之爱妃张丽华，长发垂地，光可鉴人，梳头时需站在凳子上，以发美倾倒当世及后人，可谓倾城倾国。《圣经》中卷发垂垂的夏娃，亦为千古美谈。而秃子在世人眼中的丑陋，虽不见经传，但已有近世鲁迅的《阿Q正传》为证。若阿Q者，尚且忌讳由秃而溯及光、亮，而溯及蜡烛，况常人乎！

头发，在狱中更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发的长度，演绎出一系列可喜可悲的故事。然而，喜也罢，悲也罢，虽事隔多年，那内中的辛酸，不能不每每令我扼腕。

1980年元月9日被押入湖田劳改队时，我的着装，尚称时髦：浅灰色涤卡中山装，亮海蓝的涤纶裤，锃亮的三节头皮鞋。这身打扮，在狱内鲜有。唯有头发，长可垂肩，像穴居野人。这是看守所留下的遗产。

上面说过，中队谢指导员曾责令我换掉衣服，穿上囚服。这是极不情愿的事，然而，还是顺从了。

最令我难堪而心怀怨忿的，则是头发。

犯人是不准蓄发的。虽未规定准确长度，但照规矩，必须剃光头。

由此，我想到了辛亥革命时的剪辫子。国人以剃光头为荣，是革命行为。然而在今天的监狱里，则意味着人格的异化，意味着侮辱。

正如同进入佛门必先落发方能使六根清净一样，进入牢门亦必须首先断掉这烦恼丝。

尽管不情愿，也没有反抗。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准囚徒。好在天寒，尚可戴帽。如果不是这特定的环境，旁观者一定会误将我认作家乡山里的放羊人。因为在儿时的记忆里，“羊棍子”就是这么一副尊容。

记得我第一次在狱中会见妻子时，她大瞪着两眼浑身上下打量着我，显然是认不出我来了。而她，卷发垂垂，美丽，娇俏，两相对比，这不是造化弄人吗？

随着春天的到来，那光亮的头皮上渐渐长出了黑发。然而，明媚的春光并没有给我增添任何情趣，相反，使我变得更其“伤春”，因为，帽子戴不住了，又要剃光头，无从遮丑了。

我观其他犯人，对头发的感慨，也是千奇百怪的。

首先，有一般属于知识阶层的人，大概由于他们对美的追求高乎常人吧，无论多么热，都舍不得摘掉帽子。即使烈日当头的夏天，也要罩一顶单帽，尽管帽顶热气腾腾，他们对帽子仍旧情有独钟，不忍心摘下。

其次，是一般年轻的流氓犯，他们无视监规之严厉，每剃一次光头，至少要保留三到五个月，直至变成一个长发披肩的野人方休。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中国监狱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远古人类的化石，大可不必考古学家们去挖掘和考证啦。这群长发怪物蹒跚者，逡巡着，做出各式各样的丑态以此嘲笑者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

再次，有一类人，以嘲讽和恶作剧形式来对待理发。这类人，大抵是一些毫无廉耻的盗窃犯。他们拒绝用推子推，而必须以锋利的剃刀将头皮刮得贼亮，且必须抛出光来。当其光亮的脑袋出现在监室里时，必将引来哄堂大笑：“晚上可熄灯啦”，“节电啦”，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历史反革命”，可谓最守规矩的

一类人。他们在五十年代初就已入狱，且已辗转多处监狱，在长达三十年的囚禁生涯中，除了吃喝拉撒睡，他们对狱外的社会一无所知。他们已麻木，已变成活生生的木乃伊，谁还去在意这几根鸟头发！

还有一位类似于他们的奇人。他是一个盗窃犯，入狱时已逾六十岁。他之对于头发，也像这般历史反革命一样。反正在外面也是剃光头，入狱后的世界对他来说那是太光明、太灿烂了。他多少次眉飞色舞地对犯人们说：“瞎了他们的狗眼，大队公社也些王八臭的想治我，没想到把我送到福国里来了哩！在这里，吃不愁，穿不愁。没想到成了老来福嘛”。从此，“老来福”这个绰号，便传遍监狱，从而也就成就了一颗令人心酸的明星。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故事啊。试问，那般刑释后的历史反革命们，他们的老年与“老来福”一比，岂不是不如呆在监狱里更幸福吗？

不必杞人忧天了，还是谈谈自己吧。自打第一次接见后，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第二次，第三次。因为自五月份后，有了新政策，即允许穿自己的衣服，也可以留短发了。我是多么想让妻子看一下我的新形象啊。

如此以来，相较于我入狱后刚刚出狱的一名“现行反革命犯”李耀祖来，我真是幸运多了。

据传，这位老兄对于头发的执着，真可谓千古第一。

我想，他之对于头发，即使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清初，他也会断然选择前者的。监狱当局苟要对他落发，必定以绝食抗争。禁闭，对他已是家常便饭。然而一绝食，却不能不使官员们大伤脑筋：你总不能因为拒绝理发而将其饿死吧。所以妥协的反倒是一方。

我之所以对理发持妥协立场，是因为我认为：只要坚持

无罪立场就可以了。其余，一切均可以妥协。这并非丧失人格。读者诸君，您以为何如？

## 第九章 井下奇遇记

第一次会见后，我是天天盼，夜夜盼，总想着再一次见到她。

然而，二月过去了，三月亦已过中旬，却仍无音信。我只好反反复复回忆当时她向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她说：“一月十号，我看守所给你送吃的，遭到拒收。人家说，董学诚不在这了。你上法院去找吧。到了法院，他们支支吾吾。第二天又去，他们还不告诉实情。我说，‘你们把董学诚弄到哪里去了。再不告诉，我要满街张贴寻人启事’啦。他们这才以实相告，说送到昆仑劳改队了。我到了昆仑，人家才告诉你弄到这里来了。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厂，我的家，却把通知书送到了你老家。直到你侄子来，我才知道你被判了刑，法院这是玩的啥把戏啊！”

我当时稍加思索，笑对她说：“他们这是在打心理战，意在拖延时间，造成一种假象，让我产生错觉：怎么样，任凭你多么顽固，一看判了十五年，老婆不理你了。好让我绝望，丢掉幻想，向他们缴械投降。你想，老家没人了，谁在通知书上签收，他们又寄给谁呢？我猜他们还有一重险恶用心，即让乡亲们都知道我成了反革命犯了。”

妻听了我的分析，赞同地点了点头。后来，她又到市中院申诉，刑庭的家伙们幸灾乐祸道：“她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现在还来为董学诚跑，用不了两年，就得来咱们法院打离婚啦！”

这帮专以制造人间悲剧为乐事的专家们，自然不晓得“人

间自有真情在”的真谛。

时间到了 1980 年 3 月 20 日，她仍未来。愁苦的心，寂寞的情，残酷的思念，仿佛万只小虫，啃食着我破碎的心。三月料峭的春风，不停吹拂着院内披离的梧桐。那呜咽的声音，不断敲打着我癱瘓的心，禁不住潸然泪下。

时值下午三点钟，我坐在马扎上，伏在长条的水泥板饭桌上，在日记里，以妻子的口吻写道：

为谁憔悴为谁羞，  
为谁断肠为谁愁？  
君是南冠阶下客，  
侬是西厢闺中囚。  
雨丝漓漓似君泪，  
风声凄凄似侬愁。  
风雨绵绵无情意，  
相思源源谁堪倚。

写毕，晚饭未吃，便一怀愁绪，蒙头上床了。

而此时此刻，另一颗痴爱着的心儿也在跃动着同样的旋律。

夜晚，在滕家的小楼上，只身孤影的清香凭窗面对着无情的风雨，含泪伏在写字台上，凄然写道：“生活啊，充满了人类欲望的冲突。与其说是幸福多，还不如说是痛苦多啊！自己的生活不正是这样吗？美好的青春啊，被苦恼污染了。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在追求高尚的爱情，但谁也不能给她下一个最正确、最完美的定义，更总结不出指导人们的理论。我认为，关键在于两个人是否真诚相爱，其他都是次要的。分离的痛苦与其说在肉体，不如说在心灵。而心灵的损失是可以用真挚高洁的爱情弥补的。我绝不会像法院的那帮市侩

们想象的那样，背叛爱情，去做落井下石的罪人。世界上最深的地方——人心；打开人心的钥匙——真诚。”

写到这里，她拭了一下泪水，复又写道：“不要在别人的痛苦泪水中去驾驭自己的快乐之舟吧！当你在行使恋爱自由的权利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遵守起码的社会公德，不要忘记另一颗也会受伤的心。”

这篇日记的落款时间是1980年5月10日。

而清香白天要努力工作，晚上还要照看孩子。她竭力压抑着内心的巨大痛苦，以优异的业绩连续几年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在这里，还有两件不得不说的事，一是家庭的，二是单位的。在我被捕及判长刑之后，原来力主妹妹嫁给我的滕清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从此家无宁日，清香必须不断应付来自这方面的巨大压力。虽然她的父母尽力呵护着娘儿俩，但毕竟是嫁出去的姑娘，岂能长年累月住在娘家。哥嫂的不满全在情理之中。而这一切罪恶之渊薮，均来自我。虽然我是无罪的，但在妻儿身上，我的罪是不可赦的，如果清香不是嫁给我，那将是一个多么祥和的家啊！父亲退休了，本可享受天伦之乐，而我这个不肖之婿，却给她家带来了接连不断的灾难，造成家庭的不睦以及由此给清香带来的巨大压力和伤痛。

第二方面的压力是单位的。应当说厂领导还是对清香高看一眼的。只有个别工人因受不良思潮及偏见的影响，对清香时有微辞。有次，有个姓陈的女工竟当众骂清香“反革命老婆”。清香忍无可忍，叉开五指，向那张胖脸上扇去。那女人仍出言不逊，清香怒极，将一缸子热稀饭向那女人头上泼去，烫得那女人嗷嗷直叫。俗云：“人无刚骨，安身不牢。”清香就是在这种逆境中锻炼出一身傲骨。原来的她，从来不

会吐出一个脏字，可现在呢，骂人的话出口成章。她去监狱看我时，总要强颜欢笑，而转身离开我时，眼泪则成了断线的珠子，完全是个泪人儿。

多少个日夜，我总止不住绵绵的思绪。我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写的诗词谱上曲，一遍又一遍地吟唱着，长歌当哭。“愤怒出诗人，”不记得这话是谁说的了。然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文中的话，我可记得一清二楚：“自古富贵而名磨灭，唯非常倜傥之人存焉。故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修《春秋》；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足，《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不韋遭蜀，世传《吕览》；《诗》三百篇，大抵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我不能再折磨自己了。我必须像先贤一样要求自己。我必须振作起来。而振作的最好良药就是读书和写作。于是，我到支队图书馆找到林栋，给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借书单，将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各国的文学名著都列了进去。林栋对我敬佩有加，照单全借，以致我不得不分几次才将书搬回到监室。

不仅如此，我还报了山师自修大学中文系系，用三年时间进行了广泛涉猎和自修，并动手写作文革史，将满腔悲愤融于笔端。由于过分勤奋，手腕竟累得不能动弹，不得不申请到狱外大医院——中心医院治疗。

读写是振作的良药，但使我更为振奋的，是1980年6月的一次井下奇遇，它不仅仅改变了我的处境，而且改变了我的心境，促使我迅速振作，坚决地与残酷的命运抗争下去。因为这件奇遇使我更加确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真谛。

下列一则日记，翔实记载了事情的始末。日记的题目是《来自神灵世界的报告》。

八小时的苦役结束了。大汗淋漓的犯人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要下班了。

值勤员“大胡子”安排我交接班。下班时间一到，“滚刀肉”率先唿哨着快步窜到前头。其余人，互吐着不堪入耳的脏话，簇拥着离开了北一轮子坡。

在这地壳深处，在这寂寥凄清的井下，我，一个背负着十五年冤狱的囚徒，孑然一身，形影相吊，骤然感到孤寂与凄凉。

时间，已是夜晚十点钟。面对井下惨淡的灯光，我百无聊赖地长叹了一声，钻进了“猫耳洞”式的小小变压器室。变压器是一个防爆的钢铁圆筒，全身屏蔽，十分安全，且全身散发的热量可供取暖。离下一班人到达还有半小时，于是，我用棉袄紧紧裹住身体，倚在变压器上想暂时迷糊一会。

平常，我极警觉，从不敢在井下睡觉。然而此刻，感到特疲倦，竟神差鬼使一般蜷缩在那里睡着了。朦胧中，耳边隐约传来嚶嚶的哭声。寻声找去，望见离北一轮子坡约十米处，有一簇白东西，我迷糊着大着胆子走去。

“嗤 嗤 嗱”……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瘆笑过后，闪现出一张长发掩映下的惨白少女的脸。我魂飞魄散。说时迟，那时快，那白衣少女蓦然跃起向我扑来。我连滚带爬进了“猫耳洞”，紧紧抱住变压器，边挣扎，边呐喊，但那双铁钩似的冰冷的手却紧紧卡住了我的脖子。那少女气喘吁吁地说：

“我叫李春英，今天来向你索命。”我欲喊，却喑哑了；欲挣扎，却被其紧紧卡住。正在难分难解之际，猛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伴随着一道闪电般的火花，轮子坡上空无极绳上悬挂的矿车流星似地冲下斜坡，断了的无极绳像巨蛇一样在轮子坡上盘旋狂舞。水泥板搭成的支护棚呼啦一下塌了下来，矿渣堆成了一座山，堵住了上井的去路。巨大的塌

方激起的气流，龙卷风似的呼啸着。简直不啻是世界末日！

所幸的是，伴随着第一声巨响，那白衣少女不见了。

我浑身大汗淋漓，揉了揉苦涩的睡眼，定睛一看，原来一切照旧，什么也没发生。

那么惊心动魄，竟是南柯一梦！

我按捺不住狂热的心跳，惊恐万状地背起矿灯，也忘记交接班了，疾步向井口奔去。

当我出现在灯光明亮的井口时，举目望见一天星斗，方才明白我还活在世上。

当夜，我失眠了。眼前，总是晃动着那白色的影子；耳畔，总轰鸣着那塌方、欢车的巨响。

第二天一早，我向韩宝勤指导员详述了这一奇异的梦境，我甚至

不相信那是梦，因为一切都那样逼真。

我开始变得不可理喻，变得神神道道。我甚至问韩指导员有没有李春英这个人。坚实的唯物主义信仰，被一瞬间发生的怪异事件摧毁了。

当时，韩宝勤也疑惑地、似信非信地盯着我，沉吟了一会，方才迟疑着说：“你问问孙队长吧。”

孙队长乃是1958年大跃进时来自鲁北平原的一位庄稼汉。湖田煤矿改生建后，随即被提干，现在是一位管生产的带班队长。

我当即找到了孙，向他叙述了梦中所见。孙队长说：“大跃进时，在井下开绞车的女孩很多，其中有一个金岭镇的闺女，因父母包办婚姻，吊死在井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叫李春英。”

我愕然了。难道真是活见鬼了吗？

我可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啊！然而小时候听父亲讲

的虞舜、包拯被诱入井下遭害的故事禁不住一次又一次涌入脑海。反正，不管怎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格言，鼓起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党内资产阶级想置我于死地，连神鬼都不容。我绝不能死，为了妻儿，也为了未竟的事业，为了自己的清白，我必须像虞舜和包拯那样，让敌人的陷害彻底破产，顽强地活下去！

然而，其后几天，我萎靡不振，仿佛丢了魂似的。我向韩指导员道出了苦衷。他批准我休息两天。

第三天，该倒成白班了，我的心神感觉安定一些了，于是，我跟着下井了。

上午十时许，当我开着第一列运煤的电车来到北一场所时。李登俊开始往无极绳上挂卡子，我则开始往卡子绳上挂小钩。当第一个矿车刚启动时，与前梦境一样的惨象遽然发生了。无极绳崩断，矿车如野马般冲下，大面积塌方。一个狂奔的矿车从李登俊身旁擦过，李晕了过去。我因为有梦的警示，像猴子一样跳到“猫耳洞”里躲起来了，逃过了死劫。

紧接着，更深层井下传来消息：地河喷水了。井立马会被淹，要我们立即上井！

当我伴随着潮水般的人群涌到井口时，禁不住长叹一声：“苍天佑我！”

下午二时，井下发来警报，汹涌的地河也已经灌满了矿井，于是，抢险救灾开始了。但要有多少台水泵才能抽干漶漫的地下水呢！所谓的抢险救灾只能落得一句空话，只能供想往上爬的狱警们去编造业绩邀功请赏了。

读者读到这里，也许以为我在瞎编乱造。是啊，我也在自问：这些只有在神话和志怪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故事，怎么会出现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呢？说真的，这件怪异的事情发生后，不由使我的唯物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但事后，在

重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我更加确信了灵界的存在。这种灵界，也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不是吗，“以太”的发现，曾让马赫和阿芬娜留斯之流惊呼：“物质消失了。”

恰恰相反，“以太”已被现代科学越来越多地证实了其客观的真实性。因之，承认独立于我们主观世界之外的这一灵界的存在，不仅不颠覆唯物主义，相反更加证实了唯物主义：一切的存在都是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不灭的，生命是永恒的，所消失的，不过是它以另一种存在方式代替了业已过时的存在方式而已。“李春英”，这个梦中人是那样真切，那样活灵活现，那样不容置疑，如果不是由于她的出现，可能，很有可能，我早就被碾死于车轮之下了。正是由于她的警示，我才得以逃过此劫。而且使湖田生建煤矿就此寿终正寝了。我不用下井了，走资派们想以井下环境将我置于死地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每每忆及此事，我就禁不住联想，也许是我的天大的冤屈，也许是我的妻子对我坚贞不渝的爱情感动了上苍，所以才派遣天使李春英前来救我吧。这虽属胡思乱想，但却又不能不想。这一切，只能祈助于未来科学家们去破解这斯芬克斯之谜了。

## 第十章 “法外施仁”

在读与写、思念和悲愤中度过了两年。我以“沧海横流”为名，以小说体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以文化大革命的史实为内容的小说，但杀青之后，又很不满意，可是，它可以称得上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了。由于过分劳累，手腕不能动了，且疼痛难忍，狱中的医生看不了，不得不由狱警押着到淄博市中心医院诊治。接诊的姜克勤大夫还是我的故交。但旁边有人监视，只准看病，不许言及其他。此刻，我是多么盼望奇迹能够出现，能在这里巧遇我的清香啊。

但是，这只不过幻想而已，谁能去通知她赶来让我哪怕是看她一眼呢。

时光，终于捱到了1982年5月初，妻在探监时向我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法院准备对我无罪释放。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斩钉截铁地说。

然而，妻走后，我不仅疑信参半，而且还后悔不该对她说这样的话。是啊，让她心存一份幻想，岂不甚好吗？

是啊，几年来，我在狱中写了那么多的申诉，妻又在外面不断地上访，且现在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开始强调实事求是的传统，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呢。

夜晚，我甚至做了一个美丽的梦：缤纷的朝霞，纷飞的花瓣，五彩的蝴蝶，碧绿的原野，我像鸟儿一样携妻儿翩翩起舞，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其后，依旧是刻板式的生活。一日三餐为犯人发放饭牌；组织三班倒的犯人集合并清点人数；向食堂报饭。犯人出工

后，例行清扫院内及厕所卫生，为队长们的盆栽及院内的花圃浇水、整枝、松土（此时，我已被韩指导员顶着重重压力调到井上接替了老季成了值班员。）

当这一切完成后，我伫立于庭院内，凝视着那些姹紫嫣红的花儿，沉浸在无边的遐想里。

是啊，大自然赋予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什以如此勃勃的生机，一切的花草、树木都平等地享受着造物主布施的空气、阳光、雨露，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在这里，除了上述一切外，只有一样，却是远不及植物们的，那就是——自由！

倏尔，一只喜鹊落在院内那株最高的梧桐上。冲着我喳喳直叫。我不由心头一喜：莫非妻带来的喜讯要变成现实吗？

鸟儿啊，你这红冠墨羽的生灵，我是何等羡慕又是何等嫉妒你啊，你尚能一展动人的歌喉，为人间带来吉祥，而我为什么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啊！

然而，我又想到那被剪了翅膀、锁在笼中的金丝雀，伊纵有美丽的外表，纵有殷勤的主人精心服侍，然而，伊却像我一样，缺少着最珍贵的东西——自由。哪能像并不美丽的喜鹊那样，自由来去，纵情歌唱呀！

我含着两眼羞愧的热泪，冲进值班室，伏案疾书道：

花儿，娇妍的花儿啊。

我愿作片美丽的花瓣，

但不愿与你一样在泥土中凋残。

鸟儿，善解人意的鸟儿，

我愿作一根美丽的羽毛，

但不愿剪断翅膀关在笼中供人观瞻。

自由啊，多么伟大的字眼，

我多想躺在您的怀中徜徉啊，

哪怕让残缺的斧钺将颈项砍断。

面对五月明媚的艳阳，  
我只能以苦涩的泪水洗着清瘦的颜面。  
愧怍人夫不能奉献一腔的眷恋，  
痛彻我心肝！  
啊，自由，  
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  
当你的美誉横遭亵渎的时候，  
就像纯情的少女被暴力与强权蹂躏；  
我备尝了失去自由的况味。  
然而，  
空对这矗立的高墙，  
仰视这一线蔚蓝的青天，  
自由啊，  
你却唯余下一个徒有其表的字眼！

写罢，我木立着，将双手交叉在胸前，似在忏悔，又似在祈祷，然而，绞痛着的心头，却变成了一片茫茫的荒原。我猛然忆起大诗人歌德的诗：

既然痛苦只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受过铁木尔的蹂躏！

我茫然地仰天问道：“鸟儿啊，当真要自由吗？”啊，苦难即将结束，快乐就要来临了吗？

终于消息座实了。

1982年9月6日，韩指导员偕支队狱政科干事孙兰远找我谈话。

我知道孙也是文革中的造反派。

孙干事向我宣读了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

“董学诚自服刑以来，服从管教，积极协助政府做好狱内管理工作，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奖励。据此，给予减刑五年。”

又是一篇生花的妙文！可算得上字斟句酌、费尽推敲的经典！

可笑的是，与通常的减刑裁定不同的，是规避了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句子，即“认罪服法，确有立功表现。”同时，还“忽略”了一大堆表明减刑依据的功绩和法律条款。

“董学诚，你对这个裁定什么态度？”老孙问道，事实上，这是一句可问可不问的废话。

“这是一份宽宏大量的施舍。但恕我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它违法。很明显，这份裁定是没有理由成立的。我国《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凡服刑期间的犯人，必须是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方可减刑。显然，这一规定被法院忽略了。您两位都知道，我从来都不认罪，更何谈悔改啊。另外，我的问题并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十五年也好，十年也罢，总之，都是反革命。早在三年前的法庭上，我就断然否定对我的非法判决，今天，我又怎能接受这份在维持原判前提下的裁定呢？如果我接受这份裁定，岂不就等于承认了原判的合法性了吗？”

我认为，不仅我不能接受它，劳改队也不应接受它。因为，众所周知，监狱服刑犯人，不认罪不能减刑。我从不认罪，这下非但得到减刑而且减刑幅度之大恐怕是史无前例。如果不认罪可以减刑，那么今后的管教工作如何开展。如果这份裁定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法院至少应拿出点像样的勇气来，

到这里隆重召开减刑大会，对我大加奖励，宣扬我的业绩。试问，那次减刑大会，中院不都派遣一位院长来宣布，哪像我这样，连狱政科长都不出面，单单挑了你孙队长，难道就是因为你的面子大吗？我真佩服支队领导的良苦用心啊！”

我越说越气，越气越说。俨然又回到了三年前的公堂之上。所遗憾的是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因为，无论是韩，还是孙，他们已成为与我朝夕相处的朋友。他们的人性尚未被扭曲，他们既不具备法官们装腔作势的威严，又不具备专为人的命运画句号的权力。如果与他们过不去的话，就显得我太不近人情了。

以往的减刑大会，市中级法院至少要派一名副院长来大会上宣布，而这次绝无仅有的大幅度减刑，却由狱政科的一名干事代表，如果不是太随意的话，那我只有用“做贼心虚”来形容了。

我想，这样说不会有失公允吧。

“那么，老董，这裁定你认为该如何处理呢？”

“哪里来，退回哪里去吧。”

“老董啊，别这么固执。早一天出去，早一天自由。有本事，不可以出去使？”韩指导员也像孙干事那样呼“老董”，而不是直呼其名了。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面对指导员的一派善意，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何尝不想早日与妻儿团聚啊！但是，如果自由还要背负着精神的十字架，那么，这样的自由我宁肯不要。要了，岂不就意味着变节，意味着叛变吗？

总之，我不能够！

“就这样吧。”孙、韩两人无奈地说，满脸遗憾的表情。我昂然步出门去。

在这场堂而皇之的笑剧落幕后，在整个一大队成了爆炸

性新闻“人家董老师一下子减五年刑都不要。法院丢人啊！”

我预料当中的轰动效应果然翩然而至了。这还是未加公布的秘密，试想，倘若法院前来召开大会，以我怨气冲天的性子，将会形成怎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啊！从此后我不仅被广大犯人亲切地称为老师而且也真的成了老师了。我开始向犯人教授技术课。科目是“公差与配合”。

一个月后，韩指导员告诉我：“裁定书法院又退回来了，不再给你本人，正式入档了。”

我笑道：“我早已料到会这样。你想啊，它既然已形成法律文书了，当然也就具有了法律效力，岂能以我承认与否为依据？不是吗，当初我不是不接受判决吗，我还不是照样在这里打劳改吗”。

韩笑，我亦大笑。

据后来一位朋友透露，在我的裁定由法院退回后，法院与劳改局形成僵局，官司闹到省委，书记白如冰如是说：“无论如何，董学诚不能放。”结果，最终达成妥协，由中共淄博市委写了一份专门的文告附在我的裁定书上，退回劳改队存档了事。

这又是“司法独立”的又一雄辩的适例。这可真是“法院实施独立办案”原则的体现啊！就连区区一份减刑裁定，法院都无权作主，如果伏尔泰还活在世上，我想他老人家不至于笑死吧。

后来，方知道，这是根据 1981 年伪中央两案会议精神对原来所作结论重新评估的结果。但又不好说原判失当，所以，才蓄意编造了一篇“我表现好”的谎言，一是让自己有个体面的下台之阶，二是用以蒙骗世人。真是机关算尽啊！可谁想这份体面的厚礼，竟被我这样的傻瓜所拒绝呢？真是好心成了驴肝肺了。可请问真的是好心吗？！

## 第十一章 最后的劝降

黑格尔曾经说过：“任何历史事件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往往出现两次。第一次往往以悲剧出现，第二次却总是以笑剧出现。

老黑格尔的话，说得何等好啊！

作为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案例，固然算不上什么历史事件，但是在 1984 年春节前发生的现实，多少也证明黑格尔上述论辩的正确。

这是 1984 年腊月二十三下午发生的事。

下午三点钟，狱政科赵科长找我谈话。

这个人物在读者眼里并不陌生。他就是前任一大队大队长赵一民，现在是狱政科长了。

读者大概不会忘记 1980 年初对我的那次“约法三章”吧。那时，赵某人是何等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啊！那次谈话的气氛是何等的剑拔弩张、雷霆万钧啊！然而今天不同了。赵科长简直是判若两人。他笑逐颜开，和蔼可亲极了。

春风化雨终于凝聚成如下一番催人泪下的话，甚至对我也不再直呼其名了：“你在这里已经五年了吧，应该有所进步了。我正式告诉你，上级已经决定，哪怕你说一句话，写几个字，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那么，马上释放你，你的工作将比你想象的还要好，你的生活当然也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幸福。”

啊，真是醍醐灌顶啊！真是令人心驰神往啊！

这位一向道貌岸然、严辞厉色的“老阴天”，忽然以天

使般的温柔出现在我面前，还真令我感到不适，难道，提科长后连人也变了吗？

但是，我脑子里的梅尼尔纤维高度活跃起来，话也像决堤的江河：“赵科长，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恩典，但不幸的是，只能让您失望了。我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是啊，追求幸福的欲望乃是人的天性，我又何尝不如此呢？但是我不能背叛自己的良心，罪与非罪，革命与反革命，不过一字之差，一念之差，但有质的差别。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我是一回事，我自己承认与否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不容混淆。假若我违心地承认有罪，那么第一，我将为我的同志和朋友所不齿，他们会视我为叛徒；第二，我也将受到政敌的嘲笑：‘哼，不管你董学诚何等英雄，今天还不是照样从狗洞子里爬出！’第三，我将无颜面对我的妻儿。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冤案，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的。但如果我承认了它，岂不成了铁案了吗？我如期服刑而拒不认罪，自由后仍不失为一条好汉，照样堂堂正正做人。赵科长，您说呢？”

“看来，你是不可救药了！”

“是的，赵科长，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如果我能活一万年的话。如果说这些年来我还有点进步的话，那就是，多少年来一直困惑着我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今天，我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形成的悲剧还得让历史去解决，人民群众对我的评价就是最好的平反。”

老头儿忙乱地戴上大盖帽，收起本子和笔，颓然走出门去。那神情，仿佛在说，没想到，一篇请功妙文，竟让这条丧家犬给搅了。

我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日历，那上面分明印着腊月二十三日，即中国民间的小年——辞灶日。

啊，赵科长选的日子可真是吉祥。在民间，家家户户都要用麦芽糖糊住灶王爷的嘴，以便不让他在玉帝面前飞短流长。今天，我没准备麦芽糖，而是用一通火力十足的言辞将灶王爷赵科长轰走了。不知他如何向他的上峰报告。

三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想到这次酣畅淋漓的谈话的时候，我依旧会发出会心的笑声。但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赵老头所说的超乎我想象的工作和生活究竟指的是什么，终不成让我当中央政治局常委吧，（可我的党籍早就被开除了啊）我怎么竟傻里傻气地拒绝了呢？抑或是像有的人已经捷足先登的那样，给邓小平做干儿吗，我可是“四人帮”的“好苗子”，这是不共戴天啊。还会有什么呢？我早在二十几岁时，就已阅历过地市级的待遇了，还有什么想不到呢？直到今天，这仍旧是个不解的斯芬克斯之谜。不过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被吃掉，不仅没有被吃掉，我还生活在儿孙绕膝的康乐之中。这不是凭借想象，而是在走资派的迫害中自我奋斗的结果。是走资派用谎言和镇压成就了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一个彻底的科学共产主义者。

## **第四部**

### **变身资产者**

## 第一章 初涉商海

日历，揭到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十年的牢狱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妻子清香带着她的妹夫王玉峰及外甥潘军（大姐的儿子），开了一辆尼桑面包车将我接回了家。

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位于河滨小区三楼的两室一厅居然是我的家。“家”这个字眼，十年来，本已变得越来越抽象了，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然而此时此刻，眼前这温馨的一切，完全属于我了。我感谢我的爱妻清香，我真的应该向她请罪。如果说有罪的话，我真的应该向她三跪九叩啊！如果说有罪的话，我真的是负罪于她！是啊，多么伟大的女性，多么了不起的人品啊！十年啊，（不要忘记原判十五年），多少白眼，多少辛酸，多么令我惭愧啊：结婚一年零四个月，孩子才四个月，我便锒铛入狱。且结婚之前，与她相识之时，已是我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苦难岁月。曾有多少追求者，她却毅然选择了我。论长相，我相貌平平，论身高，不过一米六四，用当时的话说，属于“半残”，论职业，一介下工人，为人所蔑视，虽有个市革委副主任的空衔，不过徒有虚名而已，且这个虚衔，本身已预示着灾难。因为邓小平已经复出，毛主席已不能视事，“四人帮”已濒临末路。她敢于选择我，敢于与我相爱，真可谓奇女子也！短短两年，从相识、相受到结婚，她理解了我，理解了我的思想，我的追求，理解了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她认准了我，我不猥琐，不狭隘，是一个无私无畏、光明正大、嵚寄磊落的堂堂君子。她认为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我，不会有错。虽然她父亲已把我

的前途全盘讲给了她，她却义无反顾，矢死靡它，坚定不移摒弃了一切世俗的偏见，毅然决然地爱上了我。如果说十年大狱给了我什么值得骄傲的话，那么，就是两颗相遇相知相爱的心始终在一起，赖有她的忠贞不渝的爱，我才有勇气面对恶魔及群小的围攻，也正是由于她对我的忠贞不渝的爱，所以才使得她排除了来自娘家人及社会上的压力，拒绝了媒人们要她再嫁的诱惑，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苦苦等待着我。而她仅仅 25 岁，正是人生的锦绣年华啊！我所给予她的爱，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与她给予我的爱相比，可谓万不及一。但是，她无怨无悔，面对世俗的偏见，她始终昂首挺胸，不向恶魔让半分。他是我心中的圣女贞德，她是我的骄傲，我真恨不得在盐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泡三次，方能洗脱我在她身上所犯的罪恶！我恨不得对她三跪九叩。啊，我的女神，我的天使，我的圣母玛利亚！

清香操持的这个家，说真的，在当时已经很像样子了。尽管面积不足 60 平米，但收拾得井然有序。（顺便说说，房子是厂里分的福利房）

东间是一张双人大床，靠东山是一架大立橱，是结婚时做的，但油漆一新，西间一张单人床，一对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

墙角还有一台 14 吋的黑白电视机。看到这一切，我的眼睛湿润了，心中仿佛倒了五味瓶。像我这样一个飘零四海的山里娃，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如果没有清香，没有清香的父母，哪里能有我的今天！

昔日的好友，纷纷前来看望。最为莫逆的，莫过于李相德、王铸与程昭湖了。李相德、王铸赋闲在家，程昭湖因省邮电系统同学的保护，还混了个市邮电局副局长。我们在一起，除了感叹人世的沧桑外，就是追忆文革，缅怀毛主席。

鞭挞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之类叛徒。

李相德为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张文升的一家小商铺。这铺子位于我儿子的母校——中心路小学的门侧，不足20平米，名曰“胜利经销部”，这算是刚刚时兴起来的一家个体户。

张文升原是淄博市建筑公司的一名造反派，受其先祖影响，颇具经商胆识，是最早“一个背包一杆秤，跟着小平干革命”的那类商海弄潮儿。

张文升对我既同情又崇拜，逢人就说，见人就讲，很快便把我的大名在他的朋友圈内传遍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有多大的能耐，但底细只有我最清楚。这大小是个商铺，商业，就是商品流通的环节。而商品，就是物质，是凝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的物质。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绝对不是仅凭一篇哗众取宠的演说就能够将其推销出去的，它需要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经商，就要讲效益，就要有业绩，就要看你能给人家带来多大的利润。而不是听你夸夸其谈的布道。像我这样的“劳改释放分子”，不管你含冤负屈也罢，也不管你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也罢，但毕竟是刚出牢门啊，人家张文升敢于接纳你，足以表明张文升有胆略。何况我与他并无深交，他能这样，就足以令我感激涕零了。

上班第一天，张经理就给了我500元人民币。这可是100张五元的票子啊！在当时我的眼里，这无疑于天文数字了。因为这相当于妻子一年的工资啊！当我将其交给妻子时，她的眼里也禁不住闪起了泪光。我心想：文升如此轻财重义，我不能辜负这样的朋友。

之后，我也算给了他相应的回报。除替他处理了相当大的一批积压物资外，还一直追随他去了北京，替他排忧解难。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87年夏，张文升迷恋并卷入“献国宝”活动。所谓国宝，据说是国民党溃败时，军阀阎锡山将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藏于四川峨眉山下，建国后，这笔宝藏一直被封存着。伴随邓小平的“改革”，现在国务院将其解冻了。但需要一个组织来接受这笔财富并将其献给国家。这“天方夜谭”的故事，明眼人一看便知，但张文升却是当局者迷。他自称这笔财富的接受者是邓朴芳的华康公司，而与之打交道的，据说都是部队团以上的干部。为此，他坚信不移，决心孤注一掷，不惜倾家荡产，从银行贷了十三万元巨款，携款去了北京，从此杳如黄鹤。张母思儿心切，病入膏肓。我没有财力，但道义上不能置若罔闻。为解除张母的担忧，我毅然带着文升的小妹，去了北京，去执行张母委托——把文升劝回来。

在一家很不像样的旅馆里，我唇敝舌焦，力劝文升回头，但文升坚拒，誓不回头。

三十多年过去了，张文升的“国宝”依旧在献着，但人却一直未见回来。他是在追求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如同伟大的堂·吉珂德那样不停地与风车搏斗。其实，想当年，我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幻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又有谁能够劝得我回头？可见，金钱的拜物教已经俘获了张文升一类人。国宝没见到，银行贷款已比本金不知翻了多少倍。这笔巨款养肥了“太子党”邓朴芳们，却使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邓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真谛原来如此啊！事实上，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是早已证明，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就意味着多数人先穷下去吗？这不正像磁石的两极一样，须臾不能分离吗？这不正是人类自跨进文明史的门槛之后，同时诞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吗？由此便不难看出，邓小平不仅是当今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言人，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代言人。

## 第二章 无人敢要我

张文升的事业算是走到尽头了。

他是私人商铺。他不在，谁能越俎代庖？我和他的两位老友为他留守了半年多，到底是撑不下去了。

朋友再好，情义再深，我也没法为之尽力了。因为我也要养家糊口啊！张文升不听规劝，连老婆孩子都不顾了。我呢，我能够吗？

无奈之下，我四处求职。本来，按中央 1981 年 9 号文件精神，我完全可以再回到王村铝土矿，但是，虚荣心阻止了我。这可不是衣锦还乡啊，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哩。

在李相德的引荐下，我来到洪沟建安公司。这是一个张店区政府洪沟办事处的所属企业，是集体性质。当时还没有“老板”这一说。它的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名叫孙昭玉。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白胖子。李相德将我带到他位于二楼的办公室里。老李介绍了我的情况后，孙经理二话没说，爽快地接纳了我，并直言不讳地说：“什么反革命，当初，谁不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搞革命啊。造反派咋啦，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着造反的吗？你是全市全省的风云人物，能做到这样，正说明你有水平，有号召力，有凝聚力，我还想像你一样嘛，可我做不到啊。其实，那些诋毁你的人不是不佩服你，是他们嫉妒你，他们何尝不想像你那样，但是他们不行，他们没那水平，没那胆识！”

孙昭玉经理的一番慷慨陈词，令我感慨万千。像我这样四处碰壁，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居然在这里博得如此美

## 第二章 无人敢要我

张文升的事业算是走到尽头了。

他是私人商铺。他不在，谁能越俎代庖？我和他的两位老友为他留守了半年多，到底是撑不下去了。

朋友再好，情义再深，我也没法为之尽力了。因为我也要养家糊口啊！张文升不听规劝，连老婆孩子都不顾了。我呢，我能够吗？

无奈之下，我四处求职。本来，按中央 1981 年 9 号文件精神，我完全可以再回到王村铝土矿，但是，虚荣心阻止了我。这可不是衣锦还乡啊，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哩。

在李相德的引荐下，我来到洪沟建安公司。这是一个张店区政府洪沟办事处的所属企业，是集体性质。当时还没有“老板”这一说。它的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名叫孙昭玉。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白胖子。李相德将我带到他位于二楼的办公室里。老李介绍了我的情况后，孙经理二话没说，爽快地接纳了我，并直言不讳地说：“什么反革命，当初，谁不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搞革命啊。造反派咋啦，不是毛主席老人家领导着造反的吗？你是全市全省的风云人物，能做到这样，正说明你有水平，有号召力，有凝聚力，我还想像你一样嘛，可我做不到啊。其实，那些诋毁你的人不是不佩服你，是他们嫉妒你，他们何尝不想像你那样，但是他们不行，他们没那水平，没那胆识！”

孙昭玉经理的一番慷慨陈词，令我感慨万千。像我这样四处碰壁，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居然在这里博得如此美

誉，实在是三生有幸。孙经理也真算是独具慧眼啊！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 1986 年底回家的那一幕。那是我刚出狱不久的一天傍晚。我乘张文升刚买的一辆面包车，来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家乡。老屋依旧，只是父兄已逝，母亲在塞外，家里只有大嫂在家。我心情沉重，感慨不已，心想，乡亲们如何看待我这个“劳改释放分子”呢？可出乎意料的是，合村男女老少听说我来家了，立即蜂拥而至，倾刻便挤满了我家的大院子，甚至连房前房后，连院外的场园里也都围满了人。当时全村只有五百来口人，来看我的，少说也有三百余口吧，当然还有不知道的。老支书刘绪孟指着我对他的儿子刘元江说：“儿啊，你三哥就是你做人的榜样，他是为咱老百姓才坐了牢的。”刘书记的评价，立即令我热泪盈眶。这是看着我长大的老一辈人的共同心声，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评价啊！

刘绪孟支书是我的邻舍家，按乡亲我叫他二叔。当二叔的话音刚落地，院里立即想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

明亮的电灯光下，我观乡亲们的衣着，依旧显现着贫穷。村里唯一的变化，是通了电，自大哥带领修了蓄水池后，自来水也到了家。但吃饭问题仍然严峻。我最要好的“发小”告诉我，为解决吃的，他们要结伴从龙泉煤矿拉上煤到北边的高青、惠民等地换粮食，要推着独轮车长驱 200 里，沿途还时常遭到一些民兵的堵截。为此，我联想到 70 年代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大哥死后，大嫂拉扯着四个孩子，最大的侄儿本月不到 18 岁，他在生产队干上一年，年终决算时还欠队里钱。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只能是过着“稀粥照月亮”的生活。一断炊，本月便到王村铝土矿找我。当时，我粮食定量 56 斤，每月能剩 20 来斤粮，这勉强可弥补大哥一家的无米之炊。为此，大嫂对我感恩戴德。由此可见，刘绪孟书

记所说的我为老百姓办事就属谬奖了。我大哥一家的温饱我都没能解决，更遑论其他啊，所以说乡亲们的夸奖，令我汗颜，令我无地自容。

更有甚者，在整个淄川区，乃至全市范围内，群众真的把我给神化了。我的被判刑，非但没能激起什么“民愤”——像判决书所说的那样——相反，却大大提高了我的声望。事实上，说穿了，我在文革中的全部言行，无非是反封建、官僚主义亦即修正主义、走资派这些为老百姓所痛恨的东西。我堪称他们的忠实代言人。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深谙老百姓疾苦。贫穷虽未能激起老百姓反抗，但早已怨声载道。在全市城乡，当时盛传着我的神话：我把“毛选四卷”倒背如流，对马列著作无不精通。他们还吹嘘我，要不是邓小平上台，早到中央去了。

由此可见，在华国锋等策动“右派政变”后对我的一系列批判，非但没将我搞臭，反而极大地提升了我的形象。这一事实，也从反面昭示了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对右派们的深恶痛绝，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人民公社时期虽然贫穷，但分配是平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邓小平改变了这一切，但富起来的是少数人，多数人陷入贫穷，农村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与旧社会没什么两样了。也就是说，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复辟了。

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展的所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逆流。其实质是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的问题。毛主席终其一生，一直是在为绝大多数的人民谋幸福。而“猫论”的鼻祖邓小平，则悍然背叛了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言以蔽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试问，少数人先富起来，其

终极结果难道不是多数人穷下去吗？自原始共产主义结束之后的全部人类文明史，不是早已证明了这一真理了吗？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有哪种社会形态不是少數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与压迫，请问有哪一位富人把自己的资产拿出来分给过穷苦大众呢？除了少数所谓的“慈善家”为了沽名钓誉而做一点堂而皇之的施舍外，有哪一个剥削阶级自动退出过历史舞台而让广大穷人共同富裕起来呢？“船王”李嘉诚把资产分给他的船员了吗？美国的石油大王让他的资产外流了吗？邓小平像一个神甫一样在那里布道：“这些先富起来的人都是从小就接受我们的教育，他们是会帮助多数人共同致富的。”邓小平过分地强调了教育的作用。用道德说教偷换了经济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抛在了一边：穷富本是无情的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历来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如果富有者甘愿让他们的奴隶富起来的话，那还需要“剥夺剥夺者”做什么？那还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做什么？邓小平散布的“施舍”幻想，其用意还在于麻痹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穷人耽于幻想，放弃斗争，只需躺在那里等待先富起来的人们的施舍就可以了。这正是历代的新老修正主义者“善良的通病”。

无情的事实是，先富起来的人们，在邓及其后继者们的支持下，不但没有帮助穷人共同致富，相反，却把矛头指向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终于酿成少数人一夜暴富而多数人下岗的惨剧。工厂破产，工人失业——当权者美其名曰“下岗分流”，流到哪里去了呢，流到千百万人组成的失业大军。事实雄辩地宣布了邓氏神话的彻底破产。

农民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三民主义”的主张，分得了土地，实行了所谓的“责任制”，但解放以来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所积累的集体财产却在一夜之间落

入了少数当权者的腰包，使这少数人侵吞了多数人的财富而迅速成为了资本化的地主。改革的成果，养肥了少数新的资本家及其在党和政府内的代表人物，这就是使共产党迅速走向腐败的阶级根源，这就是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必然结果。这才使得，无论是老虎也好、苍蝇也罢，是无论如何永远也打不尽的。因为如果不根绝产生毒草的土壤的话，怎么可能铲除毒草呢？只有一场新的，在马列毛主义旗帜下的人民大革命，才能打尽一切的老虎和苍蝇。不然，就是有再大的神通，老虎还是照样吃人，苍蝇还是会到处散布病菌的。

伴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早已扫荡殆尽的腐朽的、肮脏的垃圾，诸如赌博、卖淫、嫖娼 拐卖等沉渣泛起，屡禁不止。因为邓小平提供了这一切腐朽事物的温床，邓小平才是这一切龌龊事物的集大成者。

我的乡亲们是多么地怀念文化大革命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之治啊！而这一切，却一概被污蔑为动乱、浩劫。相反，上列一切腐朽、肮脏的垃圾，却被贴上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标签。如果这也叫社会主义的话，共产党、毛主席乃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岂不是根本不需要吗？岂不压根就是历史的错误吗？

在洪沟建安公司打工三年，无甚建树。我的具体岗位是汽车配件经营部，在经理孟昭伦手下担任副经理。凭借过去的朋友黄明玉，打入了山东铝业公司这家特大型企业，从而使汽车配件经营部的业绩直线飙升。孙昭玉经理也给了我高度的评价，但是，国家安全局、公安局的触角伸到了这里，尤其是1989年“6·4事件”后，更是对我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调查。当时，我回敬这般先生们：“你们搞错对象了。”“6·4事件”中的骨干分子都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的

纲领，是想让中国西化，让中国做帝国主义的附庸。他们与我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来人碰了一鼻子灰。后来我干脆通过洪沟办事处党委转告他们 不要枉费心机啦。我虽然冤狱十年，但并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此后，便再也无人造访了。

1991年夏，我听市直机关的一位老友说，最近，市委X书记在会上说：“董学诚在政治上是好样的，搞经济工作同样是好样的。”这句话，萌生了我一个念头：我得继续申诉。于是，我找到了刑事申诉庭的孔凡欣同志。老孔带我找到了当年的审判长陈相坤。陈面带歉疚，长时间紧紧握着我的手。

1991年国庆节后，在一家酒店里见到了柳杰。她业已改名柳洁，大概是不想再做“人杰”了，而只想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女人了。她听了我几句话后，慨叹道：“十年大狱，怎么就改不了你这脾气啊！”她那保养得很好并且依旧漂亮的脸上显示出不解的神情。我说：“这可能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

是啊，道不同不相与谋啊。如今人家是张店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而我则是“刑满释放分子”两相比较，判若云泥啊！然而，我自视仍然甚高：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我宛如耸入云表的高山，从高空云罅间鸟瞰着这肮脏的尘世间被颠倒的一切。

1987年起，清香开始担任淄博压力表厂经营部经理。我开始利用我的同学朋友关系，协助她经营。很快，她就扭转了前任经理造成的严重亏损的局面。我有位同学叫田涌，她在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公司任财务科长。她人缘极佳，口碑甚好。通过她，认识了供应站站长及业务员，于是，清香的业务火起来了，几万、十几万的订单每月都有几单。于是，

她在淄博压力表厂的声望如日中天。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好起来了。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我沾沾自喜的当口，1987年春天，36岁的妻子突患珠网膜下腔出血的脑病。这也正是她十年来忧愤悲凄、积劳成疾的结果。在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期间，我日夜守护在病榻旁。当主治医生告诉称并未脱离危险时，我心忧如焚，急匆匆跑到医院对面的千佛山上，冲着释迦牟尼的塑像嚎啕大哭起来。我三跪九叩，一遍又一遍地为她祈祷，一遍又一遍骂老天不公。当往回走下到半山腰时，一位四十几岁的算命先生拦住我：“先生，看你步履匆匆，面带愁云，想必是家有灾难了。”我本不想理他，不过见他说得还算靠谱，于是，便在他对面的马扎上坐了下来。他仔细看过我的面相、手相，问过生辰八字，然后神秘兮兮地说：“先生乃富贵之相，不过，看来是刚脱离苦海啊。先生曾掌过一方之权，是绝顶聪明之人啊。且家有贤妻，贵不可言。你可享87岁高寿。不过，你的左鼻翼旁有个不大的痣，十年后，漂洋过海时，要特别注意，慎之慎之。”

我不耐烦了，心想，我有何能漂洋过海啊！

不料无独有偶，十年后，我已是公司董事长了，在由深圳飞往三亚的航班上，突遇恶劣天气，飞机在空中盘旋颠簸，全舱人一片惊呼。我突然想起那算命先生的话来，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这样的必然性吗？

然而这次是有惊无险，几分钟后，安然无恙了。挨在身旁的妻子紧紧抱住我，一副同归于尽、视死如归的样子。

有了清香在厂经营部的基础后，我们开始酝酿建立自己的公司。注册资本五十万，命名为淄博精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公司开业前，在搞卫生时，清香的胳膊被玻璃划破，顿

时血流如注。她连声叹曰：“不吉利！”殊不知，正是她的鲜血，开启了我们的财富之门，可谓鸿运当头，吉星高照，旗开得胜！

杭州温度表厂的施荣水科长，慨然为我们铺底五万元。不久，岭子煤矿新建电厂的计划下来了。这下可真把我难住了：一是缺乏资本，二是很多仪表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更不用说采购了。为解决钱，我的好友胡延成借给了四万元，但这对于一个五六拾万元的计划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好在吉人天相。正一筹莫展之际，安徽天长市环球仪表厂的张志明厂长来访。他不仅慷慨帮我注册了五万元，而且立即提笔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持信去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找张春梅进货。

岭子煤矿电厂的计划经张志明粗算约需 40 万元。而我手头的四万元仅是总数的十分之一。咋办，只好硬着头皮去闯一下了。于是，我带着这四万元只身来到位于上海华东师大旁的上自仪公司门市部。

张春梅是一位典型的上海职业女性，白领丽人。她洒脱干练，精明强干，年龄 35 岁。

她仔细审阅了计划，最初的核价为 45 万，后经斟酌又下浮了 10%。我根本不懂得讨价还价。张春梅即刻察觉了我的窘态，笑道：“董经理，看得出，你刚做，我也不跟你绕弯，就按 40 万成交吧。你的四万元算作订金。”转念又说道：“你什么也不用管了，愿在上海玩玩也可以，如果没兴趣玩，那就回去等着收货吧。”

我的第一桶金，税后利赚了八万。这可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啊！这第一笔生意的顺利完成，使我和清香建立起了自信。看来我这个只知一味背诵马列的书呆子还算有点魅力。不然，以如此精明的张春梅，何以第一次谋面便敢将 40 万

的货物一下子赔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人。原因就在于她一眼便看透了我的诚实。

有了这第一桶金，我算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我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完全依靠自己的诚实和智慧。款到账后，我在相关负责人身上作了一下“打点”，“意思”了“意思”。我开始意识到，在邓记“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回扣，没有贿赂，那是寸步难行的，那你除非不想在商场上混！此种事，我做的得心应手，天衣无缝。如果不是对方当事人出事，只有天晓得！

但是，三年之后，就不光天晓得啦！

东窗事发的原因不在我，而是电厂的主要领导搁浅了。案件牵连到供应部长廉加海。

淄川区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找上门来了。对这些人，我自然应付裕如，可老廉真吓坏了。他们来之前，老廉给我通过电话，说要我承认有一次给了他两千块钱的回扣。这确有其事，但我却不认账。经过十年大难，我早已吃透了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把戏的真谛。

当面对面时，我理直气壮：“你们说我给了老廉多少钱，这纯属无中生有。”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老者说：“这是他自己承认的。”

“什么自己承认的。”我说道：“谁不知道你们的把戏，肯定是老廉经不住你们的刑讯逼供胡说八道的。”

另一位年轻人说：“在事实面前，你不承认，可要负法律责任啊。”

“你们就是来一万次，也是这样。”我斩钉截铁：

尔后，我智斗检察官的趣闻便在广大客户中传开了。首先，老廉感激涕零；其次，也驱散了别人心头的阴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与这家电厂的生意不就寿终正寝了吗？

谁还敢跟你合作，更不用说还一直持续到今天了。

此后，我的生意风生水起，日渐看好。我很快斥资百万在新世界步行街购买了一套 200 多平米的营业房，很快，又在青岛经济开发区买了一套楼房。我意气风发，干劲十足，朝气蓬勃，完全回复到了青少年时代，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一心一意要用丰厚的收获来回报自己的妻儿。这难道是 1984 年底狱政科赵科长所承诺的美好生活和难以想象的好工作的实现吗？非也。因为赵科长所说的是党和政府赋予的，而现实却是我自我奋斗的成果啊！如果查档案，查户口，我还是个“无业”者哩。

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我拥有了房、车，而且越换越高档、豪华，就连妻子，在五十二岁时也圆了她的开车梦；先是雪弗兰，后来是宝马迷你。

总之，我终于跻身资产者，成为身家千万的人了。

我总算从逆境中挺立起来；我总算彻底摆脱了贫穷，终于变身为资产者，终于走向了年轻时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反面。可事实上，我仍旧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世界观仍旧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我的目标，依旧是科学共产主义。

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个曾经失去自由、失去生活手段的“刑释犯”，靠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不依靠个人奋斗，行吗？这可真是“逼上梁山”啊！

恩格斯曾经为“既是共产主义者，又不得不兼做生意经的负重畜牲”这样的二重人格而深深苦恼过。但如果不是这样，能有马克思主义吗？能有《资本论》吗？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全家不是早就死于饥饿了吗？

我此时的心境，又何尝不像当年的恩格斯一样呢？我自幼饱读马列毛著作，早在高中阶段，就已确立了共产主义世

界观。后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洗礼，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如果不是一九六五年中央确定不再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那么，我早就是一名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啦，。1968年冬，在顾良、魏裔荣的介绍下，我加入了共产党，但不久便伴随着王效禹的被迫害，这个党籍并不予承认。然而，几十年来，甚至在十年的铁窗岁月里，我仍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保持了毛泽东的党的党员的纯粹性，而不是像一大批假共产党员那样如蝇逐臭地去大发国难财。

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实施了巴黎公社的“三原则”，它确实是使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由此达彼、实现共产主义的桥梁。十年炼狱，更加洗炼了我。我鄙弃自私自利，我痛恨那些置人民利益于不顾、蝇营狗苟的可怜虫。我想，也许有一天，当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到来之际，我很可能会将革命的锋芒指向自己，很可能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乃至献身革命。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起去为实现自身的解放而共同奋斗。但是现在，我不能够，因为我的身上还有锁链，我还是个“无业者”。我还不能将自己顷刻间变身为无产者，而只好继续忍受着双重人格的折磨，跻身于“生意经的负重畜牲”了。

### 第三章 新的人生

一九九八年，儿子振宇大学毕业。开始我也曾想为他谋划一个前途。但经反复斟酌后，还是放弃了这念头。我想，现在虽已不是株连九族的时代，但我仍享受“三种人待遇”。当局不再骚扰我，是因为我已是私企老板，没在密如蛛网的党组织范畴之内，他们还能找谁呢？虽然我仍生活在一张无形的巨网里，但表面上，已经变成“自由人”了。2010年前，办出国护照尚受限制，直到2011年，方才办理了护照，获准去新加坡探亲。

在我回首往事时，深感我所经历的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平等——首先是城乡的不平等，亦即工人农民的不平等。处处强加的不平等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这或许就是文革后期毛主席所强调的“资产阶级法权”吧。毛主席察觉了这一点，却解决不了这一点。一旦确立了农民的身份，那就永生永世地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虽没有衣穿却领不到布票，没有油吃却领不到油票，一年到头很难吃到一滴油，衣服靠自织的土布。公社社员凭工分换取不够吃的粮食，但工分不能转换成货币，任何生活必须的商品，均无力购买。就说我吧，最风光的1968年，身为市革委副主任，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只好向曾经的副市长、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李国栋同志要了件旧衣服穿。农民过年，没有肉票，只能靠生产队到年底杀口猪才能分到几斤肉，算是应付过年。解放20年了，直到1969年之后，仍是一派贫穷

的景象。所以，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脱离农村，而脱离农村，出路只有三条：一是当兵，可以摆脱贫穷，但前提是不要复员回来；二是上学，考上中专，可以吃上皇粮，这也就是当年父亲坚持不让我考高中的理由；三是考上大学，当然也可凭借国家的分配而离开土地，但这对于大多数农民的子弟来说，实属凤毛麟角。就说我吧，本来凭借二哥姐姐的接济可以上大学，但文革大潮一来，摧毁了大学梦。对我来说是这样，而对于广大的穷苦农民来说，大学的门是与他们无缘的。

本来，就我的学习成绩而言，考个一流大学是没问题的，且当时的校领导就有“保送”我的打算。但文革一来，“学而优则仕”的梦破灭了。不久，又被工作组打成“黑帮”、“修正主义苗子”。于是，在逆境中才逐渐意识到只有紧跟毛主席才是光明的前途。是刘、邓的资反路线迫害了自己。于是，在批判“资反路线”，尤其是后来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我才逐步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为“自为的阶级”。在文革中，我从不在公共场合承认自己是“造反派”，因为我是文革前学界的红人，正如同文革初所批判的那样，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怎么可能造党的反呢？

是“走资派”的一次次打压，方迫使 I 奋起反抗，奋起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自始至终听毛主席的话，坚持文斗，不搞武斗，除在规模不同的集会上发表了若干演讲外，我自始至终未做过一件出格的事。事态的发展，使我愈益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是被遗弃的一代，什么倒霉的事没有不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大学梦破灭后，遂梦想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但事与愿违，屡踣屡起，最后竟由真正的革命者而被“走资派”投入监狱，由狂信的、执着的、赤诚的革命者成了所谓的“现行反革命”。

应当说，在十年文革中，我既是盲目的，又是自觉的。说盲目，是因为只知一味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不折不扣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却不知道这一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说自觉，就是想改变自己回乡务农过饥寒交迫生活的命运，作自己命运的主宰。殊不知，自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尤其是反击“二月逆流”之后，毛主席却转了舵，由依靠他亲手支持起来的红卫兵、造反派转而支持老干部，从而不惜将前者视作敌人——“五一六”分子而进行了打压。我的悲剧性就在于：未能理解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真正意图。误以为是要改朝换代了。可事实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大规模的整党运动。运动初期他曾绕过党的机构，不要党的领导，但一旦看到他一手缔造的党即将落入不成器的造反派手中时，他又不得不将屁股坐在了追随他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一边，而造反派——无比虔诚的大批年轻人却统统成了牺牲品。用林彪父子的话说就是“红卫兵成了替罪的羔羊”。我的奋斗不仅没有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宰，反而沦落为更加不堪的阶下之囚。这固然是由于党内资产阶级的迫害使然，但是毕竟是因毛主席的转舵而使走资派们钻了空子，打着他的旗号绞杀了文化大革命。使成千上万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志士仁人在重新上台的走资派们的屠刀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倒在了血泊之中，而我，算是保住了性命，但也未能逃脱法西斯政权的淫威。虽然在狱中也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平心细想，总感到跌入了一场精心设置的政治陷阱。

邓小平的“改革”（复辟的同义词），倒的确使我“沾了光”。据说当年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均都有了不菲的身家。但这并不是我们继续革命的最终目的。（我们心中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这也正是当年毛主

应当说，在十年文革中，我既是盲目的，又是自觉的。说盲目，是因为只知一味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不折不扣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却不知道这一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说自觉，就是想改变自己回乡务农过饥寒交迫生活的命运，作自己命运的主宰。殊不知，自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尤其是反击“二月逆流”之后，毛主席却转了舵，由依靠他亲手支持起来的红卫兵、造反派转而支持老干部，从而不惜将前者视作敌人——“五一六”分子而进行了打压。我的悲剧性就在于：未能理解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真正意图。误以为是要改朝换代了。可事实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大规模的整党运动。运动初期他曾绕过党的机构，不要党的领导，但一旦看到他一手缔造的党即将落入不成器的造反派手中时，他又不得不将屁股坐在了追随他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一边，而造反派——无比虔诚的大批年轻人却统统成了牺牲品。用林彪父子的话说就是“红卫兵成了替罪的羔羊”。我的奋斗不仅没有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宰，反而沦落为更加不堪的阶下之囚。这固然是由于党内资产阶级的迫害使然，但是毕竟是因毛主席的转舵而使走资派们钻了空子，打着他的旗号绞杀了文化大革命。使成千上万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志士仁人在重新上台的走资派们的屠刀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倒在了血泊之中，而我，算是保住了性命，但也未能逃脱法西斯政权的淫威。虽然在狱中也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平心细想，总感到跌入了一场精心设置的政治陷阱。

邓小平的“改革”（复辟的同义词），倒的确使我“沾了光”。据说当年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均都有了不菲的身家。但这并不是我们继续革命的最终目的。（我们心中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这也正是当年毛主

席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所寄予我们的希望）。

试想，假若毛主席还在，假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在，我既不会有此厄运，也不会发迹。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这批人变成了新生的资产者。当然，比起那些窃国大盗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布尔乔亚而已。这本是我青年时代深恶痛绝的革命对象，这本是应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污秽，尔今却由自己来担当了。革命，走向了主观愿望的反面。这不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必然。

然而，毛主席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他在《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中所教导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正是由于确立了这种坚贞不渝的人生观，才能在物欲横流的邓小平时代，抵住了冷酷无情的金钱及各色腐朽事物的诱惑，而自始至终地保持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本色，没有陷进“唯利是图”的泥潭。

## 第四章 永恒的思念

2002年，我为儿子注册了他自己的公司，继为他购置了一辆帕萨特轿车后，又为妻子购置了一辆雪弗兰轿车。2005年小孙孙降生，他的到来，为我家平添了无尽的春色。就在全家一派欢快祥和的气氛中不断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候，不幸——天大的不幸，突然降临到我家。我茹苦含辛半生的妻，因饱受苦难和迫害，积劳成疾，继1987年脑出血之后，又于2015年4月17日凌晨一点，突发脑溢血，连抢救都来不及，溘然长逝。这天塌地陷般的灾祸，一下子将我击昏了。我抱着她逐渐冷却的身体，嚎啕大哭。真是天丧我也！

清香谢世前，2015年4月15日，曾与我及其兄妹相偕游览了她童年的摇篮——济南白马山车站故址。了了她多年来的夙愿，谁料，这也同时了了她短暂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果不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残酷迫害，她岂能刚届63岁便匆匆离开人世！她的父母均以八十几岁高龄寿终正寝，故清香的不幸离世绝非遗传因素使然，而是十年的苦难扼杀了她！

4月16日晚，我曾郑重其事地对妻说：“我要为你写一篇‘白马寻梦记’”，她笑着答应了。万未料到，到了半夜，竟成永诀。

直到妻弃世后七天，我才将文章写完，遗憾的是，她不能过目了。

下面，是游记的全文。

## 白马山寻梦记

2015年4月15日晨，偕清香及其二姐、小妹、兄嫂，还有二姐的次女葛燕、小妹清霞之外甥佳佳，由二姐长子葛新驾驶着小妹夫王玉峰公司的一辆面包车，经两小时疾驰，来到爱妻清香阔别了50余年的第二故乡——白马山铁路新村。

说是新村，实为旧村。新村者，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命名。现在呢，已经变成风烛残年的老人样子了。

重游故地之志久矣。兄妹几人都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尤其是清香，刚踏上这片热土，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俨然孩提一般。

先是到了她曾经上过的铁路小学。校园内那棵记忆中的小白杨，已变成二人合抱不交的参天大树。树已老矣，光滑的躯干已是斑驳陆离，浓密的绿叶在四月的春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一位迟暮的老人在慨叹着世事的沧桑，又仿佛一位饱含深情的老友在热情迎接阔别多年的伙伴。校舍原来的样子已荡然无存，昔日的几溜平房已为现代化的楼宇所代替。看到这一切，清香不仅神色黯然，不由自主地喃喃道：“我同学马世娟不知道还在不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马世娟这个梦里都曾不知多少次出现过的名字，鼓舞着她加快了脚步，把别人统统甩在了后边。

我们尾随她来到了第三区，这是她幼年住过的地方。如今已是物是人非，老砖瓦房，没多大变化，它记载着老一代铁路工人艰苦奋斗的光辉业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不平凡的历史。清香忘不下马世娟，向新的主人马师傅询问。但人家也说不清楚。她还问到居委会的孟阿姨，

马师傅说人早不在世了。显然，清香忘记今天是54年之后了。她还给马师傅说：“我老记着孟阿姨家里抬出来的那个死老太太，穿着红花的送老衣，脸干黄干簧，想想就害怕”。拉完家常后，这才步进白马山附近，两条锈迹斑斑的铁轨显示着它们的百年沧桑。当年，清香每天下午六点钟都要和哥哥妹妹到这里来迎接从济南机务段下班回来的爸爸。她和妹妹一边一个牵着爸爸的手，蹦蹦跳跳地赶回家，因为姊妹俩煞是可爱，故一路上不断引来一束束羡慕的目光。

白马山，已不成之为山，现代房地产业的突飞猛进，使这座当年巍峨的、气势恢宏的青石山已被劈成了一块巨石，颓丧地伫立在那里，而石头，已被列车运往祖国各地，变成了一座座高楼大厦。清香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步履轻盈，十分高兴地一面走，一面停下来让我给她照相。

看完这一切后，来到那座小小扳道房，扳道房的孙师傅也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了。问及旧相识，孙亦大半不知。这不能不令兴致正浓的清香失望。出门时，长叹道：“唉，这辈子也就只能来这一次啦”。她的话，引起我和小妹清霞的极大不满。我斥道：“什么话，这么近，开车不到两小时，想啥时来抬腿就是，哪来这些不吉利的话。”

可万未想到，她的这句不经意的话，一语成谶，竟成永诀！

4月16日，我照常去公司上班，中午，清香还去学校接了小孙孙。晚饭后，我照常外出锻炼，孙孙弹钢琴，清香同儿子一块看电视。八时许，我回到家，拿出手机，与她一

起欣賞昨日在白馬山的照片。她指着其中的一張半側面照說：“瞧，多漂亮，高鼻梁，大眼睛。”事實上，她眼睛並不大，這樣說，不過是為了調侃，為了逗我笑而已。

十點前，她到臥室里拿起給小孫孫做的一條藍色運動褲說：“還差鬆緊帶，明天去周村買回來，後天就可以穿着上學了。”誰承想，說這話時，死神已經迫近她的身旁了。

當我睡得正濃的時候，被她弄醒。她右手緊緊扼住我的左眼，似在掙扎。我生氣地說：“你待扼死我嗎？”我立即打開燈，看見夢中的她一臉的驚恐。我輕聲問：“怎麼啦？”她痛苦地說：“哎呀，眼眶疼。”緊接着說：“頭痛啊！”其痛苦狀，從來未見。我立即去隔壁叫醒兒子，準備上醫院。此時，她在床上抽搐着，痛苦萬狀。我問道：“是開車去還是叫120？”“叫120吧！”足見她已疼痛難忍，不然，她是不會舍得花這份錢的。她又問我：“有急救藥嗎？”我說沒有，我急呼“120”，但她已陷入極度痛苦中，慘叫声揪斷我心弦。待我去樓下迎上大夫來，她已經靜靜躺在床上，醫生做了心電圖，那心率顯示已成一條直線。大夫吩咐準備後事。一條鮮活的生命就這樣完結了。

家里，唯剩下我和兒孫悲痛欲絕的哭聲。

半個多小時後，她的親人們都來了。家中一片狼藉，哭聲成片。

就这样，我在萬念俱灰中麻木地送走了這個飽經憂患的偉大的女性。

2015年4月18日上午，市殯儀館內，人頭攢動，她的親眷及生前好友百余人，趕來為她送生命的最後一程。我的小孫孫，十歲的壯壯學着大人的樣子勸我節哀。我的好友，市郵政局長程昭湖同志，以萬分悲痛的心情、極度壓抑的聲音致悼詞，例述了滕清香同志不平凡的一生。

词中说，滕清香同志，不愧是一位巾帼英雄。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她的不幸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

呜呼，多少溢美之词，能表达爱妻清香节操于万一啊！

5月19日，是她的“五七”日，众亲友赶来为她祭奠，我在她的灵前宣读了祭文：

### 爱妻清香妆次：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夜，你驾鹤西行，永远离开了让你辛劳一生的人世。然而，无论是我，还是孩子，都感觉到你并未走远，你的魂魄依然守护着我们。

爱妻清香，你的一生光明磊落，冰清玉洁，无私无畏，刚正不阿。你孝敬父母，堪称表率；团结兄妹，慷慨仗义；待人以诚，不存私念；埋头奉献，不求回报；两袖清风，光彩照人。你是我的圣洁的天使，永垂不朽的圣女贞德！

忆我十年蒙垢时，你在25岁—35岁之间，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你不仅顶住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的诘难，横眉冷对世俗的嘲讽与偏见，坚持一月一次探监，风雨无阻，十年如一日。且无怨无悔，四处奔波，为我伸冤，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叶，是需要多么坚韧的意志，多么弥足珍贵的勇气啊！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方显烈女本色；辛苦备尝，矢死靡它，方见青云之志。人生能有你这样一位红颜知己，吾愿足矣！董氏家族能有你这样一位好媳妇，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亦感欣慰！

我的爱妻，你既是苦难的化身，又是光明的天使，

你为我所做出的牺牲，令我唏嘘不已，你的死，令我百身莫赎！

亲爱的妻：你生前为人，死后为神。愿你早升仙界，位列仙班。愿你的英灵永远护佑着我们共同的儿孙。愿您的英灵安息！

亲爱的妻，遵照你的遗愿，我和儿子已为你择定了一片风水宝地——玉皇陵福寿竹园A-7号，这里茂林修竹，四季常青；这里群山环抱，绿水缠绕；这里是齐景公的安息之地，它的千古帝王之气将永远氤氲在你的身旁，保佑你静静地安息。

尔后，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我都会前来，与儿孙一起为你祭祀。

你谢世前一晚我承诺为你写一篇《白马山寻梦记》，今已脱稿，兹奉祀灵前，望你斧正之。

呜呼，天不假年，让你匆匆离去。

斯人憔悴，让我柔肠百转。为了慰藉你的英灵，我还要勇敢地、一往无前地活下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词曰：我妻高风，首推博爱。爱之所及，泽被后世；品格清奇，光照人寰；恩泽醇厚，润及后坤；遗世独立，英风长存！

我每每手捧你的玉照，无不痛心疾首，肝胆欲裂，恨不能随你而去，早日与你相伴，但思之再三，我不能够！

听听小孙孙壮壮的话吧：“爷爷，奶奶不在了，你可要好好的，万一你有个好歹，我们两个（指他和爸爸）可真没活路了。”听听这十岁娃娃的话，我还有何话说？

爱妻清香：音容宛在，阴阳两隔。我和儿孙都会珍重，你就放心地去吧！愿你的芳名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诗曰：

断肠断肠复断肠，  
相思相思倍相思；  
君恩似海何以报，  
此恨绵绵无绝期；  
念君豆蔻年华日，  
念君孤苦探监时；  
思君共叙马列志，  
思君同读毛公诗；  
今君不幸离人世，  
愚有疑难再问谁？！

又曰：

伶仃孤苦一老叟，  
诗笔难抒满腔愁；  
常向西天悼落日，  
冷对苍穹叹旧游。

贤卿一去不复返，  
嗟余子立渡春秋；  
天哭地哭人亦哭，  
似君知己更何求？！

她的百日祭为7月27日，我偕儿孙及众亲友一起，将她的灵骨安放在玉皇陵陵寝。

我声泪俱下地宣读了对她最后的祝福与思念。

(一)

我是乔木君是藤，  
藤缠乔木乔依藤；

尔今藤折凌云去，  
哪堪乔木泣悲风。

(二)

天赐香君为我妻，  
双宿双飞依琼枝；  
君今不幸离人世，  
余生冷暖有谁知。

亲爱的妻，玉皇陵，这里钟灵毓秀，物华天宝，这里的千古帝王之气，将永远护佑着您。静静地安息吧。

滕清香，淄博市张店区大贾庄人，生于 1951 年 11 月 23 日，卒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实际方满 63 岁，虽算不上英年早逝，但也算不上高寿。她的不幸离世，我的家庭仿佛栋梁摧折，对于我，简直无疑于失去灵魂。她去世当天，我根本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当晚一家人还有说有笑，入睡前她还准备给小孙子明天去周村买松紧带，好给他做起裤子让他穿着去上学，怎么转眼间就从人间蒸发了呢？我恍恍惚惚，眼前总是看到她从床上一跃而起的样子，第二天上午，送去火化，我悔恨出门时竟未抚摸一下她的遗体，亲自验证一下她是否已经变冷。因为当时我正忙于通知亲友，忙于为她写悼词，所以，一应事全由儿子操办了。送往殡仪馆后，我又问儿子可不可以到停尸房去看一看。我说：“儿啊，我总感觉你妈没死，只是昏迷而已。1987 年你妈也是这样，昏迷了两天啊。”我想，如果在她昏迷中就将她火化了，这该是多么残忍啊！我甚至手捧她的遗像，轻声问道：“很疼吧？”可真是疼煞我也。但当我稍事清醒，才晓得这其实全是我的幻觉。当时，中心医院的医生在场，有心电图为证并据此开具了死亡证明。我作痴作傻，只是不相信已发生的事

实罢了。

当时，她的灵骨暂放在殡仪馆内。不由我揪心地痛。她属兔，她是那么胆小，甚至从不敢独自在屋里睡觉。十年囹圄时，夜里，尤其是雷雨之夜，我总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担心着她。

现在，她匆匆离去了，灵骨尚在殡仪馆内，我仍旧担心她害怕。风雨夜更甚。所以，便时刻盼望着将她尽快安葬，入土为安嘛。百日那天入葬。我也让匠人在墓碑上刻上了我的名字，只是涂成了红色，表明我还活在人间。我想，这样也许不致使她感到孤单害怕吧。

我一直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居。从不相信鬼神之说。总以为，人的灵魂是依附于肉体的，肉体一旦死亡，灵魂也便消失了。但清香的离世，却一下子颠覆了这顽固不化的世界观。她临咽气的那一瞬，眼神迷离，一手使劲抠住我的左眼，一手紧搂住我的脖子，神情恐惧，俨然看到幽灵的样子。在她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在诅咒：是白马山的幽灵夺走了她！瞬间，我感悟到彼岸世界的存在：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净土，不都是宣称彼岸世界的存在吗？若说是迷信，为什么千年不衰，为什么那么多的学者，有着人类最高智慧的科学家政治家，在基督与释迦牟尼面前，却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诚惶诚恐！

灵魂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如果是物质的，那么根据物质不灭的原理，灵魂也应是永恒的。如果灵魂是精神的，能有独立于物质之外的精神吗？这不是明明又跌入唯心论的泥潭了吗？这不是又堕入“二元论”了吗？所以，归根说来，灵魂也是物质的一种存在方式，像“以太”一样，只是为人的肉眼看不见而已。所以，我认定：灵的世界是存在的。只是改变了在人世间的存在方式，到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去

了罢了。鉴于此，我于夏历乙未年四月十一，在普照寺为我的爱妻清香做了一场隆重的法事。一是寄托我的哀思，一是超度她的英灵。当时，她的哥哥滕清海也赶来，近 70 岁的人了，随着我又叩又拜，足足折腾了四个小时，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尽管疲惫已极，但我的心却平复多了。一生一世，我和她的心是事事处处无不相通的。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她一定会看到我的心灵的。

## 第五部

### 深情反思与期望

## 楔子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用手中笔，在纸上走完了六十九年的人生旅程，生怕有什么遗漏、偏颇、失实之处。因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往事已矣，感悟良多。其中尤以“文革”为最，今将几句箴言，流于笔端，以飨读者，我想是不无教益的。

##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成败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发现阶级斗争，并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只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是马克思对其全部学说的最经典的概括，是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精闢的论述。

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正是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以及行将到来的历史进程。

列宁实践了无产阶级革命，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马克思的理论从书斋被搬上了历史舞

台。但在晚年，他不无惋惜地感叹道：“布尔什维克打碎了沙皇的国家官僚机器，但却又同样建立起一个国家官僚机器。面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列宁已无能为力。斯大林非但未能遏制官僚机构的日渐腐败，反而将其推向了极致，以致最终导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逆流，毛主席以“反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伟大气魄，顶住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主席的上述论断，既是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客观总结，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敲起的警世之钟。继这条基本路线确定之后，毛主席发动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地方各级党委直至在中央工作的一大批人。”

这是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论断的萌芽期的论述。

在社教运动中，以刘邓为首，抛出了与毛主席制定的“前十条”针锋相对的“后十条”，迫使毛主席不得不又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迫在眉睫，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却深感迷茫、无所适从。

这就是后来毛主席在跟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所说的：“过

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自下而上地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毫无结果的“四清运动”即社教运动不了了之之后，迫使毛主席不得不继续寻找这种方式。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使毛主席的论述更加鲜明：“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各种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的已经被识破，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在这里，毛主席已经十分清醒的认识到，他是在向他亲手缔造的党宣战。

因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党内的多数人都不愿继续革命了。这些人当了大官了，有了车，有了房子，有了人民所赋予的一切权力。这些人自然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作威作福，变得与国民党没有两样，他们终于由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与这一庞大的官僚势力相比，像毛主席这样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竟处于少数地位。但毛主席知道，他的根基在人民群众之中。刘少奇威望再高，没人喊他万岁，而毛主席呢，举国上下，男女老幼，谁不喊万岁，谁不唱《东方红》。因此，他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革命的生力军。这一生力军最先发轫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966年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深邃眼光，以实际运动顾问的身份，发现了群众的这一首倡精神，欣然指出：“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与此相反，刘少奇则嗫嚅道：“看不出什么巴黎公社精

神，看不出什么马列主义。”

大字报公布后，举国上下，一片沸腾，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兴起了。而叶公好龙的刘邓一伙，则立即派出工作组，对革命师生进行了五十多天的疯狂镇压。在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也无情揭露了“走资派”的反动嘴脸。因为，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鉴别马克思主义与一切机会主义的试金石。无论是普列汉诺夫的“根本是无需拿起武器的”，还是陈独秀的“糟得很”，均已证明刘邓与老的机会主义者可谓如出一辙。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作为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一个继续革命学说的身体力行者，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捍卫者，我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失败，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探索和理解，现例述如下：

### （一）走资派的存在是文革发生的必然因素。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便以马克思主义者深邃的战略眼光，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在此之前，在延安，毛主席还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问题同黄炎培先生进行过谈话。毛主席坚称：我们能够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其办法就是民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党内的多数人不再前进，他们忘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开始变成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人。加之，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小生产的自发势力，使得

共产党人始终处于这一自发势力的包围之中。列宁说得好，“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而这一“最可怕的势力”，使得中国的封建皇权维系了两千多年之久。小农经济是皇权的经济基础。最透彻了解这一点的莫过于邓小平了。难怪乎他“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责任制”的幌子下，将集体土地、集体财产一下子分给农民，从而确定了复辟赖以成功的经济基础。

说邓小平复辟了资本主义，我以为这一论断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土壤。因为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在中国并未得到过长足的发展。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曾经是当年的“第三势力”即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美梦，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过的那样，这样的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首先帝国主义不允许，其次国内的统治阶级也不允许。他们想要的经济基础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官僚买办资本。就连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提倡“节制资本”的口号。而蒋介石不仅节制资本，而且极端地发展了官僚资本、买办资本。邓小平所主张的，事实上与蒋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之，邓小平的复辟活动，先从农村开始，继之向全民所有制经济开刀，利用各级党委的权力，迅速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资本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带有极大的买办性。因为离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它是无法在中国生根的。这也就是邓及其后继者们急于搞什么“与国际接轨”的秘密。其实，这一套，从李鸿章到蒋介石，他们早就捷足先登了，邓记改革，来得太迟了。

由此看来，复辟资本主义之说，倒是比较简明扼要，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并不科学，很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一言以蔽之，邓小平复辟的，是旧时代三座大山中的两座：一是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买办经济，二是官僚资本主义。根本

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早已被历史所淘汰，且早已被毛主席所揭示：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在这里，不妨让我们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一是封建经济，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三是官僚买办经济，而民族资产阶级只能依附这些经济势力而苟延残喘。鉴于中国资产阶级如此可怜的生存环境就决定了这个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以至于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不得不拱手将政权交给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而反袁的革命胜利后，蒋介石步其后尘，脱去了封建的外衣，建立起实至名归的官僚买办性质的政权。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不正是如此吗？

作为“四大家族”的复兴者，邓氏及其同党很快在改革的幌子下先富起来，成了新时代的“四大家族”，不过打上了共产党的印记而已，而事实上，与国民党反动派是没有两样的。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六十年前，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很爽快地接受了共产党的赎买政策，实现了公私合营，继之又交出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失去了资本所有权。可见，无论是在国民党的统治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执政的五十年代，都未曾有过资产阶级的发展空间，它只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腐庸而已。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作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这个阶级在经济上的不独立，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决定了这个阶级没有其独立的意志。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成为其他阶级的尾巴。这个阶级压根就不可能实现复辟的梦想。由此可见，毛主席所指的复辟，确切的讲，应该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之一，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也是最腐朽、最末落的资本主义。

而为这一阶级的复辟鸣锣开道的，正是党内的走资派。

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而政党是由阶级产生并领导阶级的。”用列宁的这个观点来看，党内怎么会产生阶级呢？这不是违背常识的谬论吗？但列宁还说过：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仅成了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且成了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除了毛主席这样坚定不移的公仆之外，绝大多数党和政府的管理者，就开始逐渐变为社会的主人，由管理者变为所有者。虽然从名义上讲，生产资料归全民和集体所有，但事实上，却演变成官僚所有制。这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亦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毛泽东时代，这个阶级还不能公开的、合法的占有生产资料，而邓小平则把这一切合法化了。还挂着羊头卖狗肉，美其名曰“特色社会主义”。

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但自建党以来，党的肌体尤其是领导机构中究竟有几个是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本来就十分弱小，所以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党的组织及领导成分，除了农民就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最易资产阶级化，最易腐化的。农民的自私与保守，又使他们最容易变质。就是这样一个成分组成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目标和他们的自身利益还是能融为一体。但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自身阶级的劣根性便为日益深化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不容。在整个民主革命乃至文革之前，工人阶级的意志是靠党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来体现的。但毛主席的路线却愈来愈为这些当权者所不容。所以，以刘邓为代表的另一个司令部便应运而生了。文革中两大对抗阶级的较量自始至终正是通过两个司令部的较量来实现的，无论是“二月逆流”还是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还是后来的清查“五一六”直至最后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无一不是这两个司令

部的生死较量。综上所述，便可知，这一切正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阶级根源。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只有他这样极个别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时时提醒着自己并不忘告诫全党不要把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时时坚持为人民服务。同时，他为此提出的理论和实践，无一不是针对党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因之，他的理论与实践，遭到这一阶级的疯狂反抗就毫不奇怪了。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毛主席在论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时才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过去几十年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毛主席的论述，是何等的入木三分啊！

毛主席晚年说过，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第一是，把国民党反动派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第二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后一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由此可见，他是何等的看重、何等的珍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

与此相反，走资派们却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先是让工作组进行镇压，继之又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抛出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与毛主席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路线分庭抗礼。他们凭借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以党的化身自居，虽无权调动军队和警察，但却可以把对毛主席的先进理论不理解的工人阶级一部或大部挑动起来，组成自己的羽林军，残酷镇

压革命造反派。这一系列反动措施的极致，便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汉的“七二〇事件”，由于工人阶级的不觉悟，方才迫使毛主席不得不改变了战略方向，导致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开始。

## （二）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及农民的冷漠是文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开始，毛主席点燃的文化革命烈火，首先从北京的校园开始，燃遍全国。正如毛主席所总结过的那样，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是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红卫兵运动，就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再版，而在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方面，又远远超过了“五四运动”。

然而，历史已经表明，仅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觉醒及崛起，是远远不够的。决定革命成败及历史命运的是人民大众——主要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劳苦大众。

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十七年间，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得惠最多的当然是这个阶级。他们拥有其他阶级无法企及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他们享有着较优厚的工资，更有无需支付租金的住房，日常生活中享有的一切，真跟供给制相差无几。他们深知，这一切都是自己阶级的党——共产党所给的。而这个至高无上的党的化身，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从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到每一个企业的党委乃至车间的党支部，甚至每一个党组织的负责人乃至每一个党员，都是党的化身，都罩着无法企及的光环。而且工人阶级自身所受的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教育。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这一切，是毋庸改变也不允许改变的。当然他们也不会去响应某种号召，去造什么反，去改变这一切。

因之，一九六七年初，当上海工人阶级左翼登上舞台，演出了威武雄壮的“一月风暴”活剧的时候，这个阶级的多数人，却依旧充当着各级党委的御用工具。而在山东的“二三夺权”及各地市的夺权中，工人阶级绝大多数几乎都未参与。相对表现积极活跃的，大抵是刚刚入厂不久的一些学生和年轻人。真正的老工人，则完全对造反持一种排斥甚至敌视态度。最好的，也就是以冷漠的眼睛目睹这一切而置身事外。

在这里，不妨大致上回顾一下山东及淄博的夺权情况。“一月风暴”的兴起，也极大地推动了山东的夺权运动。当时，山东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山工联”，但“山工联”基本上是受“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控制的。他们一手组织了1.31“夺权”。

当王效禹奉命到济南组织“二三夺权”的时候，正值“1.31事件”后几天，王效禹在军队支持下，巧借“二月逆流”的黑风，镇压了“山工联”及“山大主义兵”，淄博的“1.29夺权”同样流产了。王效禹的“二、三夺权”，撇开山东最有名望的“山大主义兵”及“山工联”，用“拉郎配”的方式将手工业工人出身的韩金海同志拉入了领导班子，其他几个工人代表也不过摆设而已。“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只不过是“军管会”的代名词而已。工人阶级并未真正登上舞台。相反，一九六七年初的“大闹怀仁堂”并由此形成的“二月逆流”，这一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妖风，却给不满于文化革命的工人们提供了契机。真正的工人阶级登台了，但他们是以走资派的羽林军的身份亮相的。他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保守组织，以山东铝厂和山东新华制药厂的“老保”组织最为著名。他们偕同刚介入支左的部队及公安残酷镇压了“1.31事件”的参与者，牺牲者多半是红卫兵，因为工人中的造反派此时还是凤毛麟角。我想就全国而言，局势应该大同小异。

“反逆流”斗争的短暂胜利使得个别工人领袖冲昏了头脑，随之而来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及毛主席的视察大江南北，围歼派性的歼灭战打响了。所有造反派的丧钟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命运注定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农村的情况。广大农村是在不了了之的“四清运动”中进入文化大革命的，自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后，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落了个空欢喜，他们怀揣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梦，高喊着“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大讲着“超英赶美”的神话，谁承想，却是一枕黄粱而已。“四清运动”并未搞出什么走资派，只不过将过去的历次运动的“死老虎”——地富反坏又狠狠整了一通。从天而降的“文革”狂飙并未唤起农民的觉醒。自一九五五年土地归公以后，他们过的基本上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物资的匮乏，伴随着饥饿的威胁，使农民失去了民主革命时期那种高涨的革命热情。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使他们越来越麻木。小农的天性，使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安然承受从上面降下的雨露与阳光。他们没有任何兴趣去做任何改变现实的努力。只有少数革命老区的农民卷了进来，如临沂地区的“马陵山游击队”，他们是在走资派的蒙蔽唆使下从反面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他们甚至在南京军区某些大人物的支持下，拥有枪支，杀人越货，残酷镇压造反派，成为鲁南地区镇压文化大革命的一枝劲旅。风闻全国各地不断组织煽动农民进城，破坏交通，烧杀抢掠，使派性斗争节节升级，以至于演出像“七二〇”那样的全面内战，使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得不从整走资派身上转移到整造反派，这就使得一直顽固坚持资反路线的走资派们绞杀文化大革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这也就是重新上台的走资派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前奏。

综上所述，可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是由中国社会

的社会根源、经济根源、阶级根源所决定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必然，把这么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归咎于个人，这岂不是陷入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论的泥潭了吗？

同样，文革的失败也是由中国的具体环境所决定的。毛主席威望再高，神通再广大，不是同样无法挽回这场大革命的失败甚至连自己及自己的妻子都未能保全吗？

### （三）无产阶级未能掌握枪杆子是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文革中虽不止一次谈到叶剑英是靠不住的，但却一直未能采取措施，以致于林彪倒台后，军委大权始终被叶剑英所控制。“二月逆流”中叶的表现已经证明：他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在其后几年中又始终得到坚持刘邓路线的周恩来的支持与保护，故使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加之关键时刻汪东兴的叛变，便使得整个军权都落在了右派手中，而左派则手无寸铁，故叶一声令下，曾多次遭到毛主席痛斥的“四人帮”便“一朝覆亡”了，这难道不也是一直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主席的不应有的“疏忽”吗？而华国锋的得势只不过充当了右派军人的傀儡而已。军权问题，也是文革中一直未能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而正是这一根本问题的大权旁落，才导致了文革的彻底失败。

## 第二章 为造反派正名

前面，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了名。但是，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名，则必须为革命造反派彻底正名。

“造反”一词，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不过是“大逆不道”的同义语而已。而镇压造反者，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从秦末的陈胜、吴广，汉末的黄巾，隋末的李密、窦建德，北宋的宋江、方腊，元末的朱元璋，明末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国，这一系列的农民大起义，除刘邦及朱元璋，哪一起没有遭到封建地主阶级的血腥镇压。而刘邦、朱元璋之所以例外，无非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最终沦落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罢了。

“造反”一词，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见之于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七月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但从是年六月到年底，“造反”一词并未成为流行语。“造反派”亦未出现。次年“一月风暴”后，作为对“一月风暴”反动的“二月逆流”，是一部分对文化大革命持仇视和敌对态度、一味坚持刘邓路线的老帅们在怀仁堂上演的一幕闹剧。之后，全国范围的“反逆流”浪潮兴起。在“反逆流”高潮中，陶铸成了最大的保皇派。相应地，凡站在“二月逆流”一边保刘邓的，也一概成为了“保皇派”。其后不久，将“保皇派”改称“保守派”。与保守派相对应，“造反派”一词应运而生。“反逆流”的组织，无论学生、工人、农民统称造反派。说句真心话，将自己说成造反派，或被人称作“造反派”，我的心

里并不自在。因为从小到大，我及很多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谁人未曾不被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叛逆行为斥之为“造反”呢？再就是联系到文革前的自己，在学校一直是受校领导老师好评并器重的“优秀生”，一向驯顺听话，怎么会一反常态，变成造反派呢，因之，在整个文革中，我从未自称过“造反派”，即使后来在公众集会的演说中，我也从未带上过“造反派”一词，而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代之。“反逆流”后，红卫兵逐渐退出舞台。这时，毛主席在庆祝斯大林 60 岁诞辰会议上的一段话被谱成歌曲，成为大会小会及各种游行队伍里必唱的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伴随着这一歌曲的流行，“造反派”一词大行其道了。随着保守组织的迅速瓦解，“造反派”终于控制了局面。“造反派”的黄金时期总算到了。但好景不长，伴随“七二〇事件”及毛主席 7 月以后的视察大江南北，造反派的霉运便开始了。因此，造反派扬眉吐气不过两三个月，便在“批派性”的围歼战中消失了。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贵州李再含，黑龙江潘复生，这四位赫赫有名的大左派纷纷淡出。王效禹先是充当“二月逆流”的帮凶，后沦为走资派的阶下囚，岂不悲哉！

公正地说，此时的造反派，除极少数坚持下来的红卫兵外，多数是工人中的激进分子。这些人多数是刚脱去布衣的青年农民，还有部分刚进工厂的学生。这些人与真正的工人阶级尚距离甚远，他们是工人阶级中地位较低、待遇稍差者。他们不像很多老工人那样对各级党委感恩戴德，敬若神明。他们富于冒险精神且年轻无后顾之忧。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身后大多都不同程度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些人，一遇顺境，便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诸如“反逆流”

胜利后的“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以我为核心”等等。大敌未倒，他们已自己打起了内战，所以才让那些以老工人为主要成分的保守派——“走资派”的羽林军钻了空子。天下大乱的局势，已使毛主席“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的战略部署无法实施，不得不对造反派实施严管了。从召集北京“五大领袖”谈话，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挥泪斩马谡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倒霉蛋们实属咎由自取！

其实，所谓“二月逆流”，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心怀敌意而又打着“支左”幌子的军队镇压造反派，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在山东，还有些特殊性。那就是，由于山东夺权为1967年2月3日，而在此前三天，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首，联合了“山东革命造反工人联合会”等组织，于1月31日进行了“夺权”。相隔三天后，以王效禹为首，在济南部队支持下进行了“二三夺权”，并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承认。夺权后的王效禹将“山大主义兵”及“山工联”视为“极左派”，视为颠覆新政权的最大威胁，所以王效禹在支右的部队支持下，将全省最大的产业工人组织连同其他造反组织一概作为反动组织取缔并进行了镇压。各地的监狱大有人满之患。除工人外，还有部分学生。因为我当时正在乡下，因而幸免于难。所以事实上，王效禹与“二月逆流”的鼓噪者们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效禹依靠的山工总，除济南外，在全省各地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激化了全省范围内的造反派的内战。在部队支持下，重选核心，并因此在全省扩大了“山工总”的势力。然而，不能让王效禹睡稳的是，除“山工联”外还有一股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并辅之以保守派红卫兵的强大的反文革势力，且这一势力在鲁南及鲁西南地区的广大农民中还颇具影响。加之南

京军区许士友司令的支持，王效禹的政权岌岌可危。然而王效禹有中央文革康生、关锋等人作后台，所以在全国率先吹起了“反逆流”的进军号角。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始终处于文革对立面的济南军区司令部开始了“转弯”。王效禹暂时胜利了。但胜利使王效禹冲昏了头脑，开始做官当老爷，作威作福起来，并在其老婆的推波助澜下，重蹈起老的当权派的老路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山东这块文化大革命的前哨阵地，在一年之后的党的“九大”上，被某些心怀叵测的家伙践踏了。王效禹成了众矢之的，而陈伯达，康生则赤膊上阵，毫无廉耻地将王效禹出卖了，将王效禹像死狗一样抛给了军内的右倾势力及整个保守势力。率先宣告了山东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随后，其他各省市纷纷效尤，唯余上海这一叶孤舟了。

1976年10月右派政变后，强行泼在“造反派”头上的污水铺天盖地而来，其后，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一些伪史书，一提起造反派，无一不是青脸红发，锯齿獠牙，满嘴脏话，狂舞皮带，手持棍棒的妖魔。而且不分哪个历史时期，概莫能外。殊不知，这些造反派在文革中，唯有以毛主席马首是瞻，唯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是从，时刻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塑造自己，他们才是文革的中坚，是真正的左派，唯其如此，他们才自始至终被走资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也逃脱不了被整的厄运。

列宁说：“当革命到来时，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甚至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毋庸讳言，在这场轰轰烈烈，席卷神州大地的大革命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混进少数不良分子，甚至于有敌人混进来，这都有可能，但必须看到这是少数，而不是主流。但走资派们、邓小平们

却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听听邓小平的话吧。只要是造反派，“一个都不能放过，要坚决镇压。”这同当年蒋介石对付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叫嚣有何区别！

纵观十年文革史除了一九六七年“反逆流”后两三个月的扬眉吐气之外，有哪一个造反派不是处在走资派的重重压迫之下：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八月，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专政；“二月逆流”中被捕入狱，鲜有逃脱者；党的“九大”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团结、胜利”的凯歌背后，却充斥着造反派的哭泣。其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尤其是清查“五一六”，必欲将其斩尽杀绝而后快。而一九七六年十月“右派政变”后，得势的右派更是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反扑过来，在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名义下，造反派或被捕、或被杀，将文革中的革命行为套用在一九八〇年后颁布的《刑法》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试想，当毛主席在世时，走资派们尚且能够利用毛主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过的一些不利于造反派的话，对造反派进行疯狂镇压，何况毛主席逝世之后呢？走资派们以其疯狂的表演，从反面向我们揭示了这场革命的性质。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真是你死我活啊！而斗争的表现形式，就是走资派策动一切保守势力组成的御用部队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毛主席是造反派的总司令，中央文革是总参谋部，而造反派则是毛主席统率下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这个斗争中，走资派基本上占上风。由于走资派丧心病狂地干扰和破坏，使毛主席本打算几个月便可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反反复复进行了十年之久！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不无

自信地说，制造“动乱、浩劫”的罪魁祸首恰恰是走资派们自己！

走资派仇视文革，必然仇视造反派，正如同他们仇视“四大”一样，在其复辟后修正颁布的第一部《宪法》里，便首先取消了“四大”，可见其欲想确保其江山的安宁，当然必须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向造反派举起屠刀，实施镇压了。

在整个文革中，就以我本人为例来诠释一下真实的历史吧。毋庸讳言，在文革前，本人便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然何以一直担任学生会主席并被当选为省学联委员。如果不是50多天里刘邓资反路线的迫害，我根本就不会起而反抗。我不仅没造过别人的反，恰恰是别人在不停地造我的反。“二月逆流”中虽未入狱，但却未能逃脱支左部队和坚持资反路线的那些人的迫害。“反逆流”胜利后，那些被分化瓦解了的“保守派”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因为“造反派”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最终爆发了内战，且愈演愈烈。譬如在淄博，在围绕前市委书记刘干的态度问题上，“造反派”本身分裂为“打刘派”、“保刘派”，延续半年之久的内战结束后，在内战的废墟上，将在“反逆流”中被摧毁的“保守派”的“3.16”市革委会的僵尸复活起来，在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支持下，将其进行了“充实调整”，我也有幸被选入了调整后的领导班子，成了革委会副主任。在主政后一年多时间里，完全是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上山下乡下厂下车间，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的完全是巴黎公社的“三原则”。如果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制度坚持到今天，会有如此严重的贪腐吗？

综上所述，可知文革中的造反派并不像走资派横加诬蔑的那样，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洪水猛兽。这派人中，并不乏精

英、优秀人才。如人们所熟知的哈师大范正美，河南“二、七公社”的袁庾华、武彩霞，山东农业大学的国恕连，山东大学的宋书星、项观奇，山东师范大学的王竹泉，潍坊的张继胜、李乃孝、耿彪等。其他不熟悉的不敢妄加罗列。就我周围的朋友中，像李相德、王铸、程昭湖、于洪运、曹在民、胡延成等同志。这些人几十年来，一直坚持马列毛主义，有的坐牢，有的屈死，但始终坚贞不渝地同修正主义坚持斗争。而且有的在逆境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文革”初始到现在，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中，他们所接受的只是有关“文革”的负面教育。他们不知道“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及深远影响，更不了解他们的父辈们为坚持其信仰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牺牲。现在，是该认真地反思这段历史并为它、以及为它献身的英雄们正名的时候了。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曾以满腔义愤痛斥梯也尔及俾斯麦们，并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歌颂巴黎公社的英烈们：“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它的英烈们将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敬仰；那些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们将被历史永钉在耻辱柱上，无论他们的教士们怎么祷告也无法将他们解脱。”同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也是永存的。而邓小平—当代的梯也尔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永远无法赦免的，也会被永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且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解脱。

与此相反，那些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无私无畏的造反英雄们，那些推动历史的革命先驱们，也将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敬仰！

### 第三章 丢掉幻想，为真理而斗争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绞杀以后，中国国内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工人阶级已由毛泽东时代的领导阶级重新沦落为雇佣劳动者，成为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的剥削对象。他们在“下岗分流”的幌子下被无情地抛入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他们缺乏阶级的自觉，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理论修养，他们不理解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不仅如此，他们还盲目地追随党内走资派，并一度成为他们的御用部队，成为走资派镇压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的帮凶。

鉴于此情况，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适时告诫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工人们对自己领袖的告诫不以为然，他们自认为各级党的官员才是自己切身利益的代表者，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相对优裕的地位，处于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阶级本能，所以，他们漠视甚至反对一切改变现实的努力，他们不但不去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革命，相反却站在了革命的对立立场上。由此，我们想到了“宪章运动”时期的英国工人贵族。但是，正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保守和冷漠，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便不得不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凭借政变上台的党内资产阶级，掠夺了全

部的生产资料，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官僚买办特权阶级。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他们还仅在共产党内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党内走资派已经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官僚资产阶级，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已将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瓜分完毕，成为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阶级。而且这个党的阶级性质也已改变，它已背叛了工人阶级，堕落为官僚买办阶级。在“下岗分流”的口号下，工人们像驯顺的羔羊一样任人宰割，成为失业大军。取代他们的，是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脱离了土地束缚的农民。这些被称为“农民工”的廉价商品，迅速成为官僚买办资本及外来资本的榨取对象。老一辈工人阶级的手艺已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砸掉饭碗一条路。他们在真正的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时期培养起来的逆来顺受的本性，竟使得他们在面临的失业面前束手无策，面对穷凶极恶的官僚资本诚惶诚恐，并无奈地选择了缴械投降。除了通钢工人有一点零星的反抗外，整个工人阶级竟表现出惊人的顺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居然无声无息。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等于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解除了武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后，实在是大大有利于资本的剥削，也极大地有利于复辟了的官僚资本的统治了。大量廉价的外国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中国的民族工业，然后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工厂办实业，不消几个回合便击溃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外资本的输入更给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开了方便之门，使中国经济沦为外资的附庸，使偌大一个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加工厂。可笑的是，在青岛啤酒被日本控股后，竟出资 30 亿日元为日本收购中国的钓鱼岛。这无疑于用中国的

钱为侵略者收购中国的领土，汪精卫干不出来的汉奸勾当当今的改革者们干了，还有比这更寡廉鲜耻的吗？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更加不堪。因为整个工人阶级被彻底瓦解了，失去了反抗的动力。而先于城市的在农村进行的“改革”，邓小平给予农民的一点小惠，极大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农民的自私与保守，充当了复辟的同盟军。历史已经证明，千百年来，小农是矗立在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之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小农只有心安理得地苟活在这种王权之下，才能从上面承受天赐的雨露和阳光。应当说，邓的复辟之所以如此顺利地得以实施，首要的原因是他率先依靠小农否定并镇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面对着中国现实的阶级关系，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以捍卫毛泽东主义为职志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怎么办呢？

《共产党宣言》中说：“毫无疑问，共产主义就是要同迄今为止所有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且毫无疑问，在它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一切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情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者，亦即马列毛主义者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实施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要斗私批修”，就是要我们实施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遗憾的是，由于旧势力、旧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这两种东西在复辟之后的私有制的土壤里，轻而易举地复活了。当务之急，在于重新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她正名，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否则，那只能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买办资本在中国大行其道，让工农大众继续受剥削受奴役。

要想同所有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首先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此，我需要申明的是，我们应当感谢邓小平这位反面教员：是他，简化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也相继简化了城市的阶级关系，那就是贫富两个极端，首先在农村进行的“改革”，一夜之间回到了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让小农重新回到了他们的老祖宗身旁，沾沾自喜地守护着他们的小片土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生产手段则仍是锄、镰、锨、钁四大件。公社化以来几十年的集体积累，一下子赐予了原来的书记、大队长、公社的企业，亦相应成了书记、社长、厂长的私产。这就是说，现在农村的当权者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当权者，又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即老板。他们相当于资本化了的地主。他们是农村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仅仅象征性地出了几个钱，便顺理成章地将公社大队几十年的集体积累攫为己有。他们的原始积累是靠邓小平的党所赋予的权力，他们将权力转化为资本，一夜暴富，然后又依靠掠夺的资本巩固手中的权力，以便用扩大的权力攫取更大的资本。这是比英国资本发展史上的“羊吃人”运动还要残忍的运动。相对应地，原来的公社社员，有相当多数人变成了雇佣工人或离乡背井成为新的城市无产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相当多的乡镇企业（公社制时代称之为社办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有的甚至超过了城市里的大企业，具备了现代化的生产条件。其劳动力来源，已非当地的村民所能满足，他们还面向全国雇佣工人，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农村工业无产阶级。

农村“经济改革”完成不久，城市“改革”也如法炮制，一方面是原国营企业的纷纷破产，以便让工人失业并将工厂“卖给”原来企业的当权者或外资老板。于是，建国后被赶跑的“洋大人”又一次卷土重来，纷纷收购破产企业。工人阶级再次沦为帝国主义及新的官僚买办阶级的奴隶。即使是

那些掩人耳目的股份制，事实上还是一种混合型的私有制。

由此可见，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阶级关系已变得既明朗又简单。即：一方面是轻易获得了生产资料的官僚资产阶级及外企资本，另方面是失去了生产手段，只剩下两手的工业无产阶级。就阶级而言，已失去了城乡的界限。

按照列宁的阶级产生政党的理论，毛泽东后的共产党已经质变为真正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买办和走狗。再把它说成“党内资产阶级”的提法已经过时。无论是他的党员成分还是各级代表大会及其组织机构，除了资产阶级政客就是公司老板，究竟还有几个是产业工人呢？

本来，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这个党的路线的灵魂。而如今，马列毛主义成了高高挂起的羊头，而邓记店铺内卖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狗肉。

“邓、三、科”一脉相承，早已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变成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无数革命先烈，他们满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不惜为之赴汤蹈火、流血牺牲，而今天却演变成了梦想，即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所主张的小康之梦。

中国现实的社会现状及阶级关系，决定了中国未来革命的对象及性质。那就是，中国未来的革命，必然是在马列毛主义指引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它的革命对象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早已死亡，早已被邓小平埋葬了。它的革命动力将是现代正日益壮大、日益成熟的工业无产阶级。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指导未来革命的理论武器必将是马列毛主义。但是，马列毛主义并不是工人运动自发的产物。工人运动自发产生的只能

是工团主义。所以，摆在马列毛主义者面前的根本任务，只能是向工人阶级进行灌输。只有马列毛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已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摸索走过来的路，而不是邓小平一类骗子“摸着石头过河”走过来的。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已经锻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同样，在中国，以邓小平为鼻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党也已经锻造了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 第四章 热切的期望

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搁笔掩卷，仍感有不尽的心里话想寄予现在尤其是未来的读者们。

本书的书名为《回顾与展望》，作者本身并不是想把文革作为过错而加以批评，也不是想将自己在青年时代以满腔热血、义无返顾地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而进行什么检讨，只是想以手中的笔，将这场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场大革命放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加以诠释。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我可以坦白地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生活，除了真实之外，作者对任何人物、任何事件都不敢妄加揣测。否则，我既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也会遭到历史或后人的挞伐。

我矢志不渝地相信，无产阶级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即人类的归宿必将是共产主义。当然，马列毛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马列毛都未曾为我们描绘过什么共产主义的蓝图。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同样被一切反动势力在邓小平的旗帜下颠覆了。东欧的所有社会主义都一概消亡了。但我仍然确信，社会主义并不是空想，也不会过时，社会主义理想是奠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研究全部人类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史所作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难免会有反复。复辟，走回头路是在所难免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是波旁王朝的复辟，无论是封建制

取代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王朝，各种各样的复辟不是层出不穷吗？更何况共产主义革命乃是最后消灭阶级社会的革命呢？这一规律已被毛主席揭示得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及修正主义的上台，不是雄辩的证明吗？

但是，我们将遵循的，仍将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定律之一——“否定之否定”。邓小平否定毛泽东，我们将同样否定邓小平。前者为第一次否定，而后者将是否定之否定。但这是更高层次的否定。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着。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暂时失败，才使得邓小平这只“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鸡”（列宁语）破门而出，从臭哄哄的屎尿中刨出了他的所谓“理论”，并相继使得那些“过时论”、“补课论”猖獗一时。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共产主义无非是：“这是一个未曾有过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里，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在这个联合体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这里，阶级消灭了，没有了压迫，没有了剥削，平等地、按需要分配着自己的产品；在这里，国家的职能已经消失，它是自行消亡的，它已经变成了废物，“去跟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语）。在这里，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但赫鲁晓夫、邓小平之流又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空想，以致使名义上的共产党不再讲共产主义。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身负着历史所赋予的伟大使命，我们必须否定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强加在共产党头上的对共产主义、亦即对马列毛主义的否定，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不息。如此说来，你即使被伪共产党开除了党籍，甚至被视为敌人而遭到镇压和杀戮，仍旧不失其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者，光荣的共产党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政治斗争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意思是，政治斗争不是那样笔直和平坦。发展，是螺旋式而不是直线式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社会的发展同样如此。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但潮流总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事业每天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统统抛在后头”。

我们相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揩干净身上的泥土，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无产者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当今的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政党——邓记共产党，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甚至还没有将自己上升为阶级。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且还分散于全国的城乡各地。好处是，无产阶级已不再仅仅是城市的宠儿。现在，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产业工人已成为一支庞大的生力军。这也就告诉我们，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不可能再像十八九世纪的欧洲那样，仅仅局限于城市，极易被资产阶级和封建领主联合起来将革命迅速扑灭，也不可能像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需走那样漫长曲折的路。未来的中国革命势将在毛派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首先是大城市，然后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夺取全国胜利。这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过的道路。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斗争将是惨烈的、血腥的、复杂的、曲折的。斗争的最高形式仍将是武装的革命战胜武装的反革

命。任何和平的、议会式的道路只能是机会主义的幻想。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资产阶级已经锻造了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革命的高潮何时出现，我们不得而知。那要看危机何时形成。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危机到来的标志是，不仅被压迫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而且，压迫阶级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只有这样的时候和程度，我们才能像一句欧洲谚语中所说的那样：

‘老田鼠，掘得好’！”

举起你的双臂，高昂起你的头颅，静静地期待这一天吧。胜利，将永远属于战斗的无产阶级！

## 跋

在本书已经结束的时候，总感到意犹未尽。目前正值深秋，残阳无语，万树凋零，木叶尽脱。遥望四宝山，不禁悲从中来。因为在那青山环抱的玉皇陵园内，埋葬着我的最爱，埋葬着我永恒的思念。我不禁蓦然想起庾信《枯树赋》中桓温的感叹：“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是啊，故人已逝，永不复生，唯有这日月星辰，还在不停循环地运行着，唯有这浩瀚的宇宙，还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得以永存着。

我已 69 岁，眼看就已进入古稀之年。爱妻去后，唯有与儿子孙子安居在世纪花园的一幢楼上。小孙子壮壮年已十一岁，天真活泼，天资颖悟，恰如少年时代的我。儿子年届四十岁，几年前已经离婚，尚是单身。但儿子甚是孝顺，洗衣做饭，家务全包。他的公司生产一种酚水处理仪，现已通过有关单位验收，拥有国家专利。祖孙三人相依为命，倒也其乐融融。

不少同学朋友劝我续弦。但思虑再三，还是婉拒了。妻子清香虽已长眠于地下，但我始终感到她的英灵无时无刻不伴随在我的身畔，她音容婉转，永远活在我的心间。在我的心中，这世上已经没有第二个人能取代她的位置。人生一世，能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己，吾愿足矣；能够与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轰轰烈烈地相爱一生，死不恨矣！

我想，在“右派政变”之后遭受残酷迫害的岁月里，有的同志被迫自杀，有的同志因不堪刑讯逼供而获病早夭。而我之所以能够在修正主义法西斯的淫威面前百折不挠，宁死

不屈，大义凛然，勇斗敌酋，无非仗着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坚贞不渝的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坚信真理一定战胜谬误，正义终将取代邪恶。正像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给江青信中所预言的那样：“中国如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说得何等的好啊！

其二是，赖有一个与我志同道合、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妻子。她是我心中的女神，是我命中的活菩萨。如果不是因为有她，我恐怕早就追随已逝的亡灵于地下了。

譬如我的尊敬的师长史永洲同志，他心地纯洁，忠厚善良，是一位坚贞不渝的马列毛主义者。但终于屈死在法西斯分子的淫威之下。还有潍坊市的毛德训同志，二十多岁的翩翩少年，代人受过、李代桃僵，竟惨死在修正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屠刀之下。如此优秀的同志，全国又何止千万，岂不令英雄扼腕！

然而，我坚信，历史的道路无论如何曲折，马列毛主义是必胜的，共产主义是必胜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毕竟历史是由人民来创造，来书写的，先烈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司马迁在评价自己的《史记》时说：“可与知己者道，难与俗人言也”。我想，《回顾与展望》一书的命运，大概也难免如此。首先，她的敌人——修正主义者将会将其视为异端而大张挞伐。其次，那些不满于文革的糊涂虫们，也会跟着瞎起哄。只有那些亲历过文革洗礼的马克思主义的志士们，方能真正领悟书中的内涵。同时我也相信，那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也会将此书视为“福音”的。

2015年10月16日于香远益清书斋。

董学诚

## 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汇报提纲》。

二月七日，以电报形式发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针对李建彤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会间，毛还当面质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与陈伯达在杭州谈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击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一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学术批判问题谈道：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

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物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

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阵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决定提交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照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它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当关锋化名何明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

日报》发表后，毛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左右，署名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饭厅外张贴出来。

六月一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大字报和陈伯达主持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同时，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编辑部文章。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社改组后，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公布了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并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

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这样一来，工作组的目的更加明确了。

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找来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包括刘平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谈话，说：“出现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它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同时，刘把北大工作组对“6.18事件”的处理情况批转全国：“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情况是正确的、及时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信中说：“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粉身碎骨的。这有什么要紧，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大多数都不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都被他们搞得粉碎，何况我们呢？”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第二天，在接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把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还对刘少奇前段的工作明确表示：“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此前，刘少奇的“八条”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

要在学校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政治局常委的面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逐驱之。

二十六日，毛接见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说：“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

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邓、周被迫作了检查。刘在发言中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有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接见了与会代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

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八月十日晚七时十五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提出现在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并于五月二十九日秘密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六月初，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矿业附中及北京二十五中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

清华附中于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七月四日，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七月二十七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引用了“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表示一定要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压迫、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用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

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以上所记载的，便是文革初期时，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情况。也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回合。结果表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最初的胜利。

“大事记”，只能写到这里，下面的具体事件，因无资料，不敢妄作。

——作者

结稿日期：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红色中国出版社

纪念文革50周年暨毛主席逝世40周年系列图书

